



「潘朵拉」盒子打開了，民間抗爭的分水嶺

《黃絲帶與傘，及小雞蛋》

港人以堅強的佔領運動爭取真普選

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何以慘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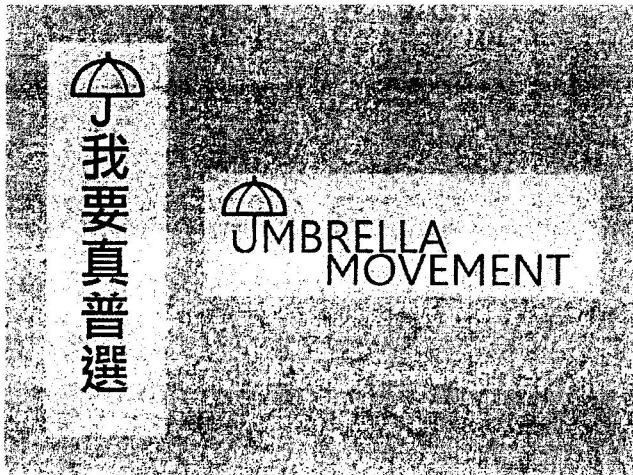
黨大於法的「依法治國」及其惡果

內陸興建核電決不可行

永遠懷念鄭澤鏗老戰士(1918-2014)

「潘朵拉」盒子打開了，民間抗爭的分水嶺

大進



79天*的佔領行動，肯定是香港史上，至今最波瀾壯闊的民主抗爭行動。這次事件亦是一個分水嶺，讓公眾重新審視和質疑社會上原有的權力、價值、抗爭策略.....。 *

(到12月下旬，立法會外行人道仍有示威者紮營，拒絕離去，所以其實行動未算完結)。

今次運動的核心事件，是公眾追求政制民主化。「佔中三子」依據理論仔細部署，用逾年多時間，希望在議會制度以外，藉公民抗命向中央施壓，以求政制民主化，有實質的發展。

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8·31的決定，令北京對香港選舉控制變得更嚴密，而令爭取民主的人士更感絕望。泛民以往在「民主回歸」框架下的信念，已變得空洞。他們幾十年來爭取民主的企圖，亦變得蒼白無力。以往抗爭的渠道、政圈分子的力量，似乎再難令大眾有懸念。「佔中」展開以來，在民間凝聚相當多的支持。上一次政改，泛民妥協的策略，並不能換來甚麼進展。議會敗壞、特區政府不濟、建制派囂張跋扈等等，都令港人徹底失望。

難怪法律學者戴耀廷亦要喊出：「這是一個抗命的年代」，爭取民主自然亦要找另外的途徑。

「佔中」運動出現，事實上已顯示民間的抗爭，再難用以往的模式進行。之前政制的博弈，很多都是所謂「政圈中人」的事。政黨、議員、特區和北京官員，以至那些所謂中間人，都是主要參與者。而這次運動開始時，已是由非政圈中人（雖然「三子」是與現有政界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去策劃。

嚴格來說，「佔中」未曾發生，事件未如「三子」心目中的劇本展開。「學聯」和「學民思潮」在罷課集會中突然發難，呼籲重奪公民廣場，警方粗暴鎮壓，引起公憤。9·28 警方瘋狂的87枚催淚彈，令情緒澎湃的群眾自發地佔領金鐘，其後包括旺角、銅鑼灣、尖沙咀。「佔中」在「佔鐘」中誕生。

這次運動高度自發性，和對政黨政治的不信任，令運動參與者有高度自覺，抗拒單一和傳統政團領導。在金鐘佔領後期，有民眾更提出「無大會」和要拆走「大台」，避免一個強大的集權中央。這些傾向似乎亦是重新思考，在社會運動中個體與個體的權力關係。政黨和傳統社運團體亦很小心，以免被人指責參與只為「抽水」，希望邀功。

因為沒有「大會」，亦沒有團體自稱「領導」，個別團體和小組有自由採取行動，例如：佔領龍和道、試圖阻止政總公務員返工，衝擊立法會等等。這些去中心化，由下而上，講求自發自主的傾向，在這次行動中是十分明顯。直接民主、直接行動等等概念，就通通拿來實踐。

當然，這些做法對運動是好是壞，抑或令力量變得零碎，缺乏持續性，是值得深入討論。以往社會行動那些固有模式：談判、集會、示

威、請願，遊行，再不被認為是唯一選擇。其他形式的行動，對抗性、甚至激烈的行動，都有人提出，再不認為是禁忌。無可避免地，不同分析、不同策略，會有意見相左，互相指責。另一方面，所以若果今次堵路和佔領，這些以往被認為激進行動，都未能取得成果的話，之後的行動將會是怎樣？會否是走向「更激進」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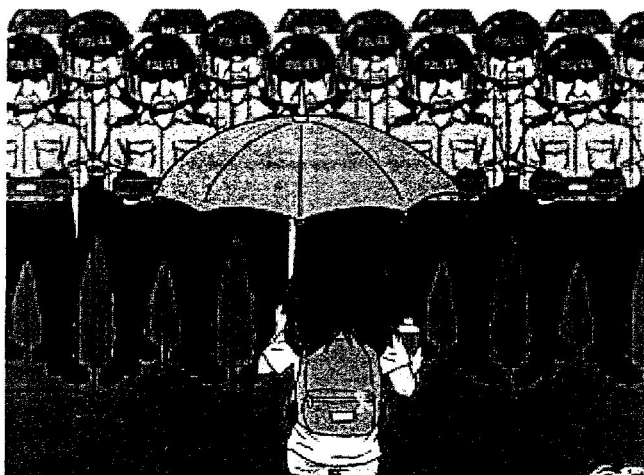


社會上的權力關係，亦重新被審視。無論「佔中」、「佔鐘、銅、旺、尖」，從現有法例上來看，本質上已是抗命違法（在抗命者眼中，已別無他法）。抗命者守護著佔領區，對抗是拿著「公權」的警察。在特區和中央的高壓政策下，警察其後暴力對付示威者，赤裸裸顯示出其國家機器的本質。特區現政府只懂緊跟著中央的政策，對港人的訴求充耳不聞，它管治的合法性，亦肯定被數以十萬計的抗命者進一步所質疑。從這次事件，抗命者亦深深體會到，中國和香港之間的文化、政治鴻溝，民族主義的大統一，不再是必然的。

「佔領運動」的佔領區，是位於原本繁盛的商業地段，與周圍環境起著強烈對比。留守者和支持者把這個鬧市中的孤島，興建出一個「另類社區」：喜歡的話，可躺在馬路看星星，學生可在街頭溫功課。這裏沒有嗆鼻的廢氣，

却有著溫馨互助的人際關係。政總旁邊更有人闢出一畦田，讓人栽出花卉和植物，提醒我們耕種仍可以是生活一部分。佔領區內的浪漫氛圍，是對既有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價值的反思：我們想要一個甚麼樣的社會？為甚麼我們不可能過著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一些看似虛無飄渺的概念，大家却可在佔領區實實在在地體驗。所以，公眾看得見的，不單只是追求民主選票，是現有社會制度改變後的各種可能。

「潘朵拉」盒子已打開了，民眾的眼界和想像，肯定已再不一樣。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1卷第2/3期合刊（總第237期）

2014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黃絲帶與傘，及小雞蛋》(長文節選)

江瓊珠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金鐘A出口面向夏慤道的空地，每晚都有人在唱民歌，吸引了不少人。一班從旺角來的「行動講台」的年輕人就很不滿，在旁邊擺檔，手執咪高峯質詢大家：「你們金鐘搞什麼的？我們在旺角，由街頭到街尾，到處都是政治討論。你們卻在唱歌。唱？X歌呢？」歌者在唱《海闊天空》，一生經過徬徨的掙扎……然後一個女孩子又問：「你們只是聽歌，有冇聽真歌詞呀？一生經過徬徨的掙扎呀，你們有掙扎過嗎？有思考過這個人生嗎？掙扎是好痛苦的，運動是要犧牲的，你們知道嗎？我們爭取自由嘛，自由是很可貴的，要付出代價的，你們還不醒覺……」一口氣十數分鐘的演說，瑰麗動人。接著發表意見的，一樣激情。不是來到現場，我不知道香港有這麼一群基進思考的年輕人。奇怪的是，圍觀者也很專心傾聽，被責備也不離開，年輕人的演說，像《皇帝的新衣》中的童言，揭示了真相。多少人茫茫然便過了一生。年輕人要求的，我們未必做得到，有人願意走在前頭，年長的，便要充當後盾。928催淚彈後，很多中年人跑了出來，都說要保護學生。年輕人卻有自己的議程，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行動講台」的一位年輕人說運動之初去旺角，合資了千多元買了一支咪高峯，講了幾十天。雨傘運動之所以美麗，因為勇敢的一代已走上街頭。我不知道將來運動裡的人是不是要以生命來換取什麼，今天，行動的、衝擊的、叛逆思考的年輕一代，已把傳統的政治光譜拉闊，左翼裡有左翼，政治的想像空間，比天空還要寬廣。但願我們彼此保持憤怒，柔和以待。

佔領了的陣地，大家都不願意失去，守得一時得一時，有一次長毛說：龍和道我都頂咗幾晚啦。以往常常衝擊示威防線的長毛，這次非常遵守公民抗命的原則，每次鐵馬前有異動，他都在勸說不要衝擊。早期常常有人突然衝出去攔路，堵塞交通，和平抗命者就合力呼喚攔路人「番嚟、番嚟」，像招魂一樣。同是抗爭者，內裡意見紛紜，那批負責招魂的，溫和兼有耐性，這是香港秀麗美好的一代，是命運的主人翁，為什麼沒有權利決定香港如何走下去？

抗爭現場實踐了很多自決自主，街道是屬於人民的，一條龍和道在佔領期間，不知灑遍了多少群眾的汗水。龍和道外弛內張那幾晚，守過夜的人很多，社民連在哪裡搭了一個帳棚，有人值班，防止群眾過度衝擊。一天凌晨我看見長毛攤在布椅上沉沉熟睡，那幾天，大家累得站著也可睡去。晨光初露，長毛忽而彈起，拿著大聲公沙啞地向一起守夜的群眾說：剛才梁振英打電話給他，告訴他今天不上班了……無端白事搞爛笑話，群眾沒好氣。警察換班出出入入，他循例率領群眾喊喊口號：我要真普選，我要有權選特首……反應寥落，長毛還是疲憊地喊下去，千回百戰的他可能不察覺，可

我卻看見寂寞的身影站在他背後，愈拉愈長。

天色初現，竟有鳥兒鳴叫，維多利亞港灰濛濛，昨天的塵垢已經洗擦過，新的一天跟過去當然不一樣，可以更好也可以更壞。今天的香港是變壞的開始。我依然喜歡它，不僅因為繁華的城市空間和生活，而是它很會累積能量，到時到候，會突然爆發。每逢大事大非，香港人格外可愛。928傍晚，我站在添美道石壁目睹警方舉紅旗，警告要放鎗，因為不相信，所以反應特別遲鈍，還在思忖這是什麼意思之際，已看見一個警察從腰間拔出第一枚催淚彈扔上半空，落下的一剎，紅藍閃光拖著長長的白煙，很多人本能地往後退，我一樣，跑呀跑，跑了一半，才問自己：催淚彈有那麼恐怖嗎？到我折返時，添美道一片混亂，周遭有嗆鼻的化學味道。逃走的人不住問：我們究竟做錯什麼？陳日君在我旁邊擦過，走得很慢。辛苦了，樞機。天橋上不斷有雨傘掉下。有人冒著煙霧重返現場。阿牛和若干人衝出夏慤道。邵家臻在自主台一直在數催淚彈，第一枚，第二枚，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數到第87枚，待我回到夏慤道時，香港已經變了，群眾已經佔領了街道。香港人好嘢。

戴耀庭好激動，在自主台大聲呼喊：香港人好嘢。香港人自私冷漠不讓座，貪生怕死，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但在那一刻，香港人就是好好嘢。

87枚催淚彈改寫了香港故事。從今以後，香港的故事，不只有漁港變大都會的庸俗版本。香港人致富之外，還會承擔，以肉身迎向暴力。莊敬自強，無畏無懼。催淚彈之夜，很多很多人流淚，那些淚，是從內心，一滴一滴，感動、感恩流出來的。

不久之後，好好嘢的香港人又再重寫老掉大牙的《獅子山下》故事。所謂獅子山下精神，不只是溫情的地同舟共濟，而是抗命不妥協，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永不言敗。倒下了，再起來。「我要真普選」之後，有「CY下台」，有「莫忘初衷」，抗爭精神由街頭至山嶺，無處不在；由鳩鳴到報佳音，無所不是。金鐘清場的傍晚，幾部巨型吊臂車在夏慤道運轉，曾經充滿色彩的街道，變得灰白蕭條，我們在重重警員監視下離開，去到地鐵站，竟有百多人聚在A出口，圍成方型廣場，大家跟著卡拉OK唱抗爭歌曲，一個佔領區常客聞歌起舞：一起舉傘，一起的撐……原諒我一生不拘放縱愛自由，哪怕有一天會跌倒……

我們愛自由，雨傘運動未開始，Beyond的歌已在每一個香港人心裏吟唱。出口不遠處，兩個男子在撐傘，然後，一個OL模樣的女子，在胸前舉著自製的「我要真普選」卡紙牌，在撐傘男前面擦過，向巴士站走去……

我們都不甘心，人民誓必歸來，香港人好好嘢。

（此文節選自江瓊珠最新著作品《黃絲帶與傘，及小雞蛋》）



港人以堅強的佔領運動爭取真普選

振言

佔領金鐘、銅鑼灣、旺角、尖沙咀的爭取真普選運動，堅持了79日之久，終於在北京強硬指示下，遭到港府先後清場而大體上告一段落。

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民調結果顯示：約兩成受訪者曾到現場參與佔領，推算出約有120萬港人參與佔領運動。即全港約六份一人口曾親身參與運動。

這次運動歷時之長，在香港以至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而且爭取的目標重大，在香港回歸後是一項創舉，具有劃時代意義。運動最初由三位人士倡議以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後由10多間專上院校學生及教師帶頭，並成為主力，得到大量中學生年青人和市民響應，踴躍參與，有時高達10萬人擠滿金鐘廣場。

這次佔領行動充分顯現出參與者的民主覺醒、爭取實現真普選的堅強鬥志，和平理性，堅持性強，戰鬥力高，在堵路佔領時發揮出創意。由於參加者都手持雨傘，既用以阻擋警察的催淚彈，又可遮烈日和暴雨，故又稱雨傘運動。

佔領者的中心訴求是爭取真普選特首，為此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8月31日的決定，因為它規定2017年的特首選舉參選人必須得到提名委員會半數以上委員的提名才能參選。但提委會的絕大多數委員都是建制派和保守人士，泛民主派絕難得到半數以上提委提名參選機會。提委會提名2至3名候選人，全港合資格選民就祇能投票選其中一人，無權投票選自己心儀的人，這等於只是充當假普選的花瓶。這樣的「普選」只是假普選，而絕非真普選。

這樣的高門檻提名，完全排拒了民間所普遍要求的以公民提名代替小圈子的提委會壟斷，或者，有八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提委提名便可參選等意見。

廣大學生和市民們非常不滿這樣的假普選，聯合起來用集體佔領行動去爭取真普選。而更多人參與靜坐，也是由於許多原因造成，包括長久以來不滿港府的許多政策措施不當，例如

極力維護大財團大地產商的利益，造成高地價高樓價日益飆升，令市民居住難，貧富日益懸殊，社會矛盾尖銳，廣大市民怨憤大增。而在這次佔領開始時，警察更以暴力鎮壓，向群眾發射87枚催淚彈，又用警棍猛打民眾的頭頸，連警局不准打頭頸的規定也公然違反，造成許多人頭破血流，幾次都有近百人要到医院醫治。

當局這一連串過錯都更加激發起港人的憤怒，其中很多人便參加佔領，或贈送物資支持示威者。許多社會人士和團體也聯合在報章發表聲明，支援運動，並強烈譴責警察的殘暴鎮壓。

台灣和各國僑胞都紛紛聲援，當地傳媒也大加報導，大陸也有逾百人士公開表示支持而遭拘押多日未釋放。

這場運動，雖然未得到當局承諾撤回8.31決定，或改用公民提名等特首選舉方案便遭到清場，但已顯示廣大學生和市民們爭取真普選的堅強意志和毅力，使真普選的訴求深入人心，家傳戶曉，港人的怨憤不滿情緒已不斷增長，抗爭的火焰將不會停熄，各種形式的抗爭仍會出現。如果當局以後制訂的選舉特首方案不符眾望，則抗爭勢必再起，而且會更激烈，甚至遭到泛民主派議員以27票加以否決。

79天的抗爭只是運動的第一波，以後還要有持續的行動，需要再接再厲，加強戰友之間及與民眾之間的團結和理解，落區宣傳爭取民主的必要性，做好抗爭再起的準備。

兩個多月以來，大陸同胞都可從電視等傳媒看到香港的佔領情景，有不少人士專程來港（例如八九民運糾察王登耀），加入佔領行列，或觀看實況。香港這次運動，直接挑戰人大的權威，損壞中共的信譽，也會影響大陸今後的民主運動，增加人民對統治者的抗爭經驗和壓力，其影響是深遠的！

2014年12月25日

警棍有眼：和香港警察討慈悲 (轉載)

乞靈

把我高高舉起

看準頭腦、關節、私處狠狠打下去

灼熱肌膚，血花四濺，腦漿腥羶

看不見是骨折、內出血、休克

永久性傷殘死亡

一棍忘情打下去

良心碎了

我是凶器

本應配在腰間

現在追趕羊群一樣的市民

專揀年青陽光的臉面

忘了警察誓言的初衷

我情願瞎了眼

給世界留一點慈悲



黃絲帶在撒哈拉沙漠(轉載)

王寧

2014 年香港所見

其一：黃雨傘

傘開傘合，潮起潮落

呼吸一樣自然調息

隱隱摺痕心弦顫動

紙傘黃花，我要真普選

一起舉傘，警棍催淚彈都不怕

莫忘初衷持傘走天下

其二：黃絲帶

江河一樣牽動脈搏

黃色的懷抱

2014香港人的夢

掛在襟前和平與愛

一個符號相疊又相連

悠悠繫住天地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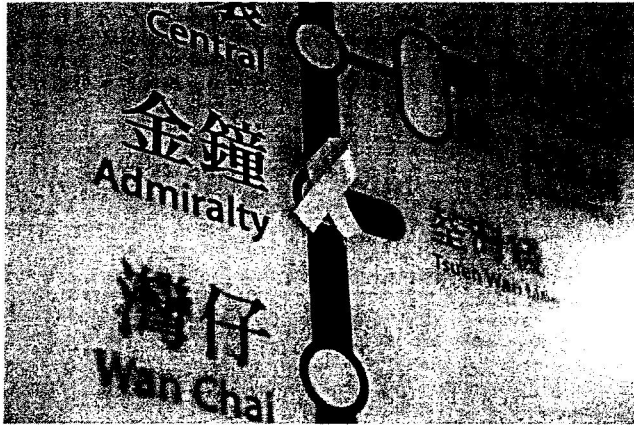
01.11.2014 倫敦

小記：928 后時刻心繫佔領中環雨傘運動，睡眠不足。早上出門不是忘了鎖匙、腕錶、錢包、車票，最后連眼鏡、手機都忘了。



香港和平佔中100天、美國佔白宮30年、澳洲佔國會廣場43年

王寧



2014年全球最為矚目的人權與民主事件當屬香港的雨傘運動，就連梁振英對習近平都說是香港1997后“最大”的運動，即香港“讓愛與和平佔中運動”或“和平佔中”。這個與2011年的“佔領中環匯豐銀行”來響應美國的“佔領華爾街”是有本質區別的。要說是2014年9月28日被當局逼迫提前開始的香港“雨傘運動”或說“佔中”進行了79天，不如說到2015年1月5日，雨傘運動已經度過了100天，因為自從去年9月底的開始佔領運動直到今天，無論從形式上的雨傘運動或佔中，還是內容上的“我要真普選”的抗爭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相比美國白宮前廣場被無核人士佔領已經超過33年和澳洲國會廣場由那裏的原著民於1972年1月26日開始佔領至今而言，香港人民面對著擁有超過四萬億美元存底的暴政集權才進行了1/4年，香港人民為自己人權與民主的抗爭還算是剛剛開始，但是這個開端已經獲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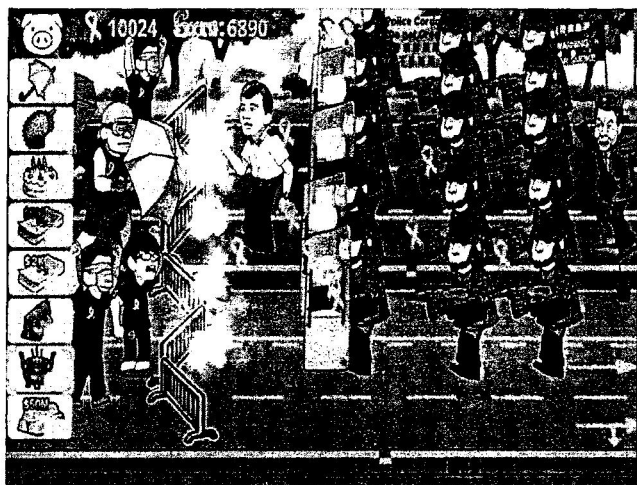
一位為香港人權進步與民主自由在背後默默工作了數十年的、香港社運人士劉山青的愛妻唐婉清女士說的恰如其分。去年10月份的大規模佔中時期她在佔領區域貼出了告示，寫道：

“我們的成果是波瀾壯闊的喚醒國魂。”這正是對雨傘運動成果的畫龍點睛之筆。任何人都明白，人的思想和觀念的改變才是社會能夠改變的最為重要的基石和全部。

為什麼世界上佔領運動會持續到幾代人的身上？因為，這些運動是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中最大的課題之一，那些佔領者們在漫長的戶外惡劣條件下風餐露宿的抗爭過程中，其艱難和歡樂相伴的特殊生活暫且毋庸細述，而值得鼓舞人心的是，世界在朝向他們奮鬥的目標發展著。正如貝多芬、莫扎特等世界著名音樂大師的作品不被當時的人類欣賞，反倒遭到排斥與詆毀，時過上百年後才被我們認識和推崇一樣，世界上太多本來是先進的東西，一時間反倒被愚昧落後的勢力摧毀著，就像我們剛剛親眼看到的香港警察用暴力滅絕心中充滿真理的人們所表達的“我要真普選”和那可愛的嫩小黃色雨傘。看著那一串串鮮黃的小雨傘滴著雨滴、在空中舞者，就被那殘暴的警棍給打飛了、打散了、打痛了、打殘了，還有的被打的西去了...含著滿眼的淚水和義憤填膺的人群，為哪些可愛的小雨傘的悲慘遭遇吶喊著：“我們一定要回來的！”

大的集中抗爭過後，將“雨傘運動”深入社區，要更多的人了解和明白自己的權利已經被玩弄，自己的未來全部掌控在暴政的手中，當人們完全清楚了自己被徹底的欺騙了，他們

就會走出家門來為自己維權和吶喊。全港維權民眾的人口達到了一定的規模，那港人的命運就會回到自己的手中，港中當局無論如何是無法通過共軍來動用坦克車與機關槍屠殺香港人的，因為很多很多在香港居住的所謂的香港人也是有英國國民身份的，還有香港長久以來的國際地位。把香港看成北京去血洗，那等於屠殺英國人和世界也差不多。如果真的共產黨血洗香港，那也就是中南海那幫子現代皇帝和副皇帝被國際法院處以死罪極刑的時候了。



任何社會價值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幾個人就會萬能的呼天喚雨的。美國白宮前廣場從1981年開始搭建帳篷進行30多年至今的無核武器和平佔領。過往這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世界由核競賽逐步變成了消滅核武器與核武技術不擴散時代。人們對於核武器的認識的改變是天翻地覆的，這絕不是僅僅一個白宮佔領就起到了如此輝煌的效果，但是，幾代美國總統和他們的政府對於消滅核武器的認識無疑是受到了他們眼皮子地下數十年白宮佔領的影響；澳洲（澳大利亞）原著民為了反抗殖民主義的欺壓，毅然在全國範圍內的中央和各

州國會廣場紮起帳篷，在他們幾乎是三代人持續維權抗爭的今天，時任澳洲政府總理陸克文 Kevin Rudd向原著民阿伯吉尼亞人民正式道歉，這是澳洲歷史上殖民當局第一次向原著民道歉，這是對歐洲殖民者對弱小樸實的阿伯吉尼亞人的黑暗與殘酷的欺壓給予的懺悔和人類文明發現的宣言，這是對幾十年來幾代阿伯吉尼亞人佔領國會廣場維權最好的回答。這個道歉並不是解決了澳洲幾個世紀長期的原著民被壓迫的問題，但是，畢竟是個良好的開端。

香港“我要真普選”維權的路子還很長，絕不是絕食幾天就可以獲得的。在香港這個畸形的社會裡要維權成功，是需要大家齊心協力，轟轟烈烈的民眾運動，特別是年輕人要聽取民運老一代和學界精英們的忠告。相信，“我要真普選”是贏家，因為這是真善美的集結，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只是，人為的運作失誤會造成好的結果的推延，甚至推延到久遠。美國白宮佔領30多年和澳洲國會廣場佔領了40多年，就是例證。



香港一維權滿月、絕食滿月與抗爭43年

王寧

10月28日傍晚，香港佔中的中心位置、香港政府大廈前的大道上聚集了上萬人，他們在5時57分共同舉起以黃色為主的雨傘默站87秒。他們在紀念一個月前的9月28日傍晚5時57分香港警方開始向在金鐘一帶和平集會的學生和市民發射催淚彈的恐怖事件，總計87枚英式催淚彈落入稠密的香港人群中，直至次日週一的凌晨4時左右。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由上海移居到了香港的曹老先生對本記者說：“當時很多人都看到員警配有長槍，他們還帶著防毒面具，不知道為什麼到第二天早上4點時催淚彈不放了，槍也沒開，員警突然後側了，一直覺得很奇怪。當時（人們）都相信，放催淚彈後抗議集會的人還不走，他們（當局的員警）就要開槍了，像是堅決要清場的樣子。”就當時釋放催淚彈的狀況，他說：“我當時就在（佔中區）裏邊。本來啥事也沒有，大家都是很和平的，突然催淚彈就來了，當初我還以為放炮仗，從來也沒有接觸過催淚彈，很多人喊著是催淚彈。我的眼睛痛，流淚流鼻涕，流個不止。當時我就想，這回完了，要死在這了。”

曹先生在佔中現場向記者描繪了9月28日員警是如何封鎖金鐘各個交通要道和金鐘地鐵站的，說員警在用催淚彈武力清場前是做了充分準備的，員警組成人牆完全把集會的學生與城市隔離開，不要更多的人進入佔中區。他說放催淚彈之前人還不多，一放催淚彈，電視直播，人們一下子就站滿了金鐘附近所有的空地和街道，足有幾萬人。他說：“就像潮水海浪，你員警一放催淚彈，那市民就撤退，催淚彈一停，人們又像大浪一樣來了，就這樣一直和員警戰了一夜。第二天這裏（戰中區）到處是物資，什麼都有，礦泉水、食物、毛毯、防毒用

具、雨傘、雨衣，應有盡有，堆得像小山，都是香港人自願捐獻自己送來的。哪有國外勢力支持，他們（中共）盡胡說八道，全是造謠。”

就在香港投放催淚彈滿月的那天5時57分，由臺灣青年反共救國團主席林保華率領，在臺北市中心的自由廣場舉行了撐傘支持香港佔中的活動。



圖片：曹先生每天天一亮就坐在佔中區那裏閱讀他喜愛的《蘋果日報》。他說：“香港只有《蘋果》敢說真話，其它媒體都喪了良心。我就買蘋果看，其它一律不看。”王寧10月28日攝影

記者的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老鄉也在佔中。他們有的絕食，有的在大道上的帳篷裏住了一個月了。他們都是早先從香港移民到了新西蘭和澳洲的。

已經70歲的黃文老先生在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居住，州府在悉尼。他在澳洲一家酒吧看到家鄉香港發起了佔中運動，他坐不住了，立即訂機票於9月22日趕回老家看個究竟，當時還沒有放催淚彈，幾天後他有事情需要回澳洲處理，結果在他飛抵悉尼的那天，香港警方向市民發射了催淚彈。他火速處理完自己的事情，兩天後他就又出現在香港佔中區，這次他決定與同學們共存亡。他對記者說：“是我自己要來的，我不認識佔中的誰，沒有人讓我來。”他在佔中區住帳篷一個月從來沒有洗個熱水澡，只是

到附近洗手間用涼水擦擦身子。他說自己腰背部不適，實在不行的話要回澳洲看病治療一段時間，然後再來香港。記者邀請這位元內心充滿熱血的老人到自己旅店的房間洗浴，他客氣的拒絕了，他說這裏很多人都是這樣。



圖片：黃文特製了自己的襯衣，上面記錄了自己參與佔中的日子。王寧攝影

莫紹文先生是個佔中非常響亮的名字。因為他絕食已經超過了一個月，而且他以前時有血糖高和其它病變。他97年從新西蘭移民回了自己的老國家- 香港，在港從事測量師和環保性的工作。11月1日他對記者說：“就是所有人離開佔中我也不走，他們走了，我就到政府那邊繼續絕食。哪天我倒了住醫院，能站起來我就回來繼續絕食。”在9月28日釋放催淚彈的夜裏，莫紹文在催淚彈的煙霧中跪下要員警不要再摧殘孩子們了。次日香港頭份大報《蘋果日報》頭版頭條是他跪在催淚彈煙霧中的大照片。本記者給他端去了一盆鮮活的竹子盆景，但是沒有來得及寫條幅：我愛滿月寶寶，莫先生說他會寫的。



圖片：最近10天左右，莫紹文天天清晨坐在香港政府公務員上班必經的地方向所有來上班的政府工作人員和官員點頭問：“早上好！”記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者在莫紹文附近觀看，有超過70%的公務員以不同的方式回敬莫紹文，有的直接從懷中小心翼翼的向他伸出拇指，有的緊閉雙唇反復點頭，有的招手。王寧攝影

有市民給金鐘佔中區捐獻了一間可以容納50人的教室，並備有利用太陽能等節能的燈具。一個凌晨，一位從事父輩傳下來髮型技術的美髮師蔣先生坐在了記者的對面。他說：“我現在每天回店裏兩三個小時就又來佔中了。他們都是我的老顧客，現在是特別時期，他們用電話預約好，我回去集中給他們搞好髮型，夠我最基本的生活就好了。他們（顧客）知道我現在在佔中，沒有多少錢，就主動多給我。他們也支持佔中。”他還說：“我在將軍澳開了髮型店，叫Total Tseung Hair Stylist。我在家裏看到佔中的新聞就心慌坐不住，所以我就來了，關了店。其實我不支持佔中，也不支持反佔中，我就是想要香港好。就是很簡單，香港是我家，我就是要我家好我就來佔中了。”這位從小輟學而從父學習美髮技術的年輕人說的很實在和清晰：“我是喜歡麵包，也要有理想。我要把麵包和理想平衡一些。活著肯定要有理想的嘛。”



圖片：蔣先生帶著一大箱各種美髮書籍雜誌和一箱做髮型用的工具一同來佔中。王寧攝

澳洲原著民佔國會廣場43年

1972年元月26日是澳大利亞國慶日。原著民阿伯吉尼亞人的四子發起了佔領澳洲國會廣

場的運動。他們反對白澳當局一項惡法，就是將原著民的土地強行收回國有，並要開採那裏地下礦物搞錢。這個佔領運動一下子獲得了全澳原著民的廣泛支持，從首都坎培拉開始，蔓延到西澳的伯斯、昆士蘭州、墨爾本的維多利亞州和悉尼的西南威爾士州等全國。全國媒體給予了全面的報導和評論。直到近43年後的今天。這個佔領運動還在進行中，昔日的佔領發起人已經年近古稀，他們的兒子，甚至孫輩也開始傳承他們祖父輩的維權運動。澳洲國會由舊的變成了新的，也搬了家，但是老國會廣場的佔領運動還在進行中。幾年前，在陸克文 Kevin Rudd 任澳洲總理時實現了澳大利亞政府第一次向阿伯吉尼亞人正式的道歉，這個道歉的獲得，也和他們阿伯吉尼亞人自己維權佔領國會廣場40多年的運動分不開的。



圖片：1972年1月26日開始佔領澳洲國會綠色廣場的阿伯吉尼亞人三子和員警。(阿伯吉尼亞網站圖片)

我在香港購置了一個家

終於在香港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而且不貴，還在金鐘一帶香港的心臟地帶，好極了。這要感謝佔中運動，不然哪有那麼容易在地皮超昂貴的香港購置一個家呢。我新家的地域實行按需分配，礦泉水、食品等均無需鈔票，水電費還全免。似親人般的鄰居都是知音，大家心照不宣的悉心互相關照著，天下哪有這樣理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想的樂園呢。我太幸運了。



圖片：在金鐘搭建新家。鄰居女生指導搭建並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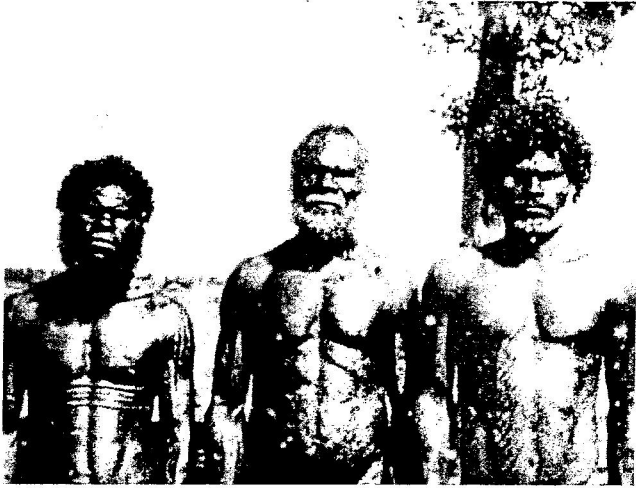
圖片：香港新家（最靠近橘黃色藍邊）和鄰居在10月28日香港的民主朝霞映照下。王寧攝影

(博訊北京時間2014年11月04日 首發)

<http://www.boxun.com/news/gb/taiwan/2014/11/201411040605.shtml#.VLyTG9eSySo>

澳大利亞原著民國會前佔領維權40年(轉載)

王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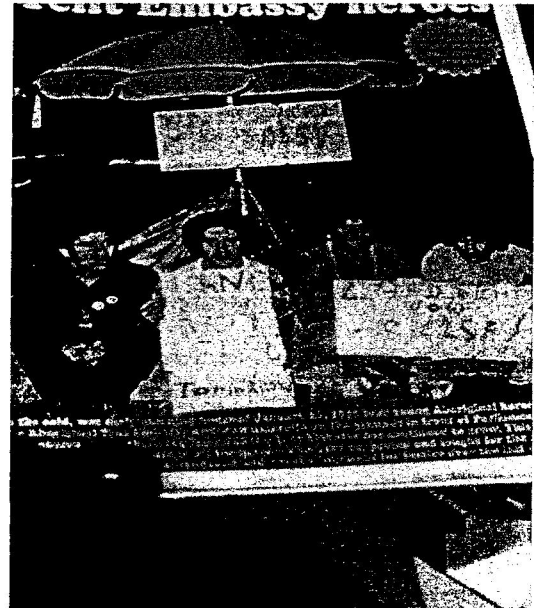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亞是個聯邦類型的英國殖民地國家。國家元首是英國國王或者女王任命的代理人，而中央政府或者各個州政府的行政運作是靠以國家總理或者州政府總理（州長）來完成的。國家有全國性的法律，而各個州也有自己地方性的法律。澳洲有自己憲法性的法律，而這個所謂的憲法對原著民的定位沒有足夠的描述，這是昨天記者助理在“阿波吉尼人帳篷大使館”區請願抗議運動持續40年的現場採訪了一位帳篷大使館的大使瑞徹先生Jason Ritchie所獲得到的言論。瑞徹說：“我們要建立自己的政府才有結果。”

1972年元月26日是澳大利亞的國慶日，那天，四位阿波吉尼族的青年小夥子在當時的澳洲國會大廈廣場前開始安營紮寨，抗議他們的土地和其它很多權利被殖民者給剝奪了，強烈要求返還原著民的權利。這個被稱為“阿波吉尼人帳篷大使館Aboriginal Tent Embassy”的和平請願抗議行動一晃已經是40年零一個月又3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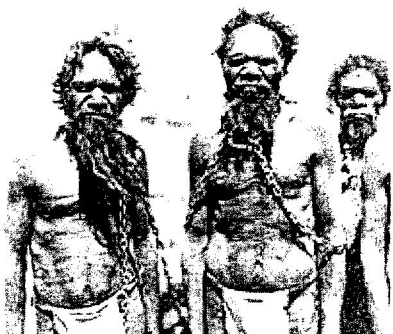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他們日夜守候在原國會大廈前的廣場上，心中維權的信念一直沒有動搖過。目前使用的國會大廈是1998年5月9日由英國女王揭幕開始運營的。瑞徹向記者助理侃侃而談。他說40年來當局沒有關心他們（阿波吉尼人）的訴求，只有陸克文當總理時給予原著民第一次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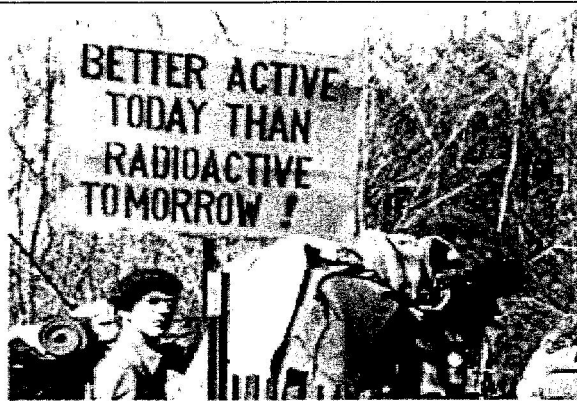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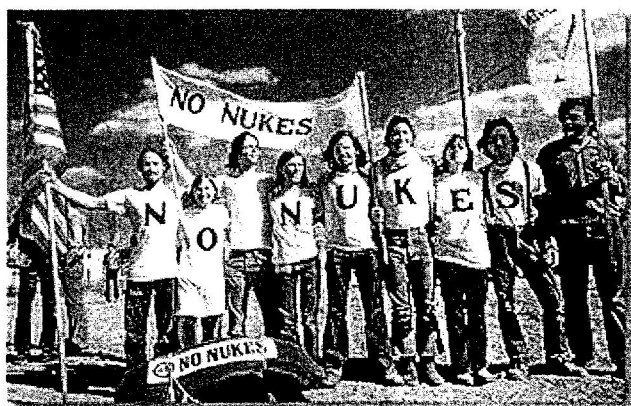


圖片：1972年元月26日，被原著民阿波吉尼族稱謂“四君子”和“四英雄”的漢子率先開始了佔領國會廣場的行動，至今已經40多年了。他們的行動已經成為全國性的運動，而佔領者已經擴大到了全國範圍內來的聲援者源源不斷地在那裏持續的佔領維權。這也是澳洲民主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民主維權運動。當時四君子只是支了把雨傘就開始了他們晝夜維權的行動。瑞徹大使給的《原著民時報》資料圖片。

瑞撤大使告訴博訊：“我們爭取今年5月份聯合國授予我們所有的權利。我們要有自己的政府。”他回答記者助理說澳洲國會中沒有給原著民留有固定的席位，由於原著民居住的很分散，又多在鄉村，所以十分罕見原著民能被選入國會。而新西蘭國會則給原著民毛利人留有固定的5個席位。



記者在2009年見到美國白宮前有頂帳篷，那裏住著一位60歲左右的婦女，她對博訊記者說：“我1982年開始來白宮抗議擁有原子武器。什麼時候宣佈了無核，我就結束在這裏抗議。”她也是晝夜不停的在那裏佔領抗議了30年了，那裏已經就是她的家了。



圖片：佔領維權40年的帳篷大使館區域的中央點了永不熄滅的火。英文字意思是：主權。
龍元攝影

記者想到，西藏人或者蒙古人或者東土耳其斯坦人（維吾爾族）在自己的家根本別想著什麼佔領維權，只有用自己血肉的身軀來焚燒這個唯一的抗議的方式了。就是自焚抗議行動也要被當局開槍掃射！想一想是多麼的殘忍至極！（博訊2012年02月29日發表）

（原文網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12/02/201202292240.shtml>）

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何以慘敗？

軍行

台灣2014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又稱九合一選舉，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選舉，於11月29日舉行，共有9項選舉同時進行，包括6個直轄市長、直轄市議長、縣市長、鄉鎮市長等。其中焦點集中在台北、新北、桃園、台中、高雄及台南的「六都」市長選舉。在選前，連戰、馬英九等都全力出動為連戰兒子連勝文拉票，選前幾乎所有民意調查都顯示，連勝文大大落後於宣稱無黨派的柯文哲，已由選舉結果證實，六都市長有五都的國民黨參選人均告落敗，只有新北市的朱立倫勝出，其餘五都市長的其中4都市長由民進黨人奪得。原本藍營控制的15個縣市輸掉了9個，全部22縣市綠營總共贏了13個。

這是國民黨有史以來最大、最具毀滅性的一次敗仗，是全面性慘敗(台灣資深政論家南方朔評語)。

國民黨這次慘敗，並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在馬英九的領導下施政無能，而且妄作妄為，錯誤迭出。他偏向於親中靠中，在去年的兩岸服貿協議簽署的黑箱作業，和興建第四核能發電廠兩件事都遭到台灣人民，尤其是大學生的激烈反對，催生出太陽花學運而被迫取消建廠，已經盡露出國民黨施政的錯誤無能，它的經濟政策使得台灣的就業、出口、勞資所得都在倒退，現在已退回到16年前的水平，大失民望；嗣後揭發的頂新公司製造黑心餛飩等食物安全上監管不力，使民眾受害，更是民憤沸騰，怨聲載道，民眾對國民黨管治的不滿情緒高漲。這可從以下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出來：台灣一間民調機構在九合一選舉時訪問一

千名年滿二十歲的民眾，有逾六成七受訪者不信任馬英九，僅有不足一成九人信任他；不滿意其執政表現的更高達七成八，創馬英九二〇〇八年就任總統以來的新高。大選後，近五成三人對民進黨給予正面評價，創八年新高記錄。(引自12月12日《頭條日報》)。

國民黨候選人慘敗後，黨魁馬英九被迫辭總統職，副總統吳敦義、郝龍斌、行政院長江宜樺及81位政務官等都宣佈辭職，以對敗選扛責。但接任的人能否挽回頹勢，却大有疑問。

北京當局近年來對港高度自治的毀謗背信，推行8.31的決定，引發佔領運動，使台灣同胞對大陸產生恐懼，打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這種恐懼感，對國民黨的兩岸政策產生疑慮，幫助了綠營的重新得勢，增加民進黨在2016年競選總統的影響力，有可能重新上台。

對於這種發展趨勢，北京方面自有反應。據《環球時報》報道，曾先後擔任解放軍七大軍區中的瀋陽軍區和蘭州軍區司令及軍事科學院院長而在1999年退役的劉精松，在國民黨大敗後的2015年環球時報年會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台灣問題不應久拖不決，必要時將依法用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詳見12月7日《明報》)這種威嚇難以改變台灣政局的發展，却會增加台灣人民的反感的。

2014年12月15日

黨大於法的「依法治國」及其惡果

張開

人治而不是法治

中國共產黨在今年10月23日至26日，召開了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的法治體系，成為法治國家，強調這就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從而把法治繼續受中共控制，使中共的權力凌駕於法治之上。

中國憲法第五條有關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應落實到軍隊國家化。現在的《決定》重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強調「人民軍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即繼續由「黨指揮槍」，就可以不遵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不落實到軍隊國家化，而只執行中共的政治任務了。這明顯是公然違憲的決定。

中國著名憲政學者，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正確地指出：「黨如果堅持領導一切，最後肯定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要真正依憲治國，還是要回到1987年趙紫陽做的中共十三大報告，那就是要求『黨政分離』」（引自12月4日《明報》）。中共現時的決定，恰恰是背道而馳的開倒車！

根據長期以來的無數事實顯示，從中共中央高層到地方各級官員，都掌握了無上大權，儼然以「我就是法律」自居；今天錢權結合，更可以有法不依，任意妄為，知法犯法，無法無天，騎在人民頭上，人民被剝奪了應有的法定權利，受不到法律的保護，民主人權全被剝奪。

最明顯的事例，是無數不同意見者或維權人士、律師等，都動輒被扣上「尋釁滋事」、「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煽動及分裂國家」、「危害及意圖顛覆國家政權」、「外國間諜」等莫須有罪名，被拘禁及刑訊逼供，無辜判入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冤獄，在獄中大受虐待，比如最近揭露出的維權律師高智晟在獄中的食物一天只有一片白菜和一個饅頭，無數無辜者在黑獄中受盡苦難，許多人更被處死。據統計，至今仍有逾百名異見人士在監獄中。無數人在刑期滿出獄後仍被軟禁而失去自由。

關於黨大於法、黨權凌駕於人民頭上的禍害，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原全國政協常委胡德平今年11月6日在深圳參加大梅沙論壇時即指出：「若中共奪取政權後仍不受法律約束，則可令全體人民受其迫害。」「如果現在的人民民主專政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只能是人民受到另一部分人民的專政，全體人民也會受到自己專政的迫害。」（引自11月13日《明報》）

至於中國民間對中共「權大於法」的意見，10月31日《文匯報》的以下報道頗有代表性。該報以《報告稱七成農民認為「權錢大於法」》為標題，從武漢報道：「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昨日在湖北武漢發佈《中國農民狀況發展報告·政治卷》。報告顯示，七成農民認為社會中存在『權大於法』、『錢大於法』的現象，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表示懷疑，因而部分農民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選擇訴諸暴力，農村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

《文匯報》同時指明；該報告是根據「內地31個省份4,126位受訪農民」作出的。由此可見持有類似意見的農民相當普遍。

激發群體性抗爭

關於農民和工人、民眾們對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激發的群體性事件，從四中全會召開前12日起，至本文完稿時，兩個多月期間，僅從報章上披露出來的，便有如下許多宗：

10月11日，貴州省三穗縣有上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當局以「合併建市」為由，低價收

購土地，但却在最後關頭改變為興建行政中心。民眾不但上街集會示威，更發動學生罷課、罷工、罷市、的士罷駛，包圍縣政府。當局出動逾千特警鎮壓，大批民眾受傷，傳最少一名學生被打死。後來，三穗縣當局宣佈暫緩三縣合併建市的方案。

10月14日，昆明晉寧縣村民為抗擊當局強徵大片土地，與上千名武警和官方僱傭的黑社會成員發生激烈衝突，雙方死傷慘重，包括8人死亡，18人受傷，是近兩年的第三宗流血衝突。貪官強徵土地非法倒賣，官民衝突由來已久，村民持續維權近兩年。

10月15日，數以千計廣州的士發動大罷工，以行動表示長期受壓的不滿。的士行業20年沒加價，政府又每年濫發牌照，業務越來越難做。

10月31日傍晚，廣西防城港東興市公安緝私隊撞倒電單車司機後拒絕施救助，引發上萬民眾與警方衝突，趕來現場的9輛警車全被民眾掀翻，有的被燒毀，事件持續5小時。

11月1日，上海浦東新區四千民眾，一連兩日示威，抗議當局將電池廠項目遷入當地，擔心會造成污染影響居民健康。示威市民打出「電池廠滾出泥城」等橫幅標語。當局被迫發出「緊急通知」，稱有關項目取消審批。這已是上海兩年內因民眾抗議被叫停的第三間電池廠。此外，今年內地已有四次民眾反污染的示威，後來都迫得政府取消項目。

11月17日，黑龍江省肇東市(縣級)前天發生八千名中小學老師大規模罷課事件，此前全市教師曾經致函相關部門，要求解決工資低、剋扣養老保險等問題。教師們稱，他們所在的肇東縣名列全國經濟「百強縣」，但他們的工資比鄰近縣級市低幾百元。

11月18日，海南海口市三江縣發生暴動，全鎮逾萬人罷工罷市，抗議政府在鎮上建麻風病醫院，縱火及推翻20多輛公務車，與逾千警察爆發激烈衝突。事發後，海口市政府要求項目立即停工，事態才獲控制。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11月21日，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首陽鎮南坡村，當地政府出動上千名警員及打手進村暴力強徵土地，導致20餘村民受傷。

12月4日是中國定為首個「憲法日」，有成千上萬公民權被侵害者聚集北京見證憲法日，其中更有6名蒙冤警察在中南海附近服毒，冒死諫言習主席，「以死報效國家憲法日！」這些都是對中共違憲行為的諷刺和抗議。有網民上網說：「想要尊重憲法，先要懲治違憲。」

12月11日，江西省貴溪市石泉金家村200村民遊行示威，抗議貴溪市政府強收該村的2500畝土地，但遭大批警察鎮壓。

12月13日，廣東深圳寶安縣台資良維科技公司逾千工人於數日前發起罷工，抗議工資低、福利差，以及公司私自調班，扣減加班費，多日未復工。

12月22日，河南固始縣近千名教師罷工，原因是加薪承諾沒兌現，每月還扣掉18%。

12月16日，「無國界記者」發布2014年度報告顯示，中國內地依然是全球囚禁記者和網絡媒體人最多的國家，在新聞自由和記者境遇方面變得更差。這表明新聞工作者沒有憲法所規定的自由權利，不能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

由於民眾的怨憤積累已很深重，即使遇有次要事故，也會爆發集體行動。上引事例，只是這短期間內透露出境外在報章上所見到的，相信還有許多集體抗爭行動經已發生。今天的中國統治者正在收緊自由尺度，加強壓迫。但是有壓迫就有反抗，而壓力越大，抵抗力也越大，這是古今中外屢見不爽的社會運動規律，現時的中國也不會有例外！

2014年12月23日

內陸興建核電決不可行

破謎

中國除新疆、內蒙古、青海、西藏等7個邊遠省份外，所有內陸省份均已部署核電站（總共26座，其中長江沿岸有22座），日本福島核事故使這些項目審批在“十二五”期間擱淺，中國核電發展也從之前的追求規模與速度轉向安全與品質。但是，核電企業不斷鼓吹重啟內陸核電，甚至製造“國家既定戰略方針”的輿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王亦楠撰文反駁，再掀起新一輪爭論。2014年4月14日，王亦楠在《中國能源報》刊文，認為核電不應該是中國能源結構轉型的戰略選擇，更不應該冒巨大風險發展根本不適於中國國情的內陸核電。同年6月份，王亦楠在南方週末做了《核電不是“必要的惡魔”》訪談，8月份在《中國經濟週刊》上又發表文章《我為什麼不贊成重啟內陸核電》，以及隨後鳳凰財經的訪談《對於內陸核電輿論，我感到非常震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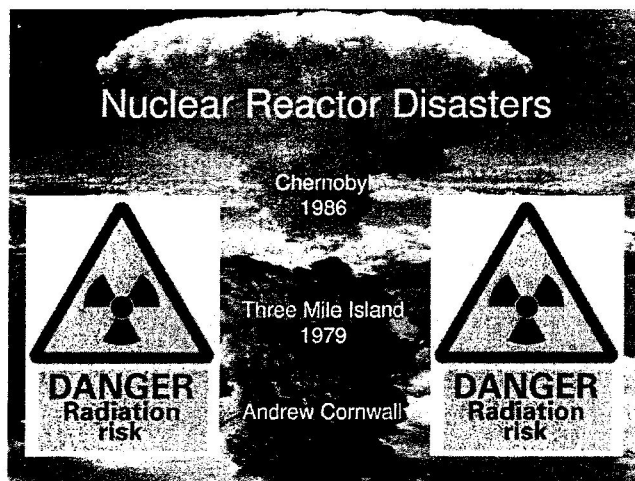
2012年10月24日，溫家寶總理批准《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11-2020年）》明確指出“十二五”時期只在沿海安排少數經過充分論證的核電專案廠址，不安排內陸核電專案。

王亦楠指出，發達國家經過五六十年的實踐，得到四個經驗教訓：一是現階段的核裂變技術水準還未能做到核電“已經安全可控”，二是核廢料的處理已經成為全世界無法擺脫的危險重負，三是核電站退役週期漫長且成本非常昂貴，四是發達國家內陸核電因為缺少冷卻水已經出現了運行困難的情況，所以前景黯淡。

在2013年國際清潔能源論壇上，核電界資深專家、原核工業部副部長李玉侖博士作特別報告《中國核電發展及其安全風險對策研究》，特別強調國際上對核電的科學定位是“低碳能源”，而絕非“清潔能源”。再者，李玉侖製作核能裂變開發利用示意圖和核電閉式燃料迴圈主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要環節的風險示意圖，說明核電站即使反應堆不發生重大核事故，乏燃料後處理、反應堆退役和高放廢物的處置也是有很大安全風險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的。



國際核電災難案例

根據日本東電公司提供的資料和圖表，福島核電廠房已經全部被污水佔據，到2020年即福島事故九年之後，才有可能有辦法接近反應堆，目前無法接近放射性污染機房，無法取出熔毀脫落的堆芯，除了不斷注水冷卻反應堆，別無它法。現有的機器人技術不能勝任在核事故現場高溫高濕高輻射下的廢墟瓦礫上操作。日本已向全世界進行求助、徵集解決方案，但至今無解救方法。

日本共同社5月23日報導：日本法院判“禁止重啟核電”，以“抗震結構存在缺陷”為由勒令目前正接受定期檢查的關西電力公司2個核電機組不許重啟。這是福島核事故後首個判定核電機組不得重啟的判決。審判長樋口英明批評大阪核電站的安全技術和設備“沒有確切證據，僅憑樂觀的預想構成，十分脆弱”。他表示，“既然存在危險性，當然應該停止運轉”。

2014年5月份《科學世界》雜誌做了專題《福島核事故1000天》，來自日本幾十頁的資料圖文並茂，日本東電公司表示，“日本福島事故已經陷入一場終點遙遠的馬拉松”。儘管日本政府和東電公司千方百計，但仍舊無法阻止核污水以每天四百噸的速度激增，到2014年4月份時廠區和機房核污水量已高達52萬噸，電站已經堆滿了核污水儲藏罐，不得不排向大海。日本東電公司預期處理核事故的核心工作至少要到2045年才可能完成，電站報廢至少要等到2050年以後。東電公司不得不坦承“今後任重而道遠，將是一場終點遙遠的馬拉松”。



切爾諾貝利事故20周年時，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承認“這場事故是壓倒蘇聯的最後一棵稻草，民眾對政府產生了極度不信任感和幻滅感”。烏克蘭仍然無法擺脫核事故的夢魘：一個方圓30公里、總面積約3000平方公里的無人區，當年的石棺已無法阻止核污水流入湖泊，烏克蘭不得不斥鉅資集全世界之力，設計建造巨大拱頂來包裹石棺。而要讓這座災難遺址真正安全，工程人員預計至少需要100年時間。在此期間，如何防止放射性物質滲入地下水、危及基輔300萬居民的供水，始終是懸在烏克蘭政府頭上的利劍。

1979年美國三哩島事故導致20萬人在驚恐不安中大撤離，卡特總統視察事故現場時宣佈“美國不會再建核電站”。其後30多年時間裡，儘管美國幾度經濟低迷和能源緊張，但從未啟動新的核電站建設。這個僅為5級、堆芯僅是部分熔毀的核事故已經讓美國人深受傷害：三哩島事故耗時11年才完成燃料碎屑的回收，而損毀的機房在去除放射性物質後被封鎖起來，至今還處於嚴密監控之中，拆除時間未定。

2014年年2月14日美國位於地下655米深處的軍用中低放核廢料儲藏室發生嚴重的洩漏事故。因許多存放缺乏燃料的冷卻池已飽和，存在比福島核電站更大的火災隱患，美國核管理委員會決定“新核電站無法獲得許可，現有的許可也不能更新，直到美國想出處理核廢料的辦法”。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核廢料的安全處置，而天價處理費用，已經成為全世界的負擔。美國和日本的高放廢物處置計劃分別耗資575億美元和3萬億日元。而美國尤卡山地下永久處置庫工程在2010年累計燒錢高達400億美元後正式中止。

一直以來擁護核能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福島核事故後感言：“即使是日本這樣的高科技國家，都無法避免核電風險。如果政治家有這個認知，就該負起責任。”並毅然決定“2022年前德國全面棄核”，雖然“棄核”後電價暴漲，然而大部分德國民眾仍鼎力支持，因為“不想留下核廢料給小孩，不想讓後代再面對核電廠的風險”，同時開始以可再生能源為核心的能源大轉型。義大利、瑞士隨後也決定棄核。法國總統奧朗德明確表示，不希望法國繼續保持對核電的依賴，承諾在2025年前將法國核電比重從75%降到50%。瑞典最新民意調查顯示，50%以上民眾對核電持懷疑態度、希望淘汰這種有爭議的能源，瑞典正考慮效仿德國、瑞士和義大利，逐步取締核電。

荷蘭多德瓦德核電站1997年關停，要到2047年才能完成退役。原來人們估計一座核電站的退役資金只占最初投資的10%~15%，而法國佈雷尼力核電站退役金從2001年占最初投資的26%升至2008年的59%，總金額超過原始預算的20倍，且還在上漲。俄羅斯僅為5兆瓦的奧布寧斯克核電站從2002年開始退役，目前仍在進行中，僅2008年卸載核燃料、2013年拆卸廠房和設備就耗資人民幣8970萬元，相當於核電站投資成本至少要增加1.8萬元/千瓦。

目前全世界443座核反應爐已積累36萬噸致命的高放射性核廢料（致命放射性污染可持續10萬年以上），而且還在以每年1.2萬噸的速度增長。可惜，目前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找到了絕對安全、永久處理高放射性核廢料的方法，核廢料洩漏事故更是時有發生。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個國家的138座核反應爐已關閉，但目前只有17座核反應爐的退役工作徹底完成，而未來10年全世界還將有80個民用核反應爐面臨關閉。所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說：“數目不斷增長的到期核反應爐的退役問題，正成為令全世界擔憂的問題。”

跨國科學家團隊耗時10年對這些內陸核電的運行情況進行跟蹤調查，於2012年6月發表了研究報告《核電、火電面臨氣候變化的風險研究》，指出“在氣候變暖趨勢下，缺少冷卻水正成為歐美在運核電站的嚴重約束。2003—2009年的夏季，歐美多個內陸核電廠出現了因為缺少冷卻水而被迫停運的狀況”，該報告同時預測“因為冷卻水的缺乏，2030—2060年核電和火力發電能力將在美國下降4%~16%、在歐洲下降6%~19%”，並特別強調“嚴重的水資源約束使內陸核電難以持續發展，建設新的核電廠時，選址放在海邊是應對氣候變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

核電產業隱藏巨大風險

核廢料處理已成為中國核電產業最薄弱的環節。因為在運機組數量較少且絕大部分投運時間不長，所以當前核廢料數量有限。但是在建的29台機組2020年全部投入運行後，乏燃料處理壓力將馬上凸顯出來，大亞灣核電站到2018年就將面臨乏燃料無法外運的難題。根據中國核能協會的資料，現有48台機組將使中國2020年乏燃料數量累計達到1萬噸，並以每年1200噸的速度繼續增加，而中國乏燃料運輸能力僅為每年需求量的16%。雖然中國計劃2030年建設一個年處理能力800噸的核廢料儲藏水池，但這遠遠不能滿足需要。

美國、日本、法國、德國、瑞典、瑞士於2009年聯合進行的大規模核電廠事故調查顯示，人為因素失誤造成的核電廠事故占比平均超過60%，最高則達85%。法國原子能委員會和核安全局反復強調：“技術進步固然重要，但杜絕人為操作隱患更是核電安全的關鍵。”所以法國核安全局每年對大型核用戶的700~800次核查中，除了涉及核電站的設計、設備，更重要的是檢查評估核電運營商的組織管理、操作程式等反映核安全文化水準的指標。

與國際水準相比，中國核電安全監管能力建設嚴重落後：監管人員數量不足且普遍缺乏實際經驗，安全監管經費投入也嚴重不足。根據環保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的資料：1990年中國每個核電機組監管人員33人，達到國際平均水準，但隨後逐年下降，2009年已降至3.8人，僅為國際水準的1/10。2009年中國單台核電機組的監管經費是233萬元人民幣，而法國是983萬美元、日本678萬美元、美國788萬美元。

一個符合條件的核電站主控室操作員通常需要8~10年時間，除參加各種嚴格培訓外，正式上崗前需要3000個小時實踐操作。一台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需要人才上千，如果1年建設10個機組則需要1萬人。目前國內有核電專業的院校僅30來所，每年畢業2000餘人，遠不能滿足需

求，而且專業嚴重不平衡，學核電廠設計的多，學設備製造、工程建設、運行管理的少。據瞭解，中國目前施工力量和人才數量僅夠支撐每年建設4~5個機組。

目前全世界可經濟開採的鈾資源（開採成本低於130美元/公斤）僅夠530座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運行60年，而中國鈾資源情況更不樂觀，已探明的經濟可開採儲量僅供40座核電機組使用60年。目前48台核電機組已經使中國天然鈾資源年需求量的對外依存度超過85%，遠遠超過了當前石油進口依存度和50%這一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雖然利用海外鈾資源發展本國核電是目前國際通行做法，但在國際鈾資源儲量有限且市場一直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核電規模繼續擴大將使中國的資源能源安全嚴重受制於人。

中國是世界上地震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的地質研究和歷史記載表明，中國是三大板塊交匯地，是世界上地震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20世紀以來共發生6級以上地震近800次，破壞面覆蓋到除浙江、貴州、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我們以占世界7%的國土承受了全球33%的大陸強震，是全球大陸強震最多的國家。福島核事故後，國內外核電專家都認同“日本的地質條件不適合建設核電站”，同理，在地震頻發的中國內陸，核電站也將面臨同樣的危險。很多業內專家現在主張“核電廠選址應該在1000年歷史上沒有4級以上地震的地方”，按此標準，則更沒有適宜建設內陸核電的場址。

中國是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中國人均淡水擁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1/4，近些年旱情範圍和程度愈發加大，江西、湖南、廣西、雲南等多地大旱，很多湖泊出現乾裂。發展內陸核電必須“萬無一失”、“絕對可靠”地保證源源不斷的冷卻水供應（為火力發電站的數倍）。即便停止運行，核能熱量仍然在釋放，仍要不斷注入冷卻水。一旦斷水，就可能發生

福島那樣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幾億人賴以生存的水源。

中國內陸核電廠址的大氣彌散條件與美國差異很大。大氣彌散條件是核電環境影響評估的重要指標之一。美國要求內陸核電廠址年平均風速不能低於3米/秒，靜風頻率僅為1%~2%（即每年無風期僅一周左右），大多數內陸核電廠半徑80公里範圍內人口較少，與中國人口稠密度相差甚遠。根據中國核能行業協會2013年5月發佈的報告《內陸核電廠環境影響的評估》，中國目前選定的17個內陸核電廠址，有11個廠址的年平均風速低於2米/秒（其中包括湖南桃花江和江西彭澤核電站），14個廠址的年靜風頻率高達10%~30%，相當於每年無風期長達37~100天。

小結

中國應該汲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一是現時核裂變技術無法達到“已經安全可控”的水準，二是難以處理核廢料，三是核電站退役成本昂貴，四是內陸缺少冷卻水。再者，中國缺乏核電專業人才、過度依賴進口鈾資源、地震頻發、水資源匱乏等，因此，絕對不應該發展核電，可惜，國內核電企業及擁核的專家學者為了一己私利，妄顧公眾安全與生態環境，不斷鼓吹重啟內陸核電，有識之士與普羅大眾務必對其群起而攻之。

資料來源:

- (1) ‘核電不是“必要的惡魔”——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亦楠’，《南方週末》，2014-06-20。
- (2) “我為什麼不贊成重啟內陸核電”，《中國經濟週刊》，2014-08-12。
- (3) “不應發展內陸核電而要靠‘水’”，《中國經濟新聞網》，2014-09-26。
- (4) “提振經濟和治理污染：靠‘核’還是靠‘水’？”，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2014-09-20。

中國耕地退化

青岩

耕地質量下降

根據中國農業部發佈的《全國耕地品質等級情況公報》(以下簡稱《公報》),中國現有耕地中,中低產田佔耕地總面積的70%,耕地退化面積佔耕地總面積的40%以上,南方土壤酸化,華北平原耕層變淺,西北地方耕地鹽漬化、沙化問題也很突出;全國耕地土壤點位污染超標率達到19.4%,南方地表水富營養化和北方地下水硝酸鹽污染,西北等地農膜殘留較多。

《公報》把全國耕地按品質等級由高到低依次劃分為一至十等。其中,評價為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積為4.98億畝,佔耕地總面積的27.3%;四至六等的耕地面積為8.18億畝,佔耕地總面積的44.8%;評價為七至十等的耕地面積為5.10億畝,佔耕地總面積的27.9%。

農業部耕地品質建設與管理專家指導組研究員徐明崗指出,“這些年來,我國農業生產一直堅持高投入、高產出模式,耕地長期高強度、超負荷利用,耕地品質呈現出‘三大’‘三低’態勢。‘三大’指中低產田比例大、耕地品質退化面積大、污染耕地面積大;‘三低’指的是有機質含量低、補充耕地等級低、基礎地力低。”

農業部種植業管理司司長曾衍德認為,必須加強耕地品質保護與提升的思路目標、技術路徑及重點措施,夯實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

“當前,我國糧食連年增產、高位護盤極為艱難,各種資源要素繃得很緊,保護與提升耕地品質十分緊迫。”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指出,國際公認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每公頃225千克,但目前中國農用化肥每公頃面積平均施用量超過400千克,是安全上限的1.93倍。“一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方面是化肥使用量大,另一方面是化肥的利用率低,肥料沒吸收,都變成了污染。”同時,中國工廠化養殖動物每年產生大量動物肥料,但因養殖業與種植業分離等原因,這些本可成為很好肥料的動物肥料並未用到應該用的地方。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張曉山指出,目前,中國化肥使用量約佔世界的三分之一,化肥利用率僅為33%,農藥利用率為35%左右,年使用地膜約130萬噸,回收率不足60%,年產生畜禽糞污約38億噸,有效處理率僅為42%;農業年均缺水約300億立方米;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係數僅為0.52,低於發達國家約20個百分點。“我們不能再靠透支環境,超標使用化肥農藥,來換取農業產出。農業同樣有個產業轉型升級的問題,農業發展方式必須轉變。”



東北肥沃黑土層

根據香港《南華早報》12月9日報導,過量施用化肥正嚴重威脅東北地區的農作物種植,該地區是中國最重要的產糧區之一。東北肥沃黑土層有機質正遭破壞,且厚度以每年1釐米的速度退化。“形成1米厚的黑土層需3億年,而現在的退化速度是1年1釐米”,瀋陽農業大

學教授陳溫福說，“如果再不注意提高耕地品質，農業可持續發展將受嚴重威脅。”

土地退化和基礎設施落後都在制約東北糧食增產。該地區由黑吉遼三省組成，佔內地耕地面積的16%、糧食總產量的20%。肥沃的東北黑土層含有3%至10%的有機質，是種植大米和玉米等農作物的理想土壤。

陳教授表示，過去幾十年來過量施用化肥意味著，吉林黑土地的土壤有機質含量已從建國初期的8%下降到如今的不足2%，黑龍江的農村土壤也已出現同樣問題。土壤肥沃程度會因單一作物種植、在同一塊地上連年種植一兩種作物以及過量施用化肥而退化。年久失修的灌溉設施和乏善可陳的防洪設施，也令當地更易遭受導致糧食減產的自然災害。

“藏糧於地”

曾衍德提出，“在耕地數量不足的情況下，品質就尤為重要，加強耕地土壤品質培育，不斷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已成為我國發展農業生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最根本辦法。”，“如果把農田基礎設施比喻成人體的骨骼，那麼基礎地力就是血肉。必須加強耕地品質保護與提升，努力做到‘兩提一改’，才能實現藏糧於地。”

曾衍德分析，“兩提”正是要提高田間設施水準和耕地基礎地力，要按照《全國高標準農田建設總體規劃》要求，確保到2020年建成8億畝集中連片、旱澇保收的高標準農田，耕地基礎地力提高0.5個等級，土壤有機質含量提高0.5個百分點。“一改”就是改善耕地品質環境，推動開展耕地品質修復和污染綜合治理，力爭到2020年，畜禽糞便等有機肥資源利用率提高20個百分點，秸稈還田、殘膜回收達到80%，實現化肥、農藥用量零增長，耕地酸化、鹽漬化等問題得到有效控制。

農業部種植業司副司長何才文分析，“《公報》統計也顯示，高等級耕地佔耕地總面積的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27.3%，基礎地力較高，要用養結合；低等級耕地佔27.9%，生產障礙因素突出，短時間內較難得到根本改善；佔全國耕地總面積44.8%的中等級耕地，正是未來的潛力股。”，中等級耕地所處環境氣候條件基本適宜，農田基礎設施建設條件較好，障礙因素不明顯。到2020年，按照耕地基礎地力平均提高1個等級測算，可實現新增糧食綜合生產能力1600億斤以上。

專家指出，除了提高耕地品質的措施，保護耕地品質的制度性安排也需進一步完善。目前，在國家層面還沒有專門的耕地品質保護法律法規，現有法律法規在耕地品質保護上缺乏“硬杠杠”。

中国土壤污染状况

中国政府公布的一份公报显示，中国土壤污染范围较大。其中一些数据如下：

16.1% 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

中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

83% 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3%；中国土壤中的主要无机污染物为镉、镍、砷这三种重金属

50% 与1986-1990年期间的调查相比，部分地区镉含量增幅达50%

耕地135万平方公里

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

来源：中国环境保护部

《华尔街日报》

資料來源:

- (1)“過量施用化肥正侵蝕東北糧食產區土壤”，香港《南華早報》，2014年12月9日，轉引自人民網-環球時報，2014年12月11日。
- (2) 李慧，中國耕地退化面積超40% 化肥過量使用超標近2倍，《光明日報》，2014年12月22日。

中國能否輸出其生產過剩？

劉山青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考察資本，認為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的不可協調的矛盾。馬克思從而指出，資本以輸出矛盾來解決其國內危機。中國經濟現時的問題正是生產過剩。

1. 1988

一些經歷過89民運的到內地發展的港人表示，他們在1988年體驗了中國的通漲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急速惡化；街上的行人普遍表現煩躁，外來人動輒成為發洩對象，感到自己成了弱勢社群。因之，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動盪前必出現經濟動盪。假若中國的經濟出現倒退，社會動亂可以比香港的雨傘運動嚴重十倍。在中國這種高壓，缺乏透明度的國家，研究其經濟成為研究其政治的入門工具。

2. 《21世紀資本論》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於2013年出版的鉅著《21世紀資本論》在知識份子圈子裡引起廣泛討論。他在書中研究世界範圍的資本與收入比。《21世紀資本論》成為熱賣的一個原因是《中信出版社》在2014年為它出了簡體版。《人民日報》在1月5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不平等 何以成為年度熱詞”的文章。文章借用《21世紀資本論》第三部份的「不平等的結構」為中國經濟發展自圓其說——「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學術專著《21世紀資本論》躋身暢銷書行列，表明西方對自身制度缺陷的關注與思考已形成一種社會思潮。」

3. 《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序言

托馬斯·皮凱蒂在中文版序言中表示中國在80年代推行的累進稅制可以提高制度的透明，因此涉及「稅務，又涉及政治和民主。」「美國-----歐洲----為一小部份經濟和金融精英服務-----中國-----中央統一領導-----和高層----的反腐和公益決心貫徹累進稅制。」

習近平在18屆4中的以法治國的先決條件是一黨專政，與透明化相對立。托馬斯·皮凱蒂企圖以累進稅制為中國資本主義開方，是知識份子的一廂情願。由中央集體發展資本主義是早期資本主義形態。

4. 中國陷入有史以來最嚴峻的通貨緊縮嗎？

《人民日報》在2015年01月05日發表了一篇題為「通縮壓力不得不防」的文章，指出：「工業品出廠價格已連續33個月下降，2015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可能出現負增長。」（這裡是指同比指數，若以扣除通漲的環比指數計，則問題稍為緩和。）

文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1998年至1999年、2002年、2009年出現過三次通縮，主要是受到外部衝擊或突發事件的影響，原因為：1.出口急劇下降，2.內需不足，及3.國內產能過剩。」

因之，文章提出的中國的解決方法為：「-----化解產能過剩-----利用“一帶一路”，更多地運用“轉移”的方法。以高鐵“走出去”為例，就能帶動上游鋼鐵、電子、有色金屬、裝備製造的產能消化。」

文章指出中國解決其產能過剩的方法，除了“輸出”外，第二個方法是擴大內部消費，第三個方法是：「2014年底，國家發改委集中批復了35個基礎設施項目，上萬億元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為24萬億人民幣）

5. 結語

由於中國沒有發展民主，因此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處於很原始的階段。現在，中國資本面對大量的產能過剩，若世界資本出現結構性危機，美國資本的轉移危機的能力必然高於中國。若然，中共的血腥鎮壓手段未必能夠解決大規模的群眾抗爭。

如秋水長天(轉載)

慕容雪村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裏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裏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裏的囚犯，那些風起雲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期專制統治和

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

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于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物件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復的物件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稚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稚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長期的蒙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計程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構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的質疑：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裏？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裏餓死了幾個？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力是為

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臺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毀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佈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裏，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麼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

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不僅適應于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畫，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拼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拼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只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沖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

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原因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蹋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的耳邊，在這裏，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幹活，

他少付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裏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臺，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

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裏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拍的不是地方，仍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遮罩、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遮罩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裏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資訊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裏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裏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

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于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裏，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員警、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升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于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註：慕容雪村是年青作家，1974年出生，山東人，以非虛構小說而著名，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

伊波拉病毒、貧困和種族主義

塔多司·帕托

在最近幾周，德國和英國當局無意中公開了令人難堪的真相：對於他們（和其他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伊波拉病毒不會是一個大問題，但在非洲西部（目前）受感染的國家，出於各種原因，情況則完全不同…

問題

伊波拉病毒並不是新的發現。它被發現於1976年，是以剛果的伊波拉河命名的。它第一次的流行造成約300人死亡。自那時以來，在不同的非洲國家該疾病不斷的爆發，最近的最大爆發出現在2007年的烏干達和民主剛果共和國。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伊波拉病毒基本上不是很成問題的。它只能通過與受感染的人或動物的體液接觸來傳染——例如，它與流感病毒不同，流感可以通過空氣傳染——所以比較容易防範而保護自己。

此外，這種病毒對環境的影響十分敏感，它在體液外立即死亡，並且不能穿透未受傷害的皮膚，只能透過粘膜（即嘴巴、鼻子、眼睛）或通過傷口感染。如果這種病毒具有同流感病毒一樣的傳染性，那麼我們必會有數十萬的病例。

但這種病毒仍然是危險的，因為受感染人口的死亡率很高——根據病毒的基因類型不同，死亡率在50%至80%之間——而且到目前為止，沒有可靠的補救辦法或疫苗接種可用。

其實這種病毒，即所謂的RNA病毒，並不是針對人類“製造”的。沒有細菌、病毒或寄生蟲會以如此高的比例殺死其寄主，而且殺得如此之快——它喜歡成倍繁衍，而不是死亡。病毒因數的原始寄主最有可能是某些種類的蝙蝠，而傳染給人類和像羚羊或猴子之類的某些野生動物，則基本上是一種“意外事故”。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防止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基本上是相當簡單的事。這就是該疾病過去傳播得有限，控制得也相當快速的原因。

傳染病和社會政治狀況

該疾病的爆發，在過去就已經受到較有效的限制，為甚麼這以後伊波拉病毒還會如此迅速地在整個西非地區蔓延呢？有幾個原因，同病毒本身沒有甚麼關係，而同各有關國家的情況大有關係。一般說來，該病在貧窮的（及人口稠密的）國家傳播得更容易、更快速。利比理亞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是174、塞拉里昂是177、幾內亞是178，而尼日利亞的局勢仍然（或多或少）受到控制，它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是153。

首先，醫療基礎設施不很可靠。在1991年至2002年的內戰後，塞拉里昂醫療系統幾乎全部被毀，在該國的一些地區醫療系統根本就不存在。利比理亞的情況也差不多。

其次，人們對於預防措施的某些意見置若罔聞——並非沒有理由。如果你想要阻止消費所謂的叢林肉，即阻止人們食用包括病毒傳播主要媒介蝙蝠在內的野生動物肉，光靠教育和建議不會有任何影響，因為人們沒有負擔得起的替代食品來養活自己。在邊遠地區這種情形尤甚。

第三，在同任何傳染病的鬥爭中，教育水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所有受影響的地區，這個水準是很低的。致使各種各樣的迷信叢生，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迷信毫無意義；在極端糟糕的情況下，那些迷信是危險的。

例如，八月初在尼日利亞，第一個病例（從利比理亞傳到拉各斯）出現後，一個說法通過社交媒體傳播開來，建議人們在鹽水中洗

澡，並且喝鹽水，以此作為防止伊波拉病毒的措施。儘管官方立即予以否認，仍有很多人相信而且照這樣做。其結果是許多人因為嚴重腹瀉而住院，而且至少有一人死亡。

尼日利亞衛生部長丘庫教授的例子則證明，甚至負責官員也受到各種錯誤資訊的影響：他在8月15日公開宣佈，尼日利亞將引入對抗伊波拉病毒的“新藥”。原來，那不過是所謂的“納米銀（NanoSilver）”（尼日利亞新聞的寫法是“NanoSilva”），這種物質，目前用作洗衣機的表面塗層，用作衣服（例如襪子）的添加劑，殺死細菌，對於全身性病毒性疾病的治療，完全沒用。

第四，是 — 在以前背景觀點下的看法 — 很大一部分人們完全不信任當局的公告，而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就像我們剛剛證明的那樣。

第五，由於各種原因，防止疾病進一步傳播的必要措施（即隔離、檢疫、限制流動性），不是可行的或不是充分可行的。除了缺乏基礎設施之外，（已提到過的）令人絕望的衛生設施狀況和普遍的不信任，以及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起了關鍵的作用，特別是在尼日利亞：落實到位以防止病毒傳播的邊界限制，可以通過賄賂繞過去。

第六，在患有某種疾病的人士中，貧窮國家的患者一般有較高的死亡率。一個人是否可以從伊波拉病毒中逃生，這個問題不只取決於這種病毒，最重要的是取決於一個人的免疫系統，也就是取決於個人的抵抗力。例如，想了解一下，塞拉里昂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是48至49歲之間，而嬰兒的死亡率為1000人中夭折159人，事情就變得清楚了，這種病毒在弱勢和營養不良的群體當中特別致命。

種族主義

如果我們考慮所謂的國際社會處理目前伊波拉病毒時疫的方式，一個讓人無法抗拒的種

族主義印象成了中心。對待受感染的外國人不同於對待本地人 — 後者必須留在當地，設備簡陋，並且不被撤離到北美或歐洲的特別治療單位。最近公佈的可用的實驗性療法數量有限，因此要質疑分配的正義 — 如果它們真的有用的話。

不管怎麼說，製藥業有了一個機會。它獲得一個獨特的機會，無須通常的長時間測試程式就能發放一種新的藥物，並對人類開始大規模的實驗；立即開動製藥的機器。這是否有助於抗擊這種病毒，則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幾乎所有（使用中）的抗病毒藥物都有相當潛在的副作用，其次，它不會是第一次（記住圍繞所謂豬流感的醜聞）出現這種情況，即這種戰略引起的傷害多過好處。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有利於利潤！

這同樣適用於一種疫苗的開發，直到現在，開發進展得很慢 — 因為主要目標群體根本沒有償付能力。但現在來自紅十字會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專業救助者國際協會（他們有自己的利益，並不只是唯有人道主義）拉響了警報，捐款正在迅速攀升。

這並不意味著甚麼都不做會更好。但由於上述原因，目前的緊急措施，大批的救助者和流行病學家現在對付這個問題，不會改變任何關於這種災害的情況。因此在該流行病的前前後後，會有更多的人死於簡單、可治癒的疾病、會死於營養不良和衛生條件的缺乏，後果比伊波拉病毒更甚。

注意：無知、饑餓和營養不良比病毒疾病更具致命的劣勢：它們不會傳染，所以也不能通過飛機引入到歐洲或北美。否則，人們對付它們將會像對付目前的伊波拉病毒一樣快速而有效……。

巴勒斯坦陷入屠宰場：以色列最近對加沙的血洗

大衛·芬克爾

以色列將再次襲擊加沙，必會伴有大規模的暴行，對此，從來沒有人有過任何懷疑。因為不一定要服務於任何的戰略利益，而僅僅是因為以色列在被佔領巴勒斯坦領土的殘暴，加沙受到以色列的絞殺，埃及新的軍政權，以及荒謬的“和平進程”最新實習的崩潰，都會不可避免地以某種方式引生一個觸發事件。 [1] 它就這樣發生了，觸機是以色列定居點三名少年的被綁架謀殺事件。但是，即使對於我們這些已經司空見慣見怪不怪的人來說，以色列政府的行為再次觸動了麻木內心的深處。整個對失蹤孩子為期三周的“搜索”是虛假的：政府第一時間就知道了他們已經被害。它以尋找他們為藉口，要粉碎約旦河西岸的哈馬斯，重新拘捕同吉拉德·沙利特交換的前囚犯，癱瘓新的巴勒斯坦團結政府。

由J.J.戈德堡報導的這個故事，發表在美國的猶太報紙‘前進’上 [2] --- 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尋常的事件，因為這份報紙本質上就是新保守主義大廈的一個部分，現在那裡出現了對以色列日益公開的批評。無論是閱讀該文本本身，還是看那些接在它後面的許多讀者的種族主義的惡毒評論，這篇文章都是很重要的。

內塔尼亞胡政權從以色列少年謀殺案取得的政治利益 ---- 同這樣的說法一樣可怕---被消除了，因為巴勒斯坦青年穆罕默德·阿布·胡達伊爾（Mohammad Abu Khdaier）在耶路撒冷被六名以色列人團夥折磨謀殺，還有當時看望他的美國表弟塔里克遭到員警野蠻毆打的視頻出現了。

以色列前情報局長尤瓦爾·迪斯金在一長段臉書（Facebook）上描述了這場災難的真相，J.J.戈德堡引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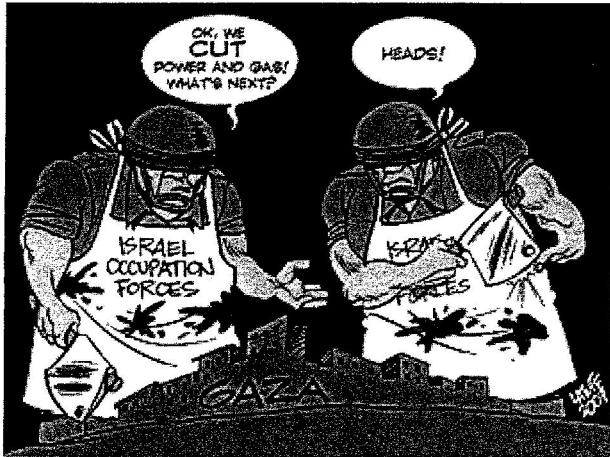
“導致這種惡化情形的，首先是這個幻覺，即認為政府在每一條戰線上的不作為，其實可以凍結形勢，幻覺地認為 “代價標籤” [比較：到處掠奪的以色列定居點團夥---大衛·芬克爾] 只不過是牆壁上的幾句口號，而不是純粹的種族主義，幻想稍微多花點力氣一切都可以解決，幻想巴勒斯坦人會接受在約旦河西岸發生的一切，儘管有憤怒和沮喪以及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巴勒斯坦人也不會做出回應，誤以為國際社會將不會制裁我們，幻想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最終不會因為其問題得不到照顧而上街，還有，幻想以色列民意會繼續容忍政府處理其政策造成的正在惡化的社會差距方面無所作為，而讓腐敗仍然肆無忌憚，等等。” [3]

以抑制哈馬斯的火箭彈為幌子，雖然到目前為止，哈馬斯的火箭彈還沒有打死一個以色列公民，而且也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 還有可能為了應對公開顯示種族滅絕態度的不斷增長的以色列宗派[4] --- 內塔尼亞胡下令發動造成平民喪生的空中進攻，完全可以預見，每天都會有人被打死。[5] 如果這還不夠血淋淋，那麼地面進攻正蓄勢待發[6]。

最近關於以色列擴建定居點的可憐談判崩潰了，而且內塔尼亞胡要求把以色列“視為猶太人國家”，奧巴馬政府對此瞭解得很清楚，但它現在喋喋不休地說以色列有權保衛自己 [7]。對於巴勒斯坦人的自衛權利，他則保持沉默。

鑒於目前巴勒斯坦人陷入屠宰場的情形，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現在重要的是說出 以色列襲擊的真相，特別是通過強大的全球 BDS（杯葛 / 撤資 / 制裁 Boycott/Divestment/Sanctions）的基層運動[8]，提高其政治成本。

巴勒斯坦陷入屠宰場（第二部分）：以色列最近對加沙的血洗 大衛·芬克爾



在是正式的，仿佛它過去一直是不明顯的：以色列正在打擊它的目標，包括幾十個居民區裡的被困家庭，醫院，學校，甚至清真寺以及空投過傳單要加沙居民避難的地方。總理內塔尼亞胡說，襲擊這些地方是因為那裡是哈馬斯掩藏火箭攻擊以色列的地方。

即使這是真的——至少部分可能是這樣的——它也只是把以色列和哈馬斯放在同一個道德水準上，也即他們都漠視平民的生命。這個概念大致標記了自由一點的媒體公司所允許討論的範圍，就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利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湯瑪斯·弗理德曼（Thomas Friedman）和羅傑·科恩（Roger Cohen）講演“極端”分子和壞政治領導雙方彼此是如何相輔相成的那樣。

當然，在美國國會的說法中看不到這種道德上的半斤八兩，在那裡，僵局已經讓位給兩黨在大規模謀殺中的歡樂合謀。參議院，回應先前的眾議院決議，以100票贊成 0 票反對——投出贊同票，包括“進步”的民主黨人和伯尼·桑德斯以及所有其他人——支持以色列的“自衛”，反對“無端挑釁”(!)的火箭攻擊，並要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求解散巴勒斯坦各派系最近組成的團結政府。

隨後，巴芭拉（Barbara Mikulski）的辦公室自豪地宣佈“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巴芭拉·米庫斯基參議員（馬里蘭州）今天宣佈，委員會通過了2015年財政年度（FY）的國防部開支法案，其中包括6.21億美元用於美國和以色列的導彈合作開發專案，比2014財政年度的水準增加了1.17億美元。這包括支援鐵穹導彈防禦系統的3.51億美元，是行政當局2015財政年度預算計劃所要求的2倍。”

我們能夠打破僵局嗎？

不過，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品行上是半斤八兩的，這個論點本身只有在實際生活的災難和歷史環境的抽象中才成立。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暫且從即時頭條新聞上退一步，因為在那裡每一天的暴行會模糊前一天的記憶。不只是美國全力支持的以色列政府有實行屠殺的壓倒性火力和技術優勢。我們必須剖析有關加沙的大謊言，因為這個謊言通過無休止的重複給人洗了腦。比如：“以色列撤出了加沙，搬出了所有的定居點，讓它和平自由地發展，可得到的回報是火箭彈。

事實是，加沙從來沒有過一周的和平。從阿理爾·沙龍的2005年“撤退”的那一天起，以色列飛機就故意飛在空中製造音爆。自2006年起，加沙實際上被以色列封鎖了起來；其港口被禁，大部分的出口受阻，它的漁船無法進入漁場，其人民退到完全依賴聯合國援助的地步。農民在自己邊境附近的土地上耕耘遭槍殺。孩子們遭以色列狙擊手槍擊。有目標的暗殺成了日常生活的一個特色，甚至在“安靜”期也

是如此，更別提2008-2009年和 2012 年以色列軍事入侵的時候了。



在內塔尼亞胡以前很久，號稱聖人的伊扎克·拉賓曾說過，他的願望是“加沙沉入大海”。加沙人民不可饒恕的罪行就在於未能實現這一願望（似乎他們真的能夠選擇）。佔領迫使以色列為其定居者承擔一些最小的社會服務和沉重的安全負擔。單方面“撤軍”讓以色列把佔領變成一種用現代戰爭監控技術進行的中世紀式圍堵。圈押，沒有乾淨的水，擁擠得讓人忍無可忍，加沙今天的生活條件就像非納粹時期那些歐洲的猶太貧民窟一樣糟糕。在以色列的猶太人群內部，公然的種族滅絕態勢正在落實。

在巴勒斯坦社會成功地組織了一個結果令特拉維夫和華盛頓不喜歡但確實是民主的選舉之後，巴勒斯坦社會最終要裁決它自己的領導，是哈馬斯還是腐敗的巴勒斯坦當局，前者為其武裝分子構建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地下管道，卻沒有為保護其人民，後者則勾結以色列和美國中情局策劃了一場未遂政變（2007年）。

裁決很可能是嚴酷的，但事實是，今天，儘管加沙地帶的大多數人遭受令人難以想像的日常慘狀，但如果不啟動解決被圍困者緩慢死亡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亡的方案，他們就不想停止抵抗。哈馬斯要求的停火條件——開放邊界，允許捕魚和商務，釋放數百名囚犯，這些人是以色列用尋找被謀殺以色列少年藉口而重新逮捕的——是完全合理的。

阻攔通向切實可行的休戰之路，是奧巴馬當局的政治和道德上的崩潰。是我們審判“我們自己政府”的領導力，直接面對這一幕所帶來的致命後果的時候了。不可有這樣的幻想，認為現在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會開啟出路，導致一個“兩國方案”或者“單一的民主國家”。除非以色列本身的行為使它對華盛頓而言有比資產更多的戰略義務，除非全球草根階層的憤怒和抵制 / 撤資 / 制裁（Boycott/Divestment/Sanctions）使以色列成為一個國際“無賴國家”，否則沒有解決方案是可能的。

除非發生這種情況，否則巴勒斯坦將成為喬治·奧威爾 1984 年描繪的形象：“如果你想要看到未來，想像一下，一隻腳踩在一張人的臉上——永遠。”



加沙：“我們就是死，都比走回頭路好”

朱利安·薩林穀

有近2000人死亡，超過 10,000 人受傷，400,000人流離失所，成千上萬的建築物受損或被毀...。儘管有“休戰”和其他的“停火”，以色列侵略加沙的後果則越來越多。很簡單，就人和物的代價而言，這是自1967年戰爭以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土最猛烈的攻擊。

目前，焦點集中於正在開羅進行的“談判”，尋求持久的停火。談判能成功嗎？尚遠不能確定。即便成功了，也並沒有真正解決任何問題。

“停火”？

主流政治媒體的說法，嚴重地傾向於以色列的觀點。“敵對行動”被說成了對加沙的轟炸和巴勒斯坦的火箭發射。因此，“危機”的解決需要雙方達成協議以結束爭鬥。然後，西方領導人和媒體可以松一口氣，轉向其他的事件，直到在一兩年後，以色列以火箭彈再度攻擊為由，發動新的軍事行動，然後每個人都會問，為什麼“休戰”並沒有持續下去...

然而，事實很簡單。加沙地帶和它的人民所面臨的首要敵意，是對沿海小飛地的非法和非人道的封鎖，在埃及的共謀下，這個封鎖已經超過8年之久。這種封鎖摧毀了加沙地帶的生活，一個真實的人道主義悲劇對那裡人民的威脅每天都在加大。在2012年發佈的一份聯合國報告指出，到2020年加沙將“不適合人類居住”，因為缺乏基礎設施（至少應再建立800所健康中心，學校的數目則應增加一倍），缺乏必要的資源（在當前的侵略以前，一半的加沙居民無法用到乾淨的水，近80%的人口不得不接受每天僅四個小時的電力供應）。

以色列當前的行動使得情況更糟糕，造成的損傷估計為5億至6億美元(或人均約3000美元)之間。加沙唯一的電廠被摧毀，當局表示，

修復它至少需要一年；數千棟房屋，包括學校、醫院和重要的工業廠房被損壞或摧毀；依賴國際糧食援助的人數上升至超過總人口的75%。根據以色列非政府組織Gisha的說法，如果不撤銷封鎖，特別是由於建材被禁止進入加沙地帶，“那麼，將需要用100 年的時間來重建加沙”；Gisha是一個為加沙爭取貨物和人員自由流動權利的組織。

“我們就是死，都比走回頭路好”

在這種情況下，關於當前的談判，同主流的說法相反，簽署停火協議的巴勒斯坦條件絕對不是“極端的”或“激進的”。事實上，對於這些要求，所有的巴勒斯坦力量之間已經有了共識，其中包括在拉馬拉的非常溫和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在內，後者由馬哈茂德·阿巴斯領導，其“妥協”甚至是“投降”的傾向，太有名了。可是，那些稱讚阿巴斯“溫和”而哈馬斯“激進”的人中，幾乎沒有人指出這點，如果我們並不知道這種談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削弱巴勒斯坦一方的話，對此會感到驚訝的。

那麼，這是些什麼要求呢？解除封鎖，當然，這尤其意味著開放加沙與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邊界、重建加沙港口和機場（它在2000年年底被毀而關閉了），把捕魚區延伸到加沙地帶海岸以外10公里的海域。正如在聯合國工作了8年的律師弗蘭西斯卡·阿爾巴內指出的，“這些要求都不是新的。除其他要求外，聯合國一直要求解除圍困，根據國際法，那是非法的，為了結束加沙地帶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局勢，解除圍困是一個條件。2005 年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之間簽署了進出和流動協議(AMA)，在該協議上已經明確規定，允許西岸

和加沙地帶之間的貨物和人員的流動。甚至建設一個港口和在加沙地帶建機場的可能性也被列入了進出和流動協議（AMA）中，雖然兩者都未落實。目前要求擴大的允許捕漁區，小於1994年奧斯陸協定所劃定的漁區，它已經是2012年停火協議條款的一部分。”

這些要求裡沒有任何“極端的”或“激進的”東西，那只是反映了加沙人民最低的生存要求，是所有國際組織都認為合法的。以色列拒絕聆聽這些條款，再一次表明，佔領軍以其所謂的安全名義拒絕的，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權利（也載明在國際法中）而是其基本需要的滿足：住房、衛生保健、足夠的食物、教育和走動的可能。因此，儘管侵略暴力當前，加沙人民和巴勒斯坦抵抗組織的憤慨，還有飛地人們中越來越普遍的感覺，就如巴勒斯坦人權中心（PCHR）的拉吉·索拉尼（Raji Sourani）指出的那樣：“我們就是死，都比走回頭路好。”

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因此，巴勒斯坦人方面沒有不妥協的餘地，而只能做一些調適，因為今天沒有組織要求滿足所有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利（結束民事和軍事佔領、自決權和難民重返家園的權利）以換取停火，但只要求有基本權利和一些喘息的空間。再一次，在以色列方面發現了不妥協態度，對任何可能想要忘記它的人，它清楚表明，它以所謂“安全”的名義，追求一個致人痛苦的計畫，要摧毀巴勒斯坦社會，以便防止巴勒斯坦人一齊來爭取他們的權利。這是侵略加沙的潛在目標之一：把這個沿海地帶送回石器時代，讓人們的關注不落在結束佔領的鬥爭上，而是落在爭取生存和重建的問題上。

在當前的談判中，以色列拒絕同意真正的撤除封鎖，這就是其原故所在，因為撤除封鎖的確會讓加沙人喘口氣，並且最終重新組織起來，與侵略者戰鬥。有人或許會說，以色列政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府以任何其他方式行動都會是錯誤的，因為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政府對此提出過任何要求，或認為有必要對它施加任何壓力。相反地，他們指責巴勒斯坦人要對所謂的“停火”失敗負責，要求後者停止爭取他們最基本的權利，以換取“緩和”，即結束大規模的轟炸。

所以，聆聽巴勒斯坦組織一再發出的呼籲，是非常迫切的事情，無論這些組織是民間社會的還是政治組織，他們一直在說，現在最緊迫的任務，是對以色列施加真正的制裁，擴大‘抵制、撤資和制裁’（BDS）運動，惟有這樣，才能對以色列施加真正的壓力，孤立它並讓力量平衡朝有利於巴勒斯坦人的方向變化。正如自7月15日以來加沙地帶幾個民間社會組織所強調的，“以色列政權已經表明，在沒有壓力和不被孤立的情況下，它將繼續犯下我們此時此刻正在目睹的屠殺，而且它無意結束長達數十年的種族清洗、軍事佔領和種族隔離政策。（...）我們請你們參加越來越多的‘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追究這個流氓政府的責任，這個流氓政府再一次表明其本身是如此的暴力，同時又有恃無恐。”

我們可以為巴勒斯坦人提供的最好幫助，是像他們一樣，展示盡可能多的決心和毅力，迫使以色列政府賠償其加在他們身上的痛苦。這也適用於所有支持它的那些人，特別是奧朗德政府。無論是否有持久的休戰，鬥爭必須繼續下去，不能讓以色列將來肆意轟炸、監禁、驅逐、屠殺和殖民。無論是他們的民族權利還是最基本的生存權，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是不能談判的，不能犧牲給以色列及其西方和阿拉伯盟友的利益。換句話說，正如巴勒斯坦人和那些真正支持他們事業的人幾十年來所說的：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恐懼籠罩印度選舉 納格什·饒



對於本月結束的印度選舉，以及印度教右翼勝選帶來的眼前威脅，納格什·饒提供了理解背景。

印度的議會選舉開始於四月初，持續到五月中旬，在選舉前夕，進步的知識份子，活動家和組織敲響了警鐘，對印度教右翼候選人納倫德拉·莫迪勝選後的前景提出了警告。

在《印度》雜誌上，發表了一份著名左翼知識份子的聲明[1]，開頭就說，“在獨立後的印度，以前從未有政治力量，帶頭組織致力於創造一個印度教國家[Rashtra]，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這樣的力量成了當權的大熱門”。同樣，薩爾曼·拉什迪，迪帕·梅塔等人警告說，莫迪的選舉“對於印度作為一個珍惜包容理念之國家的未來，將會是惡兆。[2]”

記者和人權活動家普拉夫爾·比德外(Praful Bidwai)發出了更強的警告[3]：

如果莫迪贏了，他的政權可能會更糟[比英迪拉·甘地在1975-76實施的緊急狀態法更糟]，對公民和政治權利作制度性的攻擊，擠壓一切合法的反對派，專斷推行企業主導型經濟議程，並進一步把社會軍事化和社區化，引發對盡責公民的騷擾，取締和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這個警告是有道理的。納倫德拉·莫迪是全國志願者協會(RSS或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的前pracharak(字面意思：宣傳員)，全國志願者協會的用處是作為法西斯組織Sangh Parivar(聯合家庭)的骨架，即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團體“家庭”的思想和組織骨幹，該團體包括如巴讓·達爾(Bajrang Dal)和希夫·塞納(Shiv Sena)那樣的激進幹部組織。

印度人民黨(BJP，或Bharatiya Janata Party)是聯合家庭(Sangh Parivar)的議會派。經過1990年代和2000年以來，印度人民黨一躍成為國大黨最大的挑戰者，而國大黨是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的政治主導力量。目前，印度人民黨在議會領導的反對派聯盟稱為‘全國民主聯盟’(NDA)，而國大黨領導的政黨執政聯盟稱為‘團結進步聯盟’(UPA)。

莫迪獲得人民黨總理候選人提名，此事被許多人視為黨內發生全國志願者協會(RSS)政變的一個證據，政變把其老的黨衛兵邊緣化。老的黨衛兵由瘋狂的沙文主義者和專橫的他們自己組成，但他們現在說話卻比狹隘專制的莫迪要“溫和”。

莫迪任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突邦首席部長時，主持了最近記錄中最惡劣的反穆斯林大屠殺之一，事發在2002年的春天，造成1000多穆斯林喪生，超過1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

人民黨同全國志願者協會(RSS)關係並不總是順利的，因為選舉聯盟政治的偶然事件，有時會在推進印度教目標的各自戰略之間插入楔子。但可以這麼說，這些都是家庭爭吵。

選擇資本家的候選人

當然，莫迪是全國志願者協會(RSS)的選擇，但他的力量之源在於同他連結的大資本。面臨放緩的經濟和來自工人階級的越來越大的抵抗，印度的大部份資產階級接受了他，希望

借此進一步鞏固他們的財富和權力。

《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4]捕捉了出現在各級商人中間的眩人熱忱。“關於納倫德拉·莫迪的崛起，有一些令人興奮的東西”，在大標題下文章一開頭就說，“印度需要一個動盪，而選莫迪是值得的冒險。”

同樣，莫迪訴求於不斷增長的城市中產階級，後者對消費資本主義的享樂追求和超級富豪對過度享樂的偶像化之所以相匹配，其原因僅僅是他們都漠視平民群眾的困境(和鬥爭)。就像希夫·維斯瓦納坦(Shiv Visvanathan)在印度〈激進社會主義者〉(Radical Socialist.in)網站上所寫的[5]，“中產階層在莫迪身上看到了決定性的，指向安全的，以發展為中心的，關注城市的政治家，他說出了他們對穆斯林，混亂，安全的所有恐懼，並把它轉化為成一個巨大選票庫。”

這一切的大背景，是90年代初在印度開始進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其目標是通過拆解過去幾十年裡所謂“許可證統治”這一掣肘的官僚監管制度，以調整經濟結構。

大型公共部門企業被私有化或關閉。經濟特區設立了，它成了外國投資者的逃避稅收和監管的天堂。外國和國內投資增長，以及近二十年7-9%的增長率使得印度社會的最上層有了一個巨大的財富積累。

根據福布斯數據，印度56個億萬富豪共擁有近2,000億美元的淨資產，而《印度》雜誌的一篇報告[6]斷定，該國7,850“超高淨值”個人的財富為950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國家年度GDP的一半。

但多年的高速增長結束了。正如經濟學家邁克爾·羅伯茨所報導的[7]，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印度經濟已開始放緩，在過去的兩年裡，投資率從以往十年中平均大約12%的比率已經驟降至接近零。與此同時，城市的不平等創歷史新高，農村的不平等也升高。

為了推廣其民粹主義信用，國大黨領導的團結進步聯盟(UPA)政府頒佈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改革，如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案，承諾為每

個農戶提供100天雇傭勞動；適度增加糧食補貼給窮人；還有良性修改臭名昭著的殖民時代土地收購法案。

但這個稀薄的民粹主義影響不大，因為多年經濟強勁的增長未能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還有一連串聳人聽聞的數十億美元腐敗醜聞，涉及到工業和政府部門的高級官員，更進一步消去了其影響。

由於其裙帶關係，同大企業的聯繫，以及針對被壓迫種姓和少數民族“選票庫”的機會主義呼籲，國會名譽掃地。莫迪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團結進步聯盟(UPA)政府的失敗。

正如新聞記者席達特·瓦拉達拉金(Siddharth Varadarajan)所說的那樣[8]，“莫迪有今天——達到權力頂峰——並非因為這個國家正變得更加社會化，而是因為印度企業部門正變得越來越不耐煩了。”印度資本對經濟放緩的回答是削減福利，取消給窮人的食品和燃料補貼，增加退稅，並進一步放鬆對獲得土地森林的限制，以便利開採和抽取資源。

大企業離開國會——國會現在被看作是“優柔寡斷”和不可靠的——轉向莫迪，瓦拉達拉金寫道，是“一個警訊，說明孕育在印度經濟中的尋租行為和任人唯親的深刻危機，因為現在自由化的直接收益可能已達到了其自然極限。”

因此，莫迪的競選演說圍繞的主題也是“發展”和“善治”，並且以“古吉拉突邦模式”作為證明。

但這一模式還有更亮眼的東西。儘管古吉拉突邦擁有全國第二高的人均收入，但在2003年至2012年期間它也出現了近5000名農民的自殺事件[9]。在2013年，古吉拉突邦有該國第7高的GDP增長率，但農村消費增長方面僅排名第13位。根據經濟學家C·P·錢德拉舍卡爾(C.P. Chandrashekar)和加亞提·戈什(Jayati Ghosh)[10]的說法，古吉拉突邦的工資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並認為“按照所產生的實際收入計算，古吉拉突邦男性臨時工在

印度全國範圍內是處於底部的。”

前面的危險

強調“古吉拉特模式的同時，”莫迪並沒有遠離明確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主題。他在該國東北部的演講談論的就是這方面。在這裡，來自孟加拉的“非法移民”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被政客用來煽動民族和種族沙文主義。

在今年早些時候的競選演說中，莫迪荒謬地指控阿薩姆邦政府殺害犀牛清理土地以便利孟加拉移民[11]。稍後，在西孟加拉邦城市塞蘭布林(Serampore)，莫迪呼籲驅逐移民[12]，稱5月16日——選舉結果將在這一天公佈——孟加拉人將被要求“收拾行囊。”但是，並不是驅逐所有的孟加拉移民；他說，印度教移民，必須受到歡迎和容納；這證明了莫迪反孟加拉人的立場，事實上是反穆斯林的[13]。

選舉前的幾個月上演了幾幕暴力劇，包括2013年8月和9月的穆紮法納嘎(Muzaffarnagar)騷亂[14]，至少有62人喪生，還有數萬穆斯林逃離家園。

因此，左翼人士對莫迪的恐懼就不奇怪了。但並非所有人都在敲響警鐘。拉瑪昌德拉·古哈是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最近寫道：“害怕...納倫德拉·莫迪將開創一個‘法西斯’時期的人，或者甚至害怕他在印度會實行緊急狀態法那種統治的人，低估了我們民主制度的力量，低估了我們聯邦制度的穩固性。[15]“

古哈可能是正確的，撤銷憲法和建立一個印度教神權政治可能不是迫在眉睫的。但是，社會主義活動家和學者孔拉爾·恰托帕迪亞(Kunal Chattopadhyay)[16]針對這種自滿警告說，如果古哈貶低左翼的警告，說那多半是散播恐懼，那麼古哈的態度會鼓勵其他的自由主義者，如社會學家安德列·彼特意爾(Andre Beteille)，走得更遠並宣佈支持莫迪[17]。

此外，憲法還內置有充足的鎮壓能力。對

喀什米爾持續的軍事佔領，倡狂濫用武力和違反人民意願，都無需在新德里中止憲法，在恰蒂斯加爾邦和比哈爾邦邦持續鎮壓原住民和被剝奪者也無須中止憲法。那個臭名昭著的武裝部隊特別權力法和其他許多鎮壓機制，讓政府有大量的空間進行壓制，實行短期戒嚴。

“人權觀察”有一份報告[18]指出，印度尚未批准反酷刑公約和反強制失蹤公約：

“‘人權觀察’有檔證明，根據印度法律，有罪不罰的做法，往往是允許的。”印度政府用軍隊來維護其在次大陸大部分地區統治，不只是在喀什米爾而已，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和“穩固的聯邦主義”與這個軍隊很容易的共存一起。

一個莫迪政府會助長本已復蘇的印度教大軍：它將把在聚會上和在酒吧裡毆打婦女的業餘道德治安者[19]合法化，把迫使進步記者沉默的暴徒[20]，把希望禁止女性穿牛仔褲和使用手機[21]的村民委員會(Khap Panchayats)，把恐嚇賤民村和居民區的許多上層種姓暴徒合法化[22]。

儘管經濟放緩，但目前印度的資本不會面臨左派或勞動階級對其統治有威脅的挑戰。尚不會拋棄民主憲法，眼下還不會把國家統治權力移交給普利文·托嘎地阿斯(Praveen Togdias)和巴巴·拉姆德福斯(Baba Ramdevs)。

不過，儘管從上面實行一個法西斯政權的可能性並不是迫在眉睫的，但‘聯合家庭’組織的幹部將因莫迪的勝利而加強。抵禦這些力量，對於左翼人士是一個持續的挑戰。

是否有替代的辦法？

需要說的是，所謂的“莫迪浪潮”(Modi Wave)在很大程度上是媒體的炒作，反映的是莫迪財大氣粗的競選，也表明記者按照其贊助者和老闆定的曲調而按部就班地起舞。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在莫迪競選議會席位的瓦拉納西有活動分子發來報導[23]說，在工人和被壓迫種姓中間，莫迪獲得的支持相當

薄弱。同樣，在北方邦和比哈爾邦，這是人民黨必須大贏的兩個州，這個浪潮可能沒有獲得真正的落實。

儘管在印度進步人們中間，對莫迪勝選的前景感到驚愕甚至恐慌，這種情緒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大部分競選報告都低估了抵抗新自由主義及其影響的重要性。財富在印度社會最上層積累——阿倫達蒂·羅伊稱之為“暴發戶”經濟——同時受到國大黨政府和印度人民黨政府的政策允許，所以在此整個期間出現了一個經濟政策的顯著連續性。

另外，有反對新自由主義優先次序的抵抗存在：從蘭迪格蘭(Nandigram)和辛古(Singur)的反征地運動，到德里/NCR地區的汽車廠不斷增長的工業區鬥爭[24]，再到2010年，2012年和2013的總罷工；直至米提維提(Mithi Virdi)和庫丹庫拉姆(Kudankulam)的反核電抗議[25]。

但這些鬥爭至今還未能夠力挽狂瀾。汽車廠的工人面臨著可怕的鎮壓，許多激進的工會會員被關押在監獄裡近兩年（儘管這樣，馬魯蒂鈴木工人工會最近獲得了重大勝利，推翻了老闆成立一個傀儡工會的企圖[26]）。

主要從上而下宣佈和領導的總罷工，在扎實實加強工會的密度或工人自治組織方面，做得不夠。反對庫丹庫拉姆核電廠的英勇鬥爭未能阻止其建設，其最突出的領袖，S·P·烏達亞孔馬(S. P. Udayakumar)在受控煽動領導抗議活動後，被迫躲藏起來。

雖然這些鬥爭指向工人階級另一選擇的潛能，但他們迄今未能對資產階級政治構成嚴重挑戰。

凡人黨(AAP)的出現表明，人們是如何地疏遠人民黨和國會的。

凡人黨(AAP)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黨（就像任何其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一個可能無法保持其內部凝聚力的大帳篷。但它的群眾支持表明對變化的渴求。如果不是幾十萬，那麼起碼是數萬城市青年已經政治化，打破了對王朝政治的長期的忠誠，正在學習運動

和組織的方方面面。

如果凡人黨(AAP)的反腐敗平臺已經獲得了進步活動家的支持的話，那是因為有組織的左翼仍然薄弱和零散的緣故。在印度共產黨(CPI)和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CPI-M)的帶動下，議會左翼亂了陣腳，在西孟加拉邦上次選舉的慘敗後，其勢力正在撫平傷口。

而在西孟加拉邦州政府掌權時，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CPI-M)把自己作為西方跨國公司一種更“可靠”的盟友，從加爾各答街頭驅逐了近10萬貧民窟居民，增加對工會的限制，以防止罷工和工作抗議行動，並聘請美國公關公司麥肯錫公司在海外提升自己的形象。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CPI-M)證明了自己是新自由主義的自願幫兇，並在2011年的民調中受到懲罰[27]。

此外，共產黨遠未提出替代資產階級政治的方案，而是積極鼓勵大印度民族主義，贊同印度對喀什米爾和曼尼普爾邦的新殖民佔領的“印度理想”。在反種姓鬥爭中，共產黨充其量只是軟弱的盟友，並在自己的隊伍中積極實行種姓制度，要不就對其視而不見。

在共產黨之外，還有一個小規模但在增長而且充滿活力的左派，他們越來越明顯的出現在罷工工人的糾察線上，出現在反對核電的農村運動中，出現在校園支持達利特(Dalit)學生的權利，並為爭取婦女權利在街頭抗議和反對強姦。

如果莫迪獲勝，非史達林主義左派面臨著艱巨的任務。在莫迪統治下，建立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社群主義和種姓制度的革命組織會變得更加困難。但在印度歷史上最令人不安的選舉之一中，這種新興的左派，以及它參與的多樣化鬥爭，帶來了希望。

非常感謝提提·巴特查亞(Tithi Bhattacharya)，菲爾·加斯珀，普拉納夫·賈尼(Pranav Jani)和斯訥哈·辛嘎維(Snehal Shingavi)對本文初稿的批評。

資本主義、全球經濟下滑及新常態

安德魯·舍那亭格、泰莎·埃切維理亞、大衛·麥克納利



2007年開始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至今已將近七年了。為了對這場危機的起源，深度和軌跡有一個瞭解，我們採訪了大衛·麥克納利，他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政治經濟學家，著有關於全球經濟衰退的作品：《危機及抵抗的經濟學與政治學》（2010）。最近著作則有《市場魔怪：僵屍，吸血鬼和全球資本主義》（2012）。為了便於閱讀，我們把採訪分為兩部分。這第一部分側重於危機本身，它產生的原因，它重組工作生活的方式，管理危機的執政精英們的觀點及其財政緊縮政策，以及如何幫助作為運動積極分子的我們提出自己的立場。

第二部分[1]將集中於市場魔怪，要究問為甚麼那些魔怪會俘獲大眾文化。這將引領我們檢視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下的日常生活，討論雇傭勞動的經驗是如何吸引怪物，尤其是吸引僵屍，吸血鬼和科學怪人的故事。第二部分結束於麥克納利的從下層構建新社會主義的思想——安德魯·舍那亭格。

泰莎·埃切維理亞：讓我們先談談我們此刻身處其中之危機的歷史，談談新自由主義，也談

論資本主義國家如何應對2007年左右開始的經濟潰敗，你能不能扼要地談談危機是如何來到的，以及它同近代資本主義的歷史有什麼關係？

大衛·麥克納利：我認為這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的第四次大蕭條。在十九世紀最後25年左右，是第一個低谷，那時第一次使用了“大蕭條”這個詞。它開始於1893年，持續了大約25年。然後，對於我們大多數生長於20世紀的人，當然有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實際上這是第二次大衰退。隨後的低迷是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這時我投入到了政治活動理，這段滑坡時間約在1971年到1982年期間。然後是新自由主義，它重組重建工作和企業實力的方法等等，它設法建造另一波資本主義擴張，約2007年左右，這波擴張實在精疲力竭了，這時候，我們進入第四次大滑坡。所以，我們現處在這個滑坡的第七年，我認為，尚看不到盡頭。

這只是讓我們瞭解歷史。現在，當然，每一個大經濟滑坡都有其獨特的歷史特徵。他們表現出各種不同的特性，這些特性與資本主義演變方式有關，在我們的情況下，特別是全球化過程，它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在過去的30年左右，具特別作用的還有金融業，以及非常複雜的金融交易品類，這些具有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一個特徵。

把全球化和金融化那兩個特徵放在一起，就使我們能夠理解，為甚麼大概在2006/2007年初開始於美國的房地產行業危機，會成為一個全面的金融危機。這是因為所有這些以抵押貸款為基礎的證券，被金融機構反復交易，在全

球範圍出售給投資者和投機者。這解釋了為甚麼危機會如此迅速的全球化，因為在西班牙銀行和蘇格蘭銀行等銀行都持有這些以抵押貸款為基礎的資產。我說這些，是要給我們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觀點：這是第四次大衰退，在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它們會伸展到任何地方，就像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的危機，持續多達四分之一的世紀，二十五五年左右的時間，又像十九世紀的第一次滑坡一樣。同時也指出，每一個滑坡都有其獨到之處。

這並不是說，沒有一些基本的一致性在起作用。我認為，一種經濟體若是以私人業主之間的競相追逐營利為動力，在這種經濟中，你一定會看到急切的投資浪潮，資本家都要購買最新的先進技術，因為他們認為，這會給他們在更快速地生產相同產品或服務方面以優勢。於是，電腦被用於所有這些“及時”的生產和輸送系統，等等。只要資本家這樣做，試圖壟斷市場，在某些時候，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建立更多最先進的鋼鐵廠和汽車廠，建造更多的商場和公寓樓，建造更多的房屋和飛機，建造得比資本主義社會那裏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還要多。我認為，可以把這些危機準確地描述為過度投資和過度積累的危機，需要一些時間來解決這些危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世界各國向政府負責的央行進行了干預，試圖阻止金融危機，可是其做法，我相信是在擴展我們眼前的整個危機。當世界各地銀行開始崩潰時，通常受政府指導的央行行長，並沒有採取1930年代的做法：在20世紀30年代，他們採用了其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認為必須讓銀行自行其是，讓市場機制自動調整自身。結果他們發現，他們不知道底線在哪裏！1930年不如1929年，1931年更糟糕，一直到1933年，此時，一些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開始嘗試通過政府支出和金融政策，對

抗危機的影響。

但他們學得了教訓，1929年至1933年那巨大的崩潰，對於資本主義，不只在經濟上是災難性的，在社會和政治上，也是災難性的。於是這一次，政府進行了大規模干預。他們基本上做到了，對銀行說“把你們所有的有毒資產全部交給我們，把你們所有的垃圾資產給我們，把那些一文不值的抵押貸款證券；把你們一美元買來卻只值十美仙的債務抵押債券，都給我們。你們給我們那些東西，我們會給你們央行的錢，那是對投資和買賣的最好回報；是可用于任何金融交易的最佳紙張。我們會用美鈔買你們的垃圾。”

他們把第一批幾萬億資金注入該系統，並沒有解決危機。他們再投入幾萬億，據我的計算，至少有28萬億或29萬億美元注入銀行體系，在美國，只有一點點進入了布希-奧巴馬的財政刺激計劃。現在讓你看看這意味著什麼，因為估計你和我一樣，從來沒有聽說過28萬億美元或29萬億美元，這比美國經濟中兩年產生的商品和服務的所有價值還多。換句話說，等於把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兩倍給了銀行。巨大的驚喜是：終止了銀行業危機！

因此，那部分的危機結束了。實際上，沒有任何限制：他們只是不停地送錢，直到銀行穩定。問題是，他們不僅把大量資金注入銀行，但他們也有效地使借貸利率為零！他們讓銀行和主要公司借款者的借貸利率實際上為零。諷刺的是，這意味著，本來要崩潰的企業要麼擺脫困境，比如通用汽車或克萊斯勒(Chrysler，在美國和加拿大，直接由政府救助脫困)，要麼就讓他們能夠以零利率去銀行借錢，悄悄地脫困。基本上，那些免費的錢讓各種業務活動得以運行。

我之所以說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為了使資本主義重新站起來，它需要擺脫那裏存在的所有多餘的資本或多餘的企業；擺脫所有的過度積累，過度的投資狀況。他們是通過企業倒閉做到這一點的。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在美國發生的事：各種鋼鐵企業的倒閉就是實例。但我們還沒有看到，因為錢實際上已經是免費的，所以我們處在世界資本主義歷史上的第四次大蕭條，各國央行大規模干預，停止了銀行業危機，但因為讓資金實際上變得是免費的，他們也阻礙了能夠讓資本主義重新站起來的、其本身乖張機制的運作。讓效率最低，生產率最低，盈利最少的公司破產，讓效率最高，生產率最高，盈利最多的公司接管其市場，這樣它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擴展並再投資。

有一個受到救助的資本主義，那裡的銀行沒有崩潰，但那裏的企業新投資實際上近於零。有那麼長時間的高失業率，低增長率等。資本主義需要一波破產才能真正回到強勁的增長，但央行官員擔心，在失業率高企的環境下，看到很多企業倒下，將有政治上的破壞性影響。也許其中的一些公司，如果它們倒閉，會無法償還其貸款，將會啟動另一個銀行危機。這就是為甚麼我在危機初發時就說，估計這是一個較長期的危機，少則十年，也許會長得多。

泰莎·埃切維里亞：這更多的一個是全球性衰退而不只是短期或局部的“危機”，關於這方面，希望你能談一下。

大衛·麥克納利：先從這場危機是如何全球化的第一部分開始談，當然，因為早期的說法是，“這只是美國的危機。”當歐洲在數月內連遭重挫時，他們說，“這只是北半球的危機，南方充滿活力。中國、巴西和印度會保持整個系統運作。”

當然，最後，情況清楚表明，在南半球部分也有大問題。

這無損於這樣的事實，即全球性危機的節律不勻——實際上危機必是開始於某處。如果只是局部的危機，那麼你所看到的，只是一個單獨的經濟體或者連接幾個區域的經濟體出現危機。我們見過這樣的危機，例如：在1997年出現了所謂的“東亞危機”，它並沒有走向全球。它只停留在全球體系中的一個區域內。

但是，這次是不同的，由於過度積累，大約從1982年至2007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擴張的長波接近尾聲。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系統是脆弱的。真的，每個人都在邊崖，因為當全球有能力生產超過任何人需求的2億噸以上的鋼時，那已經不是為保持投資而生產的問題了，可世界卻正處在這個時刻。

一旦危機襲擊美國，那麼離一個歐洲的危機就不遠了。當然，我們現在知道，由於很多有趣的原因，南歐特別脆弱：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這方面確實很突出；義大利的問題也不輕。但不只是南歐，同一些說法相反：愛爾蘭受到的打擊很重，而所有的跡象都表明，法國會繼續步履蹣跚。那些南歐國家青年的失業率在50%左右，而勞動力的整體失業率在25%左右。這是大蕭條式的失業率，是歐洲大部分地區目前正在經歷的情況。

就在危機開始時，中國推出了一個更大的經濟刺激計劃，比美國小布希和奧巴馬的兩個刺激計劃加在一起還大。特別是在2008年和2009年，中國大量投資機場，公路，橋樑，水電站等，以刺激經濟應對危機。他們很擔心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場。這也有助於該系統一段時間的穩定。因此，中國，印度和巴西將成為新的增長中心的說法是可信的。

今天，巴西經濟確實已經下滑了兩年，還有，突然間，當你閱讀商業報告時，會看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對中國的憂慮。他們現在談論所有不良貸款，這些貸款是中國五年前推出的，用作其經濟刺激計劃的一部分，它們已經累積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以至於人們不知道中央政府是否可以控制這個危機。中國的增長速度已經下降了約三分之一，或百分之四十。

但它發生得不均勻，按照一個伸展的時間框架顯現，所以很容易讓人們忘記這個過程的內在聯繫，不瞭解它是一個全球大型經濟衰退的方式，我已經在某些場合裏提到，它是一個變異性衰退。它可能會在一個特定的行業開始，比如房地產，然後進入銀行系統，然後如果銀行系統能夠控制它，它就進入失業危機。它的震中可能在地緣上移動：如果美國銀行被紓困了，則壓力會落在歐洲銀行；如果中國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他們可能會推遲遭清算的日子，等等。

我們真正看到的是，時間節奏伸展多年來，每次在一個部門或一個地區的危機會潛入其他行業和其他地區。中國的衰退，對所有那些對中國有大量出口的經濟體，特別是對於參與其龐大建設熱潮者，將是非常糟糕的。所有這些經濟體估計都可能會出現經濟放緩，人們會將這歸咎於中國經濟的放緩而不是承認中國的經濟放緩只是這一更廣泛變異放緩模式的一部分，這個滑坡總是隨其中心移動而改變形式。就像你有疾病，病從身體的一個部分移動到另一部分：它起作用的是同一個器官的疾病，但它在病體的不同部分顯現。這是真的，我們所看到的和這裏所涉及的生物體就是全球經濟。它的不同部位變成疼痛或苦難的中心，它們實在是一個集成的全球進程。

泰莎·埃切維里亞：在此之後，在過去的幾年中，很多人談論緊縮政策同新自由主義的對陣，我想知道，你能否談談這些力量之間的區別，及其在這場經濟下滑中的作用？

大衛·麥克納利：對於理解為甚麼利潤在美國看起來那麼強勁，我認為這是關鍵。企業利潤的圖畫似乎不符合我給你的描述。對緊縮的理解，使我們能夠掌握眼前危機的一些關鍵政治層面。

從商業的畫面開始，他們認識到，只有幾萬億美元是不可能讓銀行擺脫困境的，而世界各地政府將要負擔的債務數額是巨大的。很早，央行就向政府發出資訊，他們將不得不讓某些人支付政府為救助銀行而承擔的債務。最明顯的被選中者，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工人階級和窮人，他們將會在第一時間真實地感受到大幅削減社會支出的影響：教育，醫療，養老，社會救助，等等。

已經有活動在策劃。在舉辦2010年G8和G20會議的多倫多，即在八國集團和二十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的會議時，我們看到了令人生疑的區別。他們把其財政部長，總理，總統等聚集一起制定戰略。在2010年的會議之前，有一句話在商業媒體流傳：“緊縮的十年。”這是修辭的說法。意思是需要10年，才能扭轉政府為銀行紓困而大規模開支的後果。

然後，突然之間，圍繞2010年初夏的G8和G20會議，“緊縮時代”的說法出現了；而“十年”則被剔除。他們意識到的是，他們的干預規模如此龐大，達到28-29萬億美元，他們沒有辦法在十年內支付下來，恢復他們想要的預算。

但我認為不止如此。這只是債務的規模，但他們也認識到了政治機會：他們意識到，如

果群眾的反緊縮運動不會推翻政府，而這首先是未定的問題---它肯定看起來具有阿拉伯之春時的可能性，當時突尼斯和埃及政府突然垮臺---如果大體上，他們不會被群眾社會抗議掃地出門，那麼他們認為“我們其實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他們可以利用危機的長期性重獲歷史上得到過的那種收益，回溯20世紀40年代或30年代，這種收益是通過勞工社會運動而獲得的。

在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於所謂的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各國政府，圍繞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公費醫療（美國是一個重要的例外），公共教育以及非常重要的高等教育開支，對工薪階層和社會運動作出了讓步---所有這一切有可能再度回頭。你可以私有化這些部分；你可以讓使用者付費，因此，即使公立大學的學生也要付出越來越多的實際學費；你可以終止公立學校系統的資金資助，使中產階級以上的那些人逃往特殊學校和私立學校；你可以破壞所謂的安全網，以這樣一種方式，有系統地降低生活水準。

不幸的是，這個做法有用。大部分北半球的多數人現在比危機爆發的2008年更貧窮。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而利潤飆升。這只是眾多例子中的一例，說明很基本的相互關係在起作用：工資下降，利潤上升。這大半就是推動盈利恢復的東西。

在這裏，我們有一個矛盾，就是公司得益於緊縮，已經顯著康復，但他們不投資。在美國，企業現金坐擁量達到約2萬億美元，在歐洲，這個數字則在2萬億歐元左右。這些都是歷史高位！他們再次攫獲利潤，但是因為我前面描述的過度積累，並沒有很多投資動機。

我們有的是一個有利可圖而失業率高企的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緊縮的奇特組合，就利潤方面而言它是有用的，但就真正解決失業

危機的經濟增長而言，它並沒有恢復任何程度的經濟增長。

不幸的是，權力精英已經發現，他們可以強制執行緊縮到一個程度，我認為，是一個危機前很多人想不到的程度。我想，他們不認為他們可以如此蠻幹而沒有社會動盪。他們只是持續測試底線。那麼，如果底特律學校的班級人數為60人又會怎麼樣？如果拉脫維亞解雇三分之一的教師又怎麼樣？如果希臘養老金削減70%又怎麼樣？這是有利可圖的生意！這是政府的偉大的新自由主義緊縮。

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就可以繼續做下去，我想，他們會這樣做的。因此，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象，評論家總是在談論，我們有一些最極端程度的社會不平等與高失業率實質停滯的全球資本主義並存。這是新的常態。我認為它會呆在新常態中，直到某種大規模工人階級社會抗議高潮出現，社會力量的平衡發生轉變的時候，比方說，就像我們在1930年代美國大蕭條的後半程中所看到的情況。

安德魯·舍那亭格：請你說一說，為甚麼對全球政治經濟的這種理解，不只是抽象學術性的，“遠在它處”的東西，就運動的運作和組織方面而言，這種理解對人們是很重要的？

大衛·麥克納利：我認為這種分析有很大的價值，有助於進步/左翼運動定位自己，開始進行長期戰略思考。不幸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義時期，我們所學得的一件事是一種防禦性的政治，那段時期由女權主義，民權，反種族主義，勞工，酷兒，反戰運動贏得的成果被退回。有這麼多的鈕扣和T恤以“停止”這個詞開頭。“停止這些削減！”“停止這些攻擊！”

該模式當然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盡力嘗試和抵禦所有的攻擊，停止削減，等等。但對於左翼/進步運動的危險是，我們進入一個純粹的反應模式，只是簡單地做傷害限制。我們沒有討論，不作戰略思考，而是跟著‘我們在世界歷史的何處？’提出組織或政治問題。難道我們需要跟隨統治者的思考方式而思考嗎？他們會思考“十年”和“時代” --- 這是他們的說辭。如果我們想要做得比傷害限制更多，想要恢復社會轉型的政治，找回真正徹底的變革解放的政治和社會議題，我認為我們需要擺正自己的位置。

我認為，我們需要做的其他事情，是真正挑戰那種想法，即認為緊縮政策只是由一群瘋狂的右翼勢力在做，以及他們正在做的是搞壞“經濟”，因為它使我們更窮從而抑制了消費需求。彷彿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同領導層合作，說服當權者，他們的作法對自己不利。這就是經典的凱恩斯主義說法，我們所要做做的就是恢復有效需求，讓每個人都從中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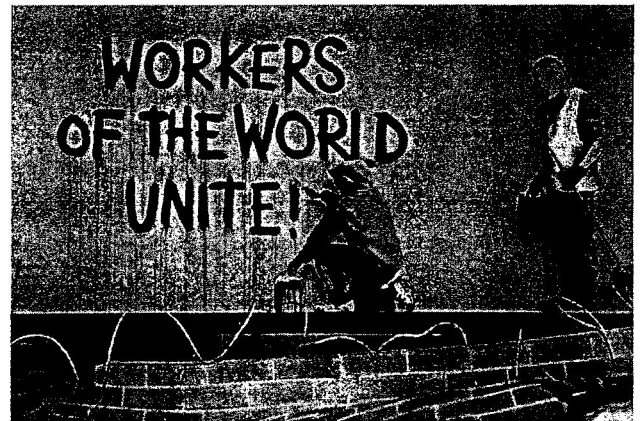
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財政緊縮對於企業和親企業政府有用。他們的興趣不是所謂的“經濟”，他們的興趣是企業的底線，而緊縮正在為此服務。這是真的：緊縮政策不會產生就業機會。但是，這要求我們不可忽視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經濟的目的不是創造就業機會。那不是企業投資的目的。這不是銀行家貸款的目的。他們不會為創造就業機會而這樣做。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幫助借款人與投資者實現其利潤的最大化。

認為緊縮是一些癡迷瘋狂的右翼分子的議題，這種看法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只要使好的民主黨分子在美國當權，或者使不錯的新民主黨在加拿大當權，那麼所有這些攻擊就會消失。對不起。我對此不相信。我想，我所作過的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分析已經說了，這是資本的利益。這關係到我們社會中的公司權力和銀行利益，他們會堅持使用它的。

如果你想阻止它，你不能僅僅簡單地嘗試做這樣的教育工作，說這對經濟不利。實際上，要像上世紀30年代的激進工人階級和社會運動一樣，你們要提出這個問題，即我們如何轉變我們社會理社會力量的平衡？我們如何從下層建立一個反對力量，使它能夠真正贏得反對該議題的勝利，並開始建立一個能夠真正闡明和塑造另一種選擇的社會力量？相信我，我不認為它能在一夜之間完成。但我認為，按照我的分析，這是一種戰略性的理解。正如你所說的，它不只是一個學術分析。



當我談論這些東西時，我並不認為自己不過是個無可救藥的抽象烏托邦主義者。如果檢視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我們看到的是，大蕭條的上半部分其實只是一個資本的狂歡節，是打了雞血的緊縮。他們把勞工按入地裏。使得不同行業的大量基層人們組織起來，特別是採取了偉大的靜坐罷工戰術，不是走出去，而是佔據你工作的地方。那是左翼歷史的變革時刻，當時一種完全不同的關於勞動組織活動的戰略及政治觀念開始被吸納。一旦獲得了前幾場勝利，它就會成傳播。這樣一來，它就保持始終朝一個方向推進的可能。

話雖如此，這是不可能發生的，除非你清醒地問自己，我們在歷史上的什麼位置，這是什麼性質的經濟，為甚麼政府通過緊縮，就能到處逃避它？為激進的政治和組織制定10年和20年願景的戰略性發展，這是什麼意思。

安德魯·舍那亭格：我所以問這個問題，部分原因是因為前幾年理查·西摩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為甚麼我們不能夠解釋這場危機？”同普及運動有關的部分問題，是緊縮政策已經變得很平常，危機被看作是正好讓人們碰到的東西，不是制度性的或有意設計的。問到這個問題，我希望能瞭解，我們如何創建一個基於你的描述而來的共識？

大衛·麥克納利：我認為這是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你當然是對的，因為新自由主義的進攻不只是對勞工和社會運動的攻擊。它確是那些東西，但它也是一個思想和文化的轉型。它在我們自己的頭腦中創造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市場，它還創造了一種經濟宿命論。其觀念是經濟就像一個天氣系統，它的這些模式完全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下雨開始時，你只是去拿傘。這些經濟政策的動力已經深深植根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本性，但它們轉化為社會政治政策的方式並不是自然賜予的。沒有什麼氣象性。壓倒性的事情是社會力量的制衡，以及我們的統治者能夠或不能夠逃避的東西。

毫無疑問，你說的是正確的：有一個普及教育的重要任務。話雖如此，我還認為，對華爾街，銀行和企業存在有深刻而持久的犬儒主義。我們看到，這不僅體現在佔領運動裏，我覺得，佔領運動的資訊引起大眾的共鳴，確實讓許多評論家驚奇，而且我還認為，此刻我們甚至看到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眾文化中。甚至在主流電影和電視中！

我認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不像是一個關於市場和市場化的理念及解決方案的深刻思想信念那麼簡單，而對任何意義上的替代辦法來說，它是一個歷史性崩潰，我擔心的是你們所得到，還有理查·西摩（Richard Seymour）所說的。有這樣的感覺，即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歷史時刻，對這個方向可能逆轉的感覺處在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低點。在過去三十年，社會退縮和社會挫敗的累積效應，確實粉碎了激進的想像力，粉碎了對這種可能性的感覺，這個感覺同1970年代我成為左派時相比，是如此的不同。那時的左派有個感覺，即它已經贏得了爭取民權的主要鬥爭；正在為贏得性別權利進行大戰；可以感覺到，它對於越南戰爭的公眾輿論在產生影響。上街遊行，佔領國家立法機構，佔領工作場所，和衝擊佔據將要關閉的學校——這個感覺，能夠真正得勝的感覺是醉人的。但是，感覺它是無所謂的，不管你做什麼都沒用，這種感覺會讓大眾洩氣。

我們需要找到方法，明辨那些實實在在可以建立新自信感覺的小勝利，用這種方式，重建實際可行的完全想像。這是20世紀30年代發生在美國大蕭條後半部分的大轉移故事。

CΔPΦTΔLΦSM ΦS CRΦSΦS



另一種選擇將是南方銀行而不是金磚銀行

埃理克·杜桑

埃理克·杜桑完全瞭解發展資金中的危險是什麼。1990年廢除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CADTM）的創始人，比利時的政治科學家在厄瓜多爾政府授意下，直接參與了南方銀行的起動活動。即使此實體目前處於停滯狀態，杜桑先生仍然認為，七個南美國家於2007年啟動的這個項目，在逐步替代世界銀行。相反地，他對由五個主要新興經濟體宣佈組建的投資銀行持懷疑態度。
[日內瓦信使報]

問：被稱為金磚五國的新興國家宣佈，他們要創建一個可以替代世界銀行（WB）的機構。這是發展的好消息嗎？

埃理克·杜桑：任何替代世界銀行（WB）的方案，的確都是大好消息，但我完全不相信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金磚五國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試圖保護他們的利益，就像傳統大國通過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保護其利益一樣。新發展銀行（NDB）許諾不設置如‘結構性調整計畫’之類的條件，它站在一旁，手持其貸款和它的民主原則：一國、一票（但它會遵守到何種程度呢？）。作為替代方法，它是不夠的。只是為惡程度少些而已。

問：總而言之，我們要把屈從於華盛頓的世界銀行（WB）換成服務於中國帝國主義的新發展銀行（NDB）嗎？

埃理克·杜桑：我們可以按照巴西經濟學家瑞·毛羅·馬尼尼的說法，談談次帝國主義（sub-Imperialism），因為，這些國家，尤其是巴西和中國，正在大量投資於發展中國家，推

動他們自己的政治或經濟利益，而不是為資金接受者的發展服務。他們同美國這一類真正帝國主義的區別，在於他們不訴諸軍事手段，不過，俄羅斯不在此例。

問：在您看來，真正替代世界銀行（WB）的會是什麼？

埃理克·杜桑：2007年創建南方銀行（BoS）的公告，是一個充滿希望的跡象。在它初創時，我參加了厄瓜多爾立場的起草工作，隨後在總統拉斐爾·科雷亞的請求下，參加了七個創始國部長組成的委員會。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對於要達成的前景非常清晰，即增加就業和促進大陸一體化，還涉及非常具體的專案，如通用產品的醫藥工業，或用鐵路重新連接南美國家，並且使用本地生產的機車車輛，這意味著更少的污染和工業技術的突破。蘇克雷（Sucre）是一種公用和替代性的貨幣。它還涉及到這樣的理念，即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應將資源傳送到其他人。這是一個整合項目，考慮了人民的利益並且可以輕鬆地擴展到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尤其因為它瞄準了透明度——公共帳目、外部審核——和民主。作為世界銀行的替代方案，這應該樹立了一個榜樣，而且因此必須是抱負不凡的。例如，南方銀行的官員與世界銀行的同行不同，他們沒有司法豁免權。

不幸的是，南方銀行尚未啟動。自它成立以來，七年過去了，該銀行還沒有發放任何貸款！委內瑞拉政府已宣佈，它將在2014年年底之前運營。我們就保持密切的關注吧。

問：金磚五國銀行的運氣好些嗎？

埃理克·杜桑：他們會設法就聯合專案達成一致嗎？有人可能會問，這五個國家不會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可以做到的傳統力量而合力吧？事實上，在我看來，這五個國家有很少的共同利益。

問：他們有財政基礎來維持這種銀行嗎？

埃理克·杜桑：答案是肯定的！單單中國就有超過3兆美元的外匯儲備，它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它是巨大的數量，幾乎是發展中國家公共外債總額的兩倍。那筆錢的好大一塊投資在美國國債上。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同樣，巴西和俄羅斯也有很大的外匯儲備。只有南非，很難找到100億美元作為啟動資本（除了所需的50億美元儲備基金以外。編者注）

問：至於巴西在新發展銀行（NDB）的投資，是不是釘在南方銀行（BoS）棺材上的最後一顆釘子嗎？

埃理克·杜桑：南方銀行（BoS）已處於不良狀態……，但是，不管有沒有巴西，南美仍然還是有啟動這個項目的金融資產。我認為，巴西對目前的僵局要負主要責任。這個國家有自己的發展銀行，即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家銀行（BNDES），該銀行有龐大的海外投資。在南美洲，其地位相當於美洲發展銀行和該區域的世行貸款！巴西優待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家銀行（BNDES），它為了阻止潛在的競爭對手才參與南方銀行（BoS）。

問：這種失敗，以及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目前的金融困難，不就表明拉丁美洲的獨立之夢遙不可及嗎？

埃理克·杜桑：當烏戈·查韋斯提出南方銀行（BoS）建議時，該專案聽起來絕對合理！錯誤之處，可能是假設巴西政府必會不惜任何代價參與這筆交易。不過，該大陸大多數國家已證明他們可以避開新自由主義的共識。新的結構，例如‘我們美洲人民玻利瓦爾省聯盟’（ALBA），現在是功能性的。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已決定退出世界銀行集團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另外，在這些國家開採天然資源的國外大公司，現在要支付更多的稅。當面臨這些國家的實際潛力和未來的挑戰時，這仍然不夠，但我們還有時間。在未來兩年應有強烈反應。一些政府官員正在朝這一方向推動。

否則，我恐怕南美國家將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類似於1982年債務危機的情況迫在眉睫。

問：有沒有早期的徵兆？

埃理克·杜桑：有，美國會加息，2007年-2008年危機期間利息大幅降低了。正當全球原料的需求下降威脅南美國家的收入時，這將使債務再融資的成本提高。我恐怕這些國家在未來兩三年之內才會意識到，在過去的十年他們錯過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即發展替代性金融工具以反對北方國家各項決定的機會。

永遠懷念鄭澤鏗老戰士(1918-2014)

十月評論社同人



尊敬的鄭澤鏗（又名鄭致祥，樸克）老戰友，於2014年7月28日在加拿大離世，終年96歲，我們對他的永別，深深感到不捨。

鏗哥——我們一向以來對他的親切稱呼——祖籍中山，在1918年5月27日出生於上海。他身材高大，昂藏七尺，我們有時又暱稱他為LONG哥。他待人接物和藹可親，能說國語、滬語、粵語、中山話和英語。

1931年918事件後，上海告急，他隨家人回中山縣居住。自小學業成績優秀，初中二已任童軍隊長。他在年青時期，便已確立起他的革命人生觀，在同鄉和同學的互相影響下，加入了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簡稱中共同盟）。

1936年10月，他身體力行，加入過國民黨地方官員徐繼炎主持的抗日後援會工作；1937

年6月，出任中山縣立男中女中話劇委員會主席；抗戰爆發後，他與中山托派同志一起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2月，他獲推選往香港，參加劉家良主講的訓練班，大大加強了對各種政治問題的認識。次年，被派回中山工作，在黃靜波指導下共同成立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被推選為副團長。中青團的目的是發動群眾，武裝工農，日常工作是向民眾宣傳，貼出壁報，演出話劇，號召他們起來抗戰，在戰時則從事消防，扶危救傷。

他通過中山二區政客——周守愚，周克明，及珠江三角洲別動隊司令袁帶（即北伐時第x軍司令李福林部下袁瑞庭），取得其參謀屈仁則同意，在其部隊中增設政訓員，由他、劉錫勤、王文本、劉秀、李伯若擔任；主要職責便是向那些草集成軍的隊員們介紹中國地理常識、國情及戰況。

1939年4月29日，日機濫炸中山縣石岐市長堤，鄭澤鏗當時忙於在街頭救助受傷民眾期間，不幸被炮彈炸至重傷，送到僑立醫院急救，縣長特別聘請著名外籍醫生搶救，幸保存性命。留醫兩月，期間得到大批民眾攜帶鮮花食物等前來慰問。後因日機繼續轟炸石岐，醫院成為它的目標之一，於是被迫提早離開醫院，避居隣近澳門北面的南屏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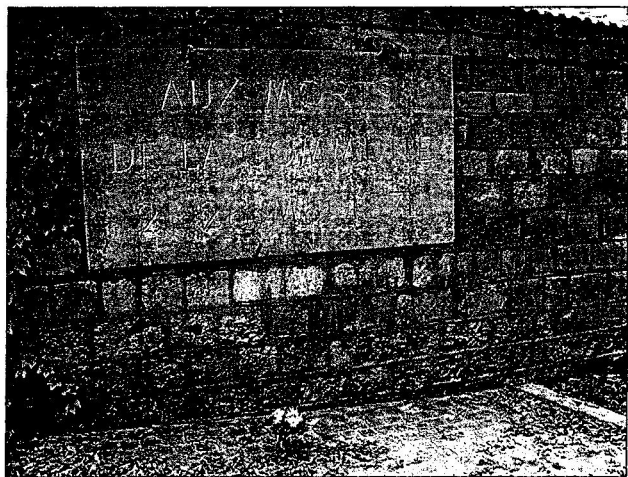
1940年10月，傷後初病癒，他離開中山南屏赴上海，入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之一的新新百貨公司工作，並與丁毅、徐可康（康溪）共同建立新新支部，嗣後，擔任黨的江浙組織工作委員會委員之一。

1944年5月，他與新新公司同事梁女士結婚。同年8月，便因受楊玉瓊被捕事件牽連被捕，幸獲同僚胡庭宇等幫助，及時逃脫，在崇明島暫避，開始教學生涯，直至1946年和平後

方返回上海，後長子出世。他從事教學，日教三校，包括與長期戰友李永爵經營民眾學校，為日間工作的青年人在夜間提供學習機會。

1948年8月，中共同盟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他被選為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不久，由於中共軍隊渡過長江，將攻佔上海，他鑒於中共一向對托派的敵視，深知難以在中共統治下的上海工作，於是舉家及時遷居香港，否則在1952年的全國大逮捕中也不能倖免於難。

他在居港期間，曾從事船務及印刷業，將大部份收入用以成立出版基金，支持組織的工作。1979年，他陪同香港組織的全臨會書記李西同志出席了第四國際第十一屆世界代表大會，嗣後共同遊覽了歐洲，憑吊巴黎公社遺址。



他於七十年代中期陪同家人移民加拿大。他亦身體力行，積極參與翻譯和撰文支持《十月評論》，他在八十年代曾分別出版了多部書，包括《毛澤東以後的中國》、《彭述之選集》共三卷、《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及《陳碧蘭回憶錄》。

他的兒女們成家立室，他與終生伴侶梁姊（我們對她的稱呼）兩人同居一屋，融洽相處，互相扶持，直至梁姊於2009年因癌病去世。

他年屆古稀，入住護老院後仍積極活好每一天，直至生命最後一刻。他雖然受手震及視力衰退影響難於執筆，但仍憑電腦和摯友保持連繫，每天讀報並借助錄音機記錄及整理有關中山托派的資料（部份刊於本刊本期，同時刊出譯文《我為什麼脫離印度共產黨？——痛恨斯大林及其領導的共產國際斷送許多國家的革命》）。

2010年他應卑詩省大學亞洲圖書館的邀請參與「人頭稅工作坊」，協助整理有關來自中山在加拿大入境時需要繳「人頭稅」的第一代華僑籍貫的資料。

澤鏗老戰友，為了實現他所追求的馬克思——托洛茨基主義，歷盡艱難險阻。他的一生貢獻，將永遠留在歷史的記憶中，他的燦爛笑容和雄壯歌聲亦將長存在家人和摯友心裏。

2014年8月6日



綠葉上的詩——記莫洛與鄭超麟的交往(轉載)

周履鏘

讀《甌風》第三集得知詩人莫洛(馬驊)已於2011年六月辭世，鄉賢仙逝，不勝感哀。

找出一本馬老贈我的詩集《我的歌朝人間飛翔》，翻開首頁，有馬老贈書的蒼勁娟秀的題字。重讀詩篇，感受甚深。這本書的附錄收有一首鄭超麟七絕古詩(第210頁)。原來是鄭老將莫洛的散文詩《綠葉上的詩》的古譯。現代人只有把古文、古詩譯成語體文，而鄭超麟竟將散文詩反其道譯成舊體古詩，真是一個創舉。

鄭詩：

讀莫洛先生新書，戲將書中一首新詩之意改寫為舊詩，以博一粲。

野遊得句無寫處，
綠葉權宜作小箋；
晨露任它滋筆跡，
朝暾照字更鮮妍。

1996，2，17。

玉尹老人

(此小序收入鄭超麟自編的《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時改為：“莫洛先生有一首散文詩《綠葉上的詩》，寫得很好，戲改成一首七絕。”第三句“晨露”改為“晨霜”。)

玉尹老人就是鄭超麟。

莫洛先生原詩：

綠葉上的詩

(我的詩句寫在綠葉上……)

初春明淨的天空，煽動絲絲微雲。不知從哪兒吹來一陣風，送來早開的梨花的馥鬱。淡黃的陽光從高空瀉下，蜜漿一樣浸淹著樹木。我的詩句像在貪婪地吮吸奶汁，它吮吸著綠葉上陽光的色彩。

清晨晶瑩的露珠，綴上綠葉的邊緣，滋潤著我的詩句。太陽高高升起，一顆顆把露珠收去。我的詩句受到陽光和露珠的愛撫，既有露珠的沁涼，又有陽光的溫煦。

(細雨沐浴著我的詩句……)

夏晚的南風，微微地吹，輕輕地拂，綠葉快活地左右上下搖擺。我的詩句像搖籃裏的嬰孩，在綠葉上吟哦低唱，合著微風的節拍。

細雨濛濛如煙，無聲地降落在綠葉上。我的被沐浴過的詩句。不沾一點塵土，如同初醒孩子的眼睛，閃動智慧的光澤，映出純淨的思慕。

(我的詩句隨同黃葉飄落……)

深秋的西風打樹梢上馳過，綠葉慢慢變成了焦黃。我的詩句隨同黃葉一起紛飛，飄墜到鋪著衰草的地面。蜣螂伏在土穴裏一動不動，蚰蚴兒也停止了彈拔琴弦。落地的黃葉化成了泥土，緊緊掩護著我的詩句。

我的詩句在大地的柔懷裏休息。——休息不是怠惰，也並非無所作為。我的詩句殷殷戀念著綠色的希望，和泥層下的種子一起私語歡談。

(我的詩句從冬夢中醒來……)

寒冬的日子晝短夜長，天空凝凍著片片彤雲。北風驟然刮起漫天飛雪，像無數白蝶在遊戲追逐。赤裸的枝條吹響哨子，覓食的麻雀啁啾在簷頭。我的詩句埋在土裏並未凍僵，它夢見如茵芳草，夢見解凍的河水丁冬響。

田壟上簪著冰花，樹幹上積著殘雪。欄裏的胡羊在咀嚼乾草，屋頂的炊煙在冷風裏盤旋。我的詩句打個哈欠醒來，很快掀開雪的被蓋。它要在殘冬放聲唱一支辭歲曲，曲

調的每個音符，都染有春天裏吮吸來的陽光的色彩。

（我的詩句自晨至暮，自春徂冬，經受過春陽，夏雨，秋風，冬雪……）

83年7月8日夜於溫州

這篇附錄，最後還有一附記。這“附記”實際上是一篇紀念鄭超麟的文章，其中有二段：

鄭老深度近視，又患嚴重白內障，雙目幾近失明，我贈他的書，只能請人讀給他聽。他對拙作《綠葉上的詩》頗感興趣，聽後將其改寫成一首舊體詩。他握筆寫字甚為困難，竟親筆將此詩寫於紙上，托人帶來給我。

我收到鄭老的詩以後，吟誦再三，深覺鄭老的改作遠遠勝過我的散文詩原作，實在欽佩，喜不自勝，又極為感激！

我對此事比較清楚，因為莫洛送給鄭老的書，是經由周仁生（任辛）寄給我，由我送給鄭老，並讀給他聽的。鄭老的譯詩，也是我抄正，連同手跡寄給周仁生轉送莫先生。當時我並沒有將詳細經過告訴他們，所以莫洛以為“聽後便將其改寫成一首舊體詩。”其實鄭老並不是在聽後，立即改寫成舊詩的。

鄭老的閱讀和寫作的方式與一般老人不同。他早年近視，老年反而不老花眼了，他是能看清字的，不過必須在強光之下。他用放大鏡把燈光集成一個光點照到字上，幾乎鼻子碰到書本，一個字一個字困難地讀。平時大都由我讀給他聽，但是他總覺得聽別人讀書印象不深，喜歡自己慢慢地讀。他寫字從不伏案，只是坐在靠窗的椅上，手拿一塊夾紙的小木板書寫，因為他看不清自己寫的字，只能憑意念盲寫，所以寫出來的有時串列，他喜用自來水筆，有時沒有墨水只留下一道劃痕。他寫的書信文章，大部由我抄寫，讀給他聽，核對後才發出去。鄭老的這首譯詩是經過數天親自閱讀原詩，反復思考，認真寫成的。

鄭超麟（1901—1998）福建漳平人，早年與鄧小平等人一起在法國勤工儉學，後留俄。回國後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曾任黨刊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嚮導》編輯，《布爾什維克》實際主編。大革命失敗後，轉入托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監獄共坐牢三十四年，晚年是上海市政協委員。電視連續劇《鄧小平》中出鏡三次，講述鄧小平三個不同時期 的生平。

莫洛先生自己說：“我和鄭先生既緣慳一面，亦未通信。”我每次回溫探親時，也未去拜訪馬老，聆聽教導。但我對二位老前輩是很敬重的。現在他們已仙逝，我記下當年他們這段不平凡的交往，以作紀念。

附記：

莫洛先生與鄭超麟的交往是通過周仁生和我的，我記得周仁生給我的信中對此有所述及，於是我找出舊信，發現有兩封曾有提及。摘錄如下：

1996年2月10日信：

今寄上馬先生的詩作，請轉交老超，這是老馬的一片心意，他對老超非常敬佩，實在難得。

1996年3月1日信：

前天接到你寄來的兩本書，一是《玉尹殘集》，內有給莫洛的信及老超的新詩古譯，二是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玉尹殘集》、信、七絕都已送給莫洛。他的歡樂心情，難以言語表達。他對老超的這一青睞，表示無限感激。他早已瞭解老超的知名度以及他在老黨中的地位，因此格外珍惜老超的墨寶，他幾乎把每一個字都加以揣摩，他認為你抄的“新詩第一首”，應為“新得的第一首”，還有“足跡”二字未必抄對，可能是“書跡”或“筆跡”，不管怎樣，總之，莫洛先生非常重視。

刊於《甌風》第八集（2014年10月）

中山托派及其抗日工作

起源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自1931年4派統一及後來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以來，組織先後多次遭受國民黨破壞，大部份領導人全被關押。直到七七抗戰爆發、南京失守前夕，一群人才得到機會獲得釋放，恢復自由。

劉家良(耀如)是其中一人，他原籍廣東中山，出獄後首先和他鄉間的故舊取得聯絡，在抗日救國的前提下，號召他們先在自己的崗位上行動起來。六十多年後，這批故舊今日記得起來的計有：黃靜波、繆國權、高翬、劉祖強、劉博、蔡振光等人。這幾個人當年都在幾間中學執教，很受學生們尊敬，而且一般都同意劉家良的政治理念。原來他們中前四人都已經先後參加了托派。

像師範學校教師黃靜波，當時他是中山縣教育委員兼縣立第六小學校長，其人沉實寡言，做事切實負責，對中山組織初期的發展實在功不可沒。直到80年代他去世前，依舊在精神和金錢上繼續支持托派活動，這位前輩，儘管他政治方面較弱，可事實上是應該讓我們永遠懷念的。高翬也是師範學校教師，38年初他帶領了克克劇社一班同學，和他的弟弟高明等十多人一起，前來二區隆都，與早先成立了的「中青團」一起，並肩作戰，積極展開活動，他就是戰後上海托派綜合性大型雜誌《求真》的發行人高擎宇。與黃靜波同樣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的繆國權，就大不相同了。他風度翩翩，口才了得，又特別喜愛戲劇，回來執教女中，一時成為青年學生的偶像；只可惜當年一聽到日軍的炮聲，這位老師便失去蹤跡，且從此離開我們了。劉祖強是劉家良的同鄉，參加訓練班後留在香港負責組織技術工作。後因太古船塢‘淺間丸’鬥爭事故，才慘淡經營起來的技術機關為港英警察破壞，他們兩人和一位太古工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鄭澤鏗遺作

人阿槐齊齊被捕，待逮解出境後便離開了運動。

淺間丸事件是一次由托派發動的反日愛國的光輝鬥爭。正當日軍瘋狂進犯中國時，受過區芳、梁幹堯革命傳統的托派在全船塢張貼標語，號召工人放下鐵錘工具，不要為‘屠殺我同胞’的日本郵輪‘淺間丸’工作。罷工結果，迫得郵輪只好拖回日本修理，鬥爭得到勝利。

廟街第一個訓練班

1937年冬，劉家良與彭述之、鄭超麟、王凡西、陳其昌他們取得聯絡後南下香港，主要經過黃靜波的策劃與安排，在九龍油麻地廟街一層樓宇內，開辦了第一個訓練班，參加者大部份來自中山。除黃靜波、繆國權、劉博間中列席外，基本成員計有：劉祖強、陳國權、陳坤宜、繆紹鼎、陳燕如、李鈿、劉麗卿、阮金兆、鄭致祥等人。

訓練班由帶病剛癒的劉家良主持，課題包括有：國際及中國的當前局勢，蘇聯黨獄黨爭的最新發展，中國1925-27年革命失敗的經驗與教訓，特別是有關第四國際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對世界大戰與中國抗戰提出的具體政治主張和任務。由於臨時租賃的樓宇設備全無，僅湊來一張木枱幾把椅子。各人又做筆記，都只好席地而坐。每天上課十多小時，為了避人耳目，早晚兩次先後分批出外填飽肚子，夜間各自又得和衣而睡。難怪經過十多日訓練班結束後，幾位身體孱弱些的不免也跟著帶病了。這時各人就實際條件獲發配工作，分道揚鑣；有人留在香港，有人被派返廣州，被派回中山的是：繆紹鼎、劉麗卿和鄭致祥三人。

中青團的成立和抗戰工作

回首當年日軍節節逼人，繼918進兵東北，又128上海之役後，蔣介石依舊堅持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加劇內戰，對日本侵略步步退縮。撤了馬占山、蔡廷楷司令職責後，還跟日本簽定塘沽協定。直至全國要求抗戰，群情激奮，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後，才勉強起來應戰。

蘆溝橋戰火燃起後，南京等地相繼失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1938年初，日軍部署攻打華南，頻頻轟炸廣州中山等地。這時石岐到處頽垣斷瓦，燈火失明，人心惶惶，市面亂作一團，許多機關、學校都宣佈休班停課，就在這樣完全陷入戰爭狀態的局勢下，一個由托派發動的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簡稱「中青團」）在1938年9月組織了起來。

其實中山群眾，特別是青年人的抗日情緒一直以來都已十分高漲。他們早在全國抗戰的激情下，經常走出課室，跑上街頭，唱出：《我們要選擇戰，不投降》，《我們要做主人，拼死沙場》的歌聲。而且許多學校都組成了宣傳隊、研討會和戲劇社等等，加上民間的自發團體，早像雨後春筍般一個個成立起來。時局日緊，群情激奮，後援會與自發的集會和組織興起，第六小學和象角青年的服務團在黃靜波指導下成立起來，各成員自覺自動承擔起責任，自力更生。組織的主要工作是宣傳抗日，教育群眾，以戲劇、歌咏、研討問題等方式方法進行；同時消防、救傷扶危、組織群眾；其中心任務是武裝工農保家衛國，誓死反日反帝反侵略。

1938年中，高擎宇、繆國權組織了「克克劇社」，在中山石岐等地演出抗戰話劇，包括《八百壯士》、《放下你的鞭子》、《故都春夢》等。是年9月，「中青團」與「克克劇社」合併後，最盛時超過三百人，包括劉家才、劉醉魯、鄭碧垣（鐵冷）、彭碧舫、吳漢添、何錫培、招志堅、劉桂安、劉祖潤、彭龍欽、王文本、劉泓、阮淑卿、方少儂、林榕盛、何畢生、

吳毗、吳渭川、劉伯珍、劉仲英、方立維等。除縣立中學、女子中學、二區中學之外，有簡易師範的高擎宇、有陸劍虹、劉廣秀、高明、劉小黑、李鵬、高峰等等。「中青團」各成員及其同情者，在抗日工作中都積極參與，奮不顧身，走上街頭工作。例如鄭致祥身負中青團副團長重責，便以身作則，即使在日本軍機進行瘋狂轟炸時，也走上街頭，救助死傷同胞。有一次，不幸被日軍投下的炸彈碎片射入胸部，幾乎斷送了生命；幸而得到其他人幫助，送到全縣最好的醫院搶救，由縣長特地聘請最著名的外科手術醫生醫治，取出了炸彈碎片，留院多月，才回家休養直至復原，再行工作。其他戰友，也常在抗日工作中受傷，更有許多人在遊擊隊戰鬥中被殺害犧牲，例如，托派中山支部在中山第五區瑚洲曾組織了一支農民武裝隊伍，由積極參加1925 - 27年第二次革命中省港大罷工的陳仲禧組織和領導，成員在20人以上，有少量槍械，在日軍佔領中山後，對外是與日軍作戰，保衛國土，對內是剷除土豪劣紳。但力量懸殊，陳仲禧在戰鬥中不幸犧牲，這支農民武裝也被打敗了。

「中青團」團長劉秀等人也曾加入袁帶率領的國民黨第四戰區第一游擊縱隊，企圖把它改變為農民武裝部隊，但發現他們實在是土匪，不可能加以改造，於是退出了。

此外，「中青團」曾廣泛發動糧食鬥爭反對奸商抬高米價，供應敵偽地區，在社會激起過很大的震盪，逼得縣長張惠長，要大軍壓陣，親自到商會長篇作答，必須壓抑米價，「中青團」這個鬥爭得到了勝利。

2013年12月28日

100多年前：資本主義的世界大戰和反戰的鬥爭

約翰·理德爾



約翰·理德爾寫作和編輯了多本書，包括最近的“走向聯合陣線”：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論文集。在其中，他解釋了100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如何爆發的，社會主義運動是怎麼反應的，以及革命反戰派是如何出現的。

一百年前，歐洲大國之間爆發了戰爭，引發了所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歷時四年多的殘酷衝突，對於人類與社會主義運動，是決定性的轉捩點，直至今天，它的影響仍然被強烈地感受到。

戰爭的導火線始於1914年6月28日，當時，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的繼承者弗蘭茲·斐迪南，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於塞拉耶佛。四個星期後，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政府發出實際上會破壞塞爾維亞獨立的最後通牒。

塞爾維亞拒絕了這些要求，於是奧地利在7月28日宣戰。接下來的七天，歐洲的大國加入了衝突：俄羅斯，法國和英國站在塞爾維亞一方；德國與奧匈帝國結盟。德國的入侵把比利時拖入了戰爭。

戰鬥最初的衝擊是不確定的，戰爭陷入了殺戮與大規模毀滅的僵局。交戰的名單不斷擴

大，包括奧斯曼土耳其站在德國一方（稱為同盟國）；義大利在英國和法國一方（稱為“協約國”）。

雙方都進行海軍封鎖，德國使用了潛艇。雙方都運用新發明的飛機作為戰爭武器。戰鬥蔓延到海外殖民地，日本佔領了德國在遠東的一些佔領地。

美國在1917年參戰，給了協約國以明顯的物質優勢。

* * *

對於歐洲交戰國家的人民，衝突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和死亡。隨著戰爭的進行，勞動人民的回應是罷工、抗議、叛亂和起義。1917年的俄國革命使該國在翌年三月離開戰爭。

1918年8月初，協約國軍隊開始全線持續推進。革命的浪潮席捲同盟國；德國工人和士兵的起義使戰爭於1918年11月11日戛然而止。

據估計，一千萬武裝人員被打死，同時還有七百萬平民喪生。交戰國的生產下降了約三分之一，把數百萬的工人陷於饑餓和貧困中。1918年，槍聲並沒有停止：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武裝襲擊在繼續；在德國，匈牙利等國家有工人的反叛；還有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叛亂。

戰爭結束時，一個工農共和國在俄羅斯成立了，從而讓俄羅斯掙脫了世界帝國主義的控制。同時，戰勝國攫獲了多塊歐洲土地和殖民地。在東歐建立了幾個新的資本主義國家。

勝利者形成了持久的聯盟，即國際聯盟，本應維護和平，但帝國主義競爭一如既往，持續了20年，歐洲和世界都陷入更具破壞性的衝突中。

* * *

1914年之前，社會主義運動在全歐洲享有大眾的支持，它預見到即將到來的衝突，並加入阻止戰爭威脅的努力中。

1907年的社會主義國際（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會議表示要“盡一切努力防止[戰爭]的爆發。”如果戰爭爆發，社會主義者會“干預以使其迅速終止”，並且“用一切力量，利用戰爭引起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喚起群眾，加速資產階級統治的垮臺。”

引文出自社會主義國際（又稱「第二國際——編者按」）的左翼領導者羅莎·盧森堡。雖然措辭謹慎，它卻包含了一個明白無誤的承諾，即通過工人革命的努力來應對戰爭。1910年和1912年的國際代表大會重申了該諾言，而且這期間，包括在1914年，發生了許多強烈的反戰行為。

當1914年8月戰爭來臨時，每個國家的統治者利用其對報紙和主流社會機構的控制，強行把戰爭解釋為純粹的自衛行為。社會主義行列的一些人受到這一連串洗腦的影響。社會主義運動面臨一個威脅：反戰行為將迫使他們處於違法狀態，犧牲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管理和出版機構，把他們置於嚴厲鎮壓下。

在這樣的前景面前，英國、法國、比利時和德國的黨領導層四分五裂。在1914年8月4日，國際最強成員的議會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一致投票決定，資助德國的戰爭努力，公然否定社會主義的原則。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的領導人也是這樣，所以社會主義國際垮臺了。只有在俄羅斯和塞爾維亞，社會主義者堅持他們的承諾，反對戰爭。

俄國社會主義陣營的布爾什維克派的中央領導人列寧，當時住在對面的奧匈帝國邊界內。

8月8日，地方當局逮捕了他。他在奧地利社會主義者擔保下出獄，他轉到了中立國瑞士，9月5日抵達伯恩。在接下來的三天裡，他與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在會議上相見。就其社會

主義對手的戰爭問題，他們通過了第一次重大聲明。

布爾什維克聲明，這場戰爭的性質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和專制王朝”的，接下來說：

“爭奪市場和任意掠奪外國，努力爭取壓制各個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和民主，有意欺騙，分裂和屠宰所有國家的無產者，挑動一個國家的雇傭奴隸反對另一個國家的雇傭奴隸，從而圖利於資產階級——這是戰爭的唯一真正的内容和意義。”

布爾什維克聲稱，主要的社會主義政黨支持戰爭意味著“[社會主義]國際的思想政治破產。”交戰集團中絕沒有某一方好於另一方的問題，他們說。

士兵和工人需要“使用武器，不是反對他們的兄弟，其他國家的工資奴隸，而是反對所有國家的資產階級反動政府，”布爾什維克說。他們主張“俄羅斯革命”和“受俄羅斯壓迫之民族的解放和自決。”

聲明忠實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國際的戰前立場，也準確地預測了1917年俄國工人和士兵實際採取的革命進程。

* * *

隨後的六個月，德國社會主義的革命派舉起了自己的旗幟，啟動反戰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組織。

1914年八月初，社民黨批准戰爭開支，對此，該決定的幾個左翼反對者在羅莎·盧森堡的公寓聚會，決定發出300電報給左翼黨的官員，請他們討論關於8月4日背叛的一個集體回應。收到的明確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個，是來自克拉拉·蔡特金的回應。

然而，反對派鼓動了一些地方社民黨組織。例如，在蔡特金紮根的斯圖加特舉行了社民黨領導人會議，譴責戰爭信貸投票81比3的結果。

9月21日，社民黨反戰運動的議員及戰前領導者卡爾·李菊克內西，在斯圖加特會見一組黨的傑出領導人。他們斥責他，說他未能打破黨

的紀律，在8月4日表決中反對戰爭支出：“你們批評我，說得很對，”李蔔克內西回應。“即使獨自一人，我也應該說出我的‘不’。”

十一月，盧森堡當地黨支部暗地裡發出了一個資訊，呼籲進行地下工作，建一個新政黨。“如果8月4日社會民主黨這部分履行其職責，”該資訊說，“那麼組織的外在形式可能會被破壞，但精神會留存……”

12月2日，因為一個戲劇性的行動，社會民主黨（SPD）中少數人的觀點，打破了審查。李蔔克內西在議會投票反對戰爭開支，“抗議戰爭；反對那些發動它和指揮它的人；反對引發它的資本主義政策；反對發動戰爭的資本主義目標……”李蔔克內西的大膽立場在歐洲迴響。

1915年3月26-28日，蔡特金在伯恩召開第一屆戰時社會主義國際大會：社會主義婦女運動大會，與會者為來自七個國家的29名代表。“只有人民的團結決心可以停止屠殺，”大會宣稱。“打倒資本主義……打倒戰爭！前進，社會主義！”

在隨後的一個月，代表九個國家、擁有數萬名會員的社會主義青年同盟，在伯恩舉行了類似的會議。

* * *

在1915年9月，來自11個國家的42名代表聚集在瑞士齊美爾瓦爾德附近。在會上，以布爾什維克為首的左翼，強調需要同支援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劃清界限，要進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其他勢力則強調要為和平而鬥爭。

不過，在這次會議上，所有派別聯合號召工人爭取沒有兼併和賠款的和平。大會指出，爭取和平的鬥爭，也是為自由而戰，為人民和解和社會主義而戰。

齊美爾瓦爾德宣言，大部分由托洛茨基起草，在交戰國家違禁散發，成了革命工人高舉的一面旗幟。這場戰爭持續了可怕的三年。到它結束時，齊美爾瓦爾德的口號在歐洲成了講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數百萬工人和士兵的聲音。在1917年和1918年，他們在俄羅斯，德國和幾個鄰國進行了革命。

宣言部分內容如下：

“戰爭已經持續了一年多，數百萬的屍體覆蓋了戰場……極端的野蠻主義今天慶祝其戰勝了迄今構成人類價值的一切……

這場混亂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產物，是每個國家資產階級，為了填滿他們利益貪欲而剝削人類勞動和全球天然資源的企圖的一部分。……

（我們）呼籲工人階級警覺起來，為和平而戰。這場鬥爭是爭取自由，爭取民族和解，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無產者！……你們必須為自己的事業站出來，為社會主義的神聖目標，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以及被奴役階級挺身而出……以實現這一目標，再大的犧牲，再重的負擔都不過分，這個目標就是：人民的和平。……

超越國界，超越硝煙滾滾的戰場，超越了滿目瘡痍的城市和鄉村：所有國家的無產者，聯合起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個世紀以來，齊美爾瓦爾德的精神依然迴蕩在我們反對戰爭和壓迫的全球鬥爭中。

2014年7月28日

社會主義工人

（本文中的語錄摘自列寧的‘為革命國際而鬥爭’，約翰·理德爾主編的文集（由探索出版社發行）。參見‘反戰之戰，齊美爾瓦爾德運動綜述’，R.克雷格·納順，乾草叢書。）

註腳

[1] [HTTP://www.haymarketbooks.org/pb/To...](http://www.haymarketbooks.org/pb/To...)

我為什麼脫離印度共產黨？

——痛恨斯大林及其領導的共產國際斷送許多國家的革命

馬根·迪賽（印度）著 鄭澤鏗譯

這是馬根·迪賽（MAGAN DESAI）同志從巴羅達（BARODA）監獄發出來的一封信的全文。當時他正式脫離了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派（CPI[M]）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信的原稿是用古則拉特（GUJARATI）文寫的，由沙勒·扎華里（Sharad Jhaveri）同志翻譯成英文。-----出版人。



引言

斯大林主義者在他們控制下的工人運動中，對一般黨員的獨立思想，總是極力地加以抑制或摧殘，因此，要明白斯大林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本質，對一個真誠的但在錯誤領導下的共產主義工人來說，首先需要一個在其思想上及行動中的知識革命。但過去事實證明，人們要進行思想革命，尤其是在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向將斯大林主義誤解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卻構成唯一致命的弱點。很多人往往由於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墮落和腐化的影響，結果對革命運動失望和放棄，而不在思想的創造

性上對共產主義作健康的評價。霍華德法斯特（Howard Fast），“上帝的沒落”（The God that fail）的作者，以及很多的斯大林主義者，都有着這類的同一演化過程。

與這類“前共產黨員”例行的演化相反，馬根·狄賽的反對斯大林主義（無論它的右傾及左傾，無論它的親莫斯科或親北京等各種不同的傾向）的鬥爭，在他宣佈脫離印共聲明的文件中雄辯地證明，他從懷疑而終至否定整個斯大林主義的原則立場，是思想一致的，不認為需要摒棄馬克思主義，相反，不像那些一時傑出的斯大林主義者轉過來反對共產主義那樣，他認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及道德上，是認識他過往的斯大林主義錯誤的唯一的辦法。

這裏無須把馬根·狄賽的思想演進理想化，我相信，所有與這文件有關的人（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展望”編輯部），他們最先連續刊登馬根·狄賽脫離印共的信，更不是想去創造任何的“個人崇拜”。這文件的發表，不僅標誌着馬根·狄賽同志在沒有協助之下，盡了最大的努力去獲得及研究里昂·托洛茨基的著作以及托洛茨基主義，那時他還在獄中，仍然保持着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而且在斯大林主義對共產黨一般基本成員控制的條件下，他為了獲得真理的艱苦鬥爭，也傳達了馬克思主義同志般的溫暖。

許多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反對將這文件在“馬克思主義展望”連續登載，他們認為在印度唯一的真正馬克思主義期刊的寶貴篇幅中，不應刊登這樣次要性的文章。關於這一點我要特別地指出，這文件雖然沒有在斯大林主義傳統的印度共產黨刊物出版過，但已經引起了斯大林主義圈子內強烈的爭論，廣泛地幫助了許

多斯大林主義影響下忠誠的工人層份所同樣經歷的思想進程，由此而脫離了斯大林主義的運動，參加了印度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代表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反對將這文件出版的人，我以爲他們還沒有看到這文件在道德上、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力量。

總括說來，沒有比這文件更充滿人性的了。如同在現實生活一樣，它清楚地描述了一個堅貞的共產黨員，不屈不撓地爲着共產主義的目的而奮鬥。在五十年代初，當馬根·狄賽在學生時期，他已經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每一個斯大林主義發動的鬥爭中，他總是站在最前線。他是古則拉特地方印共組織的創建者之一，他是最早用古則拉特語將共產主義讀物通俗化及系統地銷行的人。目前他是里昂·托洛茨基所創立的第四國際印度支部，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人之一。

由於他個人觀念明顯的重新確立，因此這封信是值得共產主義者隊伍中人嚴肅的關注。在這國家裏，我熱烈希望它的發行將有助於別的忠誠的共產黨員在重新確立他們的思想觀念時，能夠抓到斯大林主義的問題。

沙拉德·查維利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於占那加爾
(Jamnagar)

(一)

長久以來，當我在監獄中時，經過廣泛的閱讀和嚴肅思索，配合了自己的經驗和觀察，已經把個人和黨交織的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得出了一個結論；研究下來，發現我和黨之間的鴻溝一直在擴大，我不以爲在現在或長此下去的情形中會把這距離縮短。

對印共政治意識形態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概念方面我沒有不同的意見。偉大思想家馬克思和列寧考慮問題是從整個星球和時代出發的，馬克思主義積累了人類社會各個階段發展的經驗，因此，他們的思想早已成爲世界的願望。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我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歷史唯物論，而且力圖儘可能地把它的基本觀念結合到自己的智慧中。

但今天，我並不認爲那些被稱爲「正統馬列主義者」的斯大林及其隨從們（不管是“右傾”的柯西金或“左傾”的毛澤東）會有任何的前途。所以我不贊同自列寧死後官方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實行的戰術和策略。由於局勢的改變，國際斯大林主義便開始倒退且面對着一個嚴重的危機。事實不能否認，在印度和世界上別的國家一樣，共產黨也分成左右兩翼，不是跟隨“左的”北京便是跟隨“右的”莫斯科路線。

十九及二十世紀過去社會上的變動都是國際性的，以後的轉變亦將如此；在印度，一個政黨也不能逃出這規律。我不同意印共對馬列主義前途的分析，和它對實際鬥爭的戰術與策略。這點需要澄清的，我不相信現在還會含糊。真正的馬列主義是簡單準確的思想，而不是巧立的詞句。這說法表明它何以是一種具有精神的智慧的推動力；但這樣一個水晶般清澈的思想，特別是早在列寧死後已經消失，那被稱爲“正統”的斯大林主義已把它作成爲另一種宗教式的崇拜了。

真正的馬列主義並不是僅僅從馬列的原著中引用一些語錄，而是把它作爲分析轉變中的局勢與作出判斷的科學方法。可是在印共的傳統中——由斯大林主義建立起來的傳統，不管左派或右派這種方法都是不存在的。保持馬列主義作爲一種宗教的各種方法仍然推行和實施着，黨內依然遵循着武斷和自欺，用這個來代替真正馬列主義的科學分析，這一切都同樣承襲自斯大林主義。

下面是我對馬列主義認識的幾個基本論點：

（一）階級鬥爭；（二）無產階級專政（基於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而非一個直接由工人階級實現的獨裁）；（三）運用列寧主義管理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則；（四）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段的領導地位；（五）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定義；（六）工人民主或蘇維埃民主；（七）

關於不斷革命論的列寧主義原則；（八）階級鬥爭的絕對必要無論戰爭或和平，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反對階級合作的觀念；（九）在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中，蘇維埃民主的絕對必要；（十）以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在世界革命運動中建立革命的領導；（十一）無條件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

這些要點可以概括為兩個原則，那就是：1・辯證唯物論和；2・歷史唯物論。這兩者我已毫無動搖地及永恒地對之深深信服。我現在開始相信，斯大林時代已經在上面所提及的許多要點上把馬克思主義和革命運動貶值和庸俗化了，在斯大林時代中革命的大退卻，這個罪惡的陰影即使現在仍然投射在各地的革命運動中。

自列寧死後長期以來，真正馬列主義的優秀遺產，已經而且還正在給斯大林主義所消滅，現在每一個有思想的共產主義者起來公開保衛它的時機是成熟了。

所有親莫斯科或親北京的官方共產主義運動的派別，都自稱為代表真正馬列主義的傳統，但他們的全部行動都是需要我們再作嚴肅的檢討的。



Stalin, Lenin y Trotsky

階級鬥爭的原則

依照列寧的標準，現代階級鬥爭可以劃分為四個範疇：（1）資本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2）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段鬥爭；（3）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的民族解放鬥爭；（4）全世界勞苦群眾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

由於它的本性，帝國主義努力於從事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和武力征服沒有抵抗能力的弱小民族，它經常為爭奪殖民地和市場造成帝國主義內部的衝突，而且在備戰經濟和國際帝國主義計劃的壓力下，必定要向勞苦群眾挑戰。

在斯大林時代，共產主義運動對於世界形勢根本沒有一個均衡和科學的列寧主義分析。對國際革命運動的分析，都是機械和片面的，沒有將事變作全面均衡的比較。印度共產黨的歷史，它所追隨的國際和國內政策，便是它破產的活生生的明證。

在1942年，帝國主義戰爭突然轉變為“人民戰爭”。面對着一個民族解放鬥爭，他們居然採取了機會主義和逃避的態度。黨在群眾被捲入了民族解放鬥爭後陷於孤立；全世界所有共產黨都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和獲得一個臭名。因為他們把自己完全附屬在蘇聯的國家利益下。這是一個關於保衛蘇聯的錯誤觀念。

蘇共黨稱他們在東、西歐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與中共宣稱其革命的立場時，兩者都忘記公佈他們自己矛盾的立場。當蘇聯領袖在強調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時，中共只在強調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事實上兩個黨都只看到他們自己狹隘的官僚扭曲了國家利益和眼前好處。因此彼此都採取了機會主義的態度。

就整個國際意義來說，殖民地革命鬥爭和中蘇民族利益互相間是並無矛盾的。但中國目前追求這種進步性有限的反帝政策，最後是否可能重新恢復和蘇聯領袖間的友好關係是可疑的。（譯者註：作者這文件是1965年年底寫的，現在中共早已從勉強的反兩霸改為只反一霸，根本連「進步性有限」都談不到了。）在1957年之前，當蘇聯領袖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鬥爭中採取機會主義政策時，中共對所有重大問題的沉默態度是很有意思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必須記取第二國際伯恩斯坦修正主義者所實

行的和第三國際斯大林主義者所實行的政策，都同樣挫敗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仍然扮演着機會主義的角色。

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需要推進階級鬥爭的形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ABC。相反，實踐四個階級聯盟的口號乃是爲了什麼目的呢？不是爲了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爲了獲得民主的權利和通過憲法的手段去“改變”。當納粹及法西斯失敗以後，在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的共產黨變成爲一種力量時，斯大林提出這個口號。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斯大林和羅斯福、邱吉爾簽署了波茨坦和瓦爾達協定的結果。在這戰後的兩次會議中彼此同意：斯大林處理東歐不得干涉西歐，同時，帝國主義列強亦不得干涉東歐。

西歐各國共產黨戰後的策略，完全從這個協議的精神出發，而絕不根據這些國家已成熟的革命形勢。依照客觀形勢的要求要去發展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策略，等於要向斯大林戰後策略挑戰，這種布爾什維克精神，早已給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傳統殘暴地拋去了。在希臘，在反墨索里尼的人民戰爭的覺醒中，共產黨本來已經變成一種力量，但大戰以後是誰讓這個黨給英、美的僱傭兵屠殺，是誰讓戴高樂在法國建立起統治，讓意大利反動的資本家走回政權，又讓希臘建立起軍政府來的呢？所有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所頌揚的“偉大馬列主義者”斯大林隻手遮天時代發生的。

所有歐洲的共產黨都患了改良主義及機會主義的疾病。斯大林在列寧主義掩護下養育改良主義，赫魯曉夫領導層一方面反斯大林，卻另方面收穫了這改良主義的果實，而毛澤東則用公開指摘蘇聯的非斯大林運動來代替對斯大林的責難。他把輓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都忘記得乾淨了。難道這就是列寧主義的真義了嗎？

落後資本主義國家不能憑其本國市場發展生產力，因爲面對帝國主義的壓力，這些國家無法建立起本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依列寧說，沙皇時代俄國資本主義的生產主要得助於法國

資本，在那時候，俄國是一個殖民地國家（但依據最近中國也發現，在1917年的俄國已是帝國主義國家了）。怎麼談到保衛列寧主義時，中共領袖竟忘記了列寧的歷史文件了？是記憶上的錯失還是機會主義？中共領袖的手總是搖擺於經驗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

十月革命是解決生產力與國界矛盾唯一的方法，其戰略是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結合在一起。這兩個革命階段無法分得開來，並且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完成。事實上，十月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性的了。

十月革命證實了這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論點：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不論從歷史上和組織上，都是無法完成這過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這一意見已變爲指引全世界所有落後或未開發國家革命的明燈了。

(二)

1924年列寧逝世之前，東方革命浪潮已在蔓延，中國1925-27年正是處在革命的漩渦中。可是剛好在列寧死後還不到一年；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產國際便把孟什維克的方法代替了布爾什維克的戰略，中國共產黨不是反對蔣介石；最低限度俄國的孟什維克還堅持：資產階級應該在工人階級幫助之下奪取並保持政權，但不需要工人階級的機構附屬於他們之下。可是在中國，在斯大林主義的孟什維克戰略諷刺劇之下，中國工人把自己的手和腳完全綁住。最初支持所謂資產階級右派蔣介石，最後支持所謂左派汪精衛。在中國，資產階級獨裁便仍舊維持，連俄國孟什維克還不致走得這樣遠。結果，中國革命流產，殖民地和落後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運動便這樣在列寧主義外衣和孟什維克改良政策下給絞殺了！

在整個斯大林的年代裏，共產國際的政策經常向兩極跳躍，時左時右，沒有一個國家的革命在這樣的政策下達到成功的。今天赫魯曉夫只不過執行着同一的政策。在中國，當戰鬥

的工人階段被大屠殺以後，重新給了蔣介石二十五年血腥的統治。毛澤東應該不會忘記，中國1948年和南斯拉夫1945-47年的革命都是越過了斯大林的限制才取得勝利的，兩國的革命都曾為斯大林所反對。

毛派的“新民主革命”觀念只不過是對抗斯大林支配共產國際鐵的紀律一種自衛的反應。毛澤東在1925-27年流產的革命中得了教訓，將它的“新民主革命”觀念應用於斯大林主義的戰略。在口頭上毛派的理論是二元性的，但在事實上毛是跟隨了列寧主義的實踐，中國1948年革命的發展突破了斯大林主義所限制的範圍，結果走上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所謂列寧主義觀念的一個不間斷的革命。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本質上是進步的嗎？不是的。對斯大林認為“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這理論，毛只是在口頭上加以宣揚，毛曾知道中國1925-27革命領袖陳獨秀的悲劇命運。陳獨秀不同意斯大林主義的路線，經過自己的探索終於徹底認識了列寧傳統的意見，共產國際最後用官僚的紀律制裁他，但陳仍在黨內不斷地反對斯大林的政策。蔣介石和右傾的國民黨當然歡迎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政策，藉了它的幫助，他屠殺了年青的共產黨及無數的工農戰士幹部。作為失敗的代罪羔羊，陳的黨領導地位由李立三代替。於是斯大林命令中國共產黨承認這個所謂左派國民黨汪精衛的領導，同時還拉攏着蔣介石，委任他為共產國際最高委員會名譽委員。到戰鬥的城市工人及鄉村的農民先後給蔣、汪屠殺以後，陳獨秀向世界共產主義者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揭露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叛賣政策。因此，他被斯大林污蔑為工人階級的敵人，關在蔣介石的監獄裏，後來以至死亡。在他的公開信裏，他徹底分析了斯大林不民主地強加於中國共產黨的自殺政策。不管一九二五——二七事實的經過，陳獨秀一直被視為中國人民的敵人。毛澤東應該從陳的經驗中學得一些教訓的，但今天他的列寧主義演變到這個地步已和斯大林主義分不開了。

馬克思和列寧從來不用這種態度對待過去

及同時代的人甚至階級敵人的，馬克思相信每一個個別領袖都自會從其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給他自己以適當的評價，他給資產階級和經濟學者如亞丹斯密和里加圖以很高的稱讚；列寧也從不用謾罵來反對他的對手——十月革命頑強反對者普列哈諾夫，甚至如高爾基，一直到十月革命以後都給予很大的讚揚，普氏的“史的一元論”在十月革命以後最少也教育了兩代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列寧把他尊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之父；高爾基也被重視為無產階級的作家。在這方面，毛澤東和他的“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斯大林有些什麼紀錄呢？

歷史證明，除了他自己以外，斯大林將整個布爾什維克及所有列寧的親密戰友不僅排斥而且都消滅了。他把歷史的真實情況和地點、日期與名字都任意更改，以便能專斷地將革命的功勞都歸於他自己，他以列寧的繼承人自封，把列寧全部有關反對他的文件封鎖，只准把有利於他的，或特別是把原文經過大量刪節後的部分發表。

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是全世界工人的集體財富，斯大林憑什麼權利去操縱和篡改列寧的著作呢？難道他完全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做，抑或這是國際革命運動的異化或衰退情況呢？我們又怎能夠解釋這一顯示道德墮落的惡棍竟絲毫沒有受到挑戰呢？

壓制列寧著作發表

最近赫魯曉夫出版了一些迄未發表過的列寧文件，這可能是有利於目前蘇聯官僚領導層的利益所致，但列寧的著作仍未全部出版。查禁了陳獨秀“公開信”的毛黨對斯大林查禁列寧文件的行為說過什麼呢？在散播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毛澤東黨用世界好幾種文字出版了十多本摘錄自列寧著作關於世界革命運動前途的小冊子，這一步驟是值得受歡迎的。但為什麼中共忘記出版列寧最後的遺囑和他許多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民主的論述呢？是不是俄國和中國的分工合作只出版有利於自

己的列寧著作呢？在俄國，赫魯曉夫集團採取些表面的措施使黨和國家行政實行虛偽的民主化，這樣做只爲了保衛赫魯曉夫輩官僚層的狹隘利益。毛澤東黨指責他是修正主義，而赫魯曉夫輩則譴責中國對國際主義的立場敷衍塞責。爲了促進各自的民族利益，他們採取的是僵化的宗派主義立場。不僅這樣，每一方面都互相指責對方變成了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叛賣了列寧主義！這個已經不算時髦的誹謗，使全世界有責任感的共產主義者都引為羞恥的。

事實上，蘇聯及中共領導層所採取的有限度的進步措施是應該讚許的。同時他們雙方的黨和政府都把自己裝成爲列寧的唯一的真正繼承者，他們對社會主義民主，這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基本原則所造成的破壞，卻更應該受到強烈的批評。因此全世界自覺的共產主義青年們便升起了一個要獲得更多原本馬列主義思想的願望，這一願望現在是更加大大地增長了。

中共在理論立場上的許多污點阻礙了人們對中共政策的進步性方面作客觀的理解和判斷。中共爲了要表示他們愚蠢的自稱為無所不知者，他們用盡了一切辱罵、傲慢和放肆的言語。最近中共領導層用好幾種文字出版了一本題為“人民戰爭勝利不朽”的手冊，作爲世界革命的新“藍本”，宣稱為列寧“十月道路”的補充，而且可作爲應用於世界各國的新“藍本”。

列寧的“十月道路”是全世界被剝削大眾的國際康莊大道。中國領導人要把他們的新“藍本”作爲列寧十月遺產的直接產物，提出的理由是證實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俄國被斷定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列寧的十月道路已不適合於當前這時代。

事實上，這一點一定要加以嚴正駁斥的。根據列寧的意見，沙俄是個殖民地國家，她雖然統治了中亞細亞的落後地區和西、南俄羅斯的少數民族，但這並不是沙俄統治在十九或二十世紀帝國主義的單一的特徵。相反，外國資本‘特別是法國的’在俄國經濟中握有很大的支配力量。在現代，一個殖民地國家就是她的

經濟為外國資本所控制，因此，用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我們不能把革命前的沙俄認作帝國主義。法國資本控制了俄國經濟，這便是爲什麼列寧把一九一七以前的俄國稱爲殖民地國家。

爲什麼自稱爲馬列主義的毛黨會把馬列主義這些基本的定理也忘記了呢？正如我們在上面指出的，毛澤東像附着了斯大林那“偉大的馬列主義者”的陰影，對這個問題始終保持沉默。列寧在許多演講和文章中對十月革命的教訓作過很多精確的分析，以進一步闡釋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綱”，他的共同工作者——國際著名的共產主義者——也給他的著作加以發揮。但自列寧死後，斯大林對這些文件不是扣壓起來，便是索性把它毀滅掉，今天祇有一些流傳在歐洲的副本保存下來。蘇聯官僚統治層否認列寧合作者們這裏無疑指的是托洛茨基——譯者的著作，可是不管怎樣，現在追隨他們的人早已遍及全世界。中、蘇兩國的領導層對列寧關於十月革命的敘述和分析一直保持沉默，假如列寧的著作曾被官方發表的話，對斯大林時代的許多爭論都已結束，但那是不可能的。

背離了列寧主義

從狹隘的民族利益出發，中、蘇兩國的官僚層便築起了一個大障礙。不論過去或現在，蘇聯領導層在這方面都被揭露和受人嘲笑的。因爲從斯大林到柯西金，所有蘇聯的領導層，無論在國內或國際政策上都是背離了列寧主義，讓覺醒中的蘇聯工人和青年們去比較統治集團今日的政策和過去列寧時代的政策作個分別吧！今天的領導已不可能容許將列寧時代的傳統作出一個真正的客觀評價，這領導層正坐在斯大林過去三十年來所造成的矛盾的火山口上，受着群眾和官僚派系間的壓力，而各派系在內部鬥爭中被強迫作爭取下層群眾的支持。

由於各方面的壓力要將列寧的著作照原本出版，數年前莫斯科曾宣佈過計劃把全集編為五十五卷出版，但除了俄文及英文版出了第一至第二十二卷外，跟著便直接出版第三十五卷，

此外其他各卷都禁下來了。第二十三卷至三十四卷和第三十六至五十五卷怎樣了呢？沒有出版的各卷包括了列寧1917-24年時期的著作，而這些著作正是使斯大林憤怒的。至於列寧經過深思熟慮後指責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作風寫出來的列寧遺囑，當然同樣被禁止下來了。這說明了為什麼毛澤東對這些一直保持謹慎的沉默。如果他真的去着手出版列寧的全部著作，那他為着世界革命所製訂的“藍本”的命運會怎樣呢？不正是將它的基本缺點、模稜意思和前後矛盾都暴露出來嗎？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將會很容易地比較出列寧原本的十月道路和中共“藍本”偽造的道路之間分別出來的，毛當然不想這樣，但從拉美革命動力在全球階級鬥爭紅爐中考驗了真正列寧主義的道路與斯大林所提倡的虛偽的道路。危地馬拉、波利維亞和最近哥倫比亞與拉美國家都誕生了新的布爾什維克黨，這些黨都拋棄了斯—毛的臭包袱和騙人的舊技巧，這反映了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嚴肅風格和崇高精神。拉美革命運動對列寧主義概念的實驗是遲早會發展到亞洲、非洲來的，但毛澤東會收回他那殘缺矛盾的藍圖嗎？

我不相信中共會表現出這樣真正布爾什維克的坦率精神來，相反，它是極其教派的。他們指責赫魯曉夫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卻並沒有避免這種病毒的傳染；同樣，中共自己的表現也是沙文主義的。像“斯大林是最高無上”、“毛澤東戰無不勝”的神話已經早在中國努力散播了。中國的世界革命藍圖（指“人民戰爭的勝利不朽”一書所代表的農村包圍城市戰術——譯者）早為印度共產黨於一九六四年在加爾各答召開的大會中接受了。我們的黨曾解釋過中共領袖為什麼採用這條路線，但假如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難道它也一樣適合於我國（印度）嗎？

今天拉美國家的情形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相似。但正如我上面說過的，不管她們之間有些地方相似，拉美國家的共產主義又無在革命實踐中是採取列寧主義的道路的。從印度經濟發展的工業水平來說，它是大大的超過了革

命前的中國或今日的拉丁美洲的，印度資本主義是全世界落後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進步的一個，以中國國情作背景的“藍圖”不可能也適合於印度。主要的問題是，是否如我們（印度共產黨左派）綱領中所說的“人民民主專政”，城市中弱少的民族資本家和鄉村中的富農能否一起協助工人階級和農民去達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是工人階級和受壓迫的農民，那富於經驗而又警覺的資產階級，和那些不為千萬民衆的貧窮或甘地（GANDHI）與溫奴巴（VINOBA）的呼喚所動搖的所謂“反專利工業家”們，會被驅使去為社會主義革命工作嗎？黨當然不會相信這類奇跡出現的，可是它又盲目的仿照着中共的領導層去做。為什麼我們不理會本國的特別實情，習慣像尾巴般跟在別個黨後，過去跟著蘇聯，現在又跟著中國變成毛黨的附庸呢？

（三）

無產階級專政，廣義來說就是工人階級行使國家政治權利去建立在社會和經濟上統治的地位，由此而使得無產階級的主要階級利益得到保持和保證。馬克思及列寧從來不曾在說明無產階級專政時，把他們的思想公式化而不去分析它的各種憲法形式。像資產階級專政一樣，無產階級的統治也可能揀取民主或極權的形式。列寧主義明白到，當革命變成內戰時期，無產階級專政對它的階級敵人是應該無情的。但往後這個政權穩定了便需要實施更多的民主。俄國革命即使在內戰發展到最嚴重的轉捩關頭時，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一直容許各種不同政治傾向通過蘇維埃作充分的自由表達，為了革命本身的利益，共產黨僅僅實施了有限度的管制。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藉口蘇聯已經踏入社會主義第二階段，亦即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廢除了蘇維埃民主。事實上當時俄國只是踏上工業化的第一步，工業上進展的每一階段並不就是社會主義，這本來是列寧主義者的公理，但誰要是把這公理提醒斯大林便會被標誌為社

會主義的敵人。無產階級專政已給斯大林個人獨裁所代替，而個人獨裁和馬列主義觀念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全無共通之處的。每個人都已清楚知道，在斯大林統治的恐怖時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裏的情形（真的，這個問題的爭論已發展到矇騙了工人階級，以為那恐怖階段是不可避免的）。這斯大林主義恐怖的陰影，即到如今還在困擾着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二十世紀中葉（後半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提出的主要問題是：這時期的左派革命運動應該由誰來控制？是專橫獨斷，不負責任的黨官僚呢，還是真正代表千百萬被剝削的下層人民自覺的工人階級？

在斯大林執政的年代，所有通過人類智慧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成就的價值都受到了危害，而主要的解決辦法應該是工人的管理。我堅信社會主義民主的蘇維埃形式終必勝利，但目前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一個開始做到這樣的社會主義民主，事實上這樣的民主已給窒息了。

這便說明了為什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工人公開反叛斯大林的追隨者，和匈牙利無產階級在工廠內建立起蘇維埃可以抵抗斯大林主義者的鎮壓達六個月之久。“溫和的”赫魯曉夫和“極端的”毛澤東同樣為這情景所驚嚇，立即派軍隊把革命粉碎。反動份子企圖奪取領導層，想把革命引導到錯誤的方向是毫無疑問的，但沒有人解釋過，是不是列寧的蘇維埃民主觀念已經過了時。人們只是教徒般虔誠在口頭上高唱列寧主義，這也不阻止他們無恥地將列寧著作對他們不利的部分隱瞞。一向以來對每一事件，或對統治與經濟上的發展和轉變的馬克思主義認真的分析，都被為符合於為保衛蘇聯與中國官僚統治層狹隘利益的機會主義政策所代替。

斯大林是善於這一技巧的，毛澤東又怎樣呢？中共領袖們就南斯拉夫的墮落寫了許多大文章，但對南斯拉夫的真正發展卻不屑一顧，中共的作家是憑他們的喜惡去寫作的。當然，

我並不袒護倒退的南共，所有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這些基本的錯誤，難道在捷共和波共中找不到和南斯拉夫同樣的缺點嗎？事實上，南斯拉夫建立了工人議會（當然它存在有許多缺點），而赫、毛份子卻狡猾地避免加以討論。他們都背叛了蘇維埃，結果，他們[對南斯拉夫]的批評都充滿矛盾，變成片面的、逃避現實和不平衡的。在印度共產黨內，我們似乎只決定盲目的追隨毛派，對事實的發展閉上眼睛。

工人國家的原則

列寧在十月革命前三個月，當他還隱藏起來的時候寫成了他的《國家與革命》，後來這著作便在革命中應用了。在我們來說，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也是沒有很大不同的。我對於工人國家的觀念已經在上文中說過了，這裏只有幾點需要提及：列寧寫了許多補充的文章去給《國家與革命》這理論加以詳細的解釋，現在已出版了的還是不完整的。列寧把社會主義建設、蘇維埃民主、集體化、工業化和工會作用等各種問題連接在一起來討論，所有這些關鍵性問題可以提出如下：

社會主義經濟是從建基於供求原則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潛能經已用竭的時候開始的。到了社會主義便立即為“各取所值”這一原則所代替；從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經濟是國際性的，社會主義經濟不能孤立建設。同樣，階級鬥爭的力量和生產力的發展也是如此，所以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必然也是國際性的。因此，社會主義經濟便根本不可能在一個國家範圍內自己單獨發展和鞏固起來[一個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國家——譯者]，它可以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但它不能完成社會主義。高度發展生產力和豐富的物質與文化是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

俄國十月革命前沒有這些先決條件，她必須在無產階級監督之下發展沒有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反對國際資本主義；只有在完成了這些以後，一個社會經濟和新的社會主義關

係、法規和文化藝術形式方能隨著一起發展起來；到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便將成為治理這樣一個社會的原則。從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到下一階段，即共產主義之間將會是一個尚難確定的過渡時期。在共產主義經濟基礎上，不能有別的什麼像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原則更直接的了——這樣的社會是人民生活豐衣足食的預想，也說不定要多少十年後才能實現和建立起來。

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即使通過計劃經濟，也要耐心地經過一段過渡的階段才能取得有效和廣泛的發展，同時世界革命也要得到推進。對這艱巨的事業，不經過深思熟慮光靠強硬及專斷的試驗是行不通的。工人國家發展國有工業是目前這特有社會的經濟趨勢，有計劃的工業化必須着手進行，輕重工業的生長是要均衡的配合工人生活水準逐漸提高，才能夠保證廣大的群眾自願自覺地參加經濟的生活。要這樣實行，計劃一定是由下而上，被剝削的群眾必須監督整個計劃。工業化可以加強無產階級力量，工業化和集體化是互相依存的，但兩者之間的進度也有一定的限制，決定一個落後國家發展的速度是生死攸關的。要求農業社會的勞苦大眾去為光明的未來犧牲，在物質和文化上如此落後和城鄉關係的不平衡都有其本身的限制。最優越和有利的發展是能夠製定一個適合的速度，並保證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進程不致中斷。

由此，國家的社會結構得到了需要的穩定和安全，這就是說，工農的聯盟不應受到危害，因為將來的成就有賴於這樣的一個聯盟。這才瞭解到列寧主義關於社會經濟平衡發展的精髓，也叫作“適當速率理論”。列寧的經濟計劃體系裏是從沒有“大躍進”這回事。不幸這些原則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東歐國都早拋棄了，他們不理會一切經濟上的法則，在一個國家的孤立環境中居然盲目和瘋狂的推行工業化和集體化的競賽。現在事實告訴我們，結果在經濟上已造成了怎樣的災難和禍害。工業和農業的距離還是很大，要把兩者聯繫起來直到現在還

談不到。

列寧主義者認為經濟的生長不能違反基本的經濟原理，光靠命令去強制達成，也正如社會主義不能靠命令去建立起來一樣。經濟發展不可能當作政治因素去處理。在蘇聯農業的集體化過程是強迫農民參加的，結果造成生產的衰退，農民對社會主義不感熱情。列寧教導我們：必須勸導農民使他們心悅誠服，不能強迫他們參加集體化。當斯大林強迫農民集體化時，列寧主義者（這裏作者分明指的是托洛茨基——譯者）曾提醒過這一基本原則，但他們被指責為農民的敵人和叛徒，被送去西伯利亞而最後被清算。同樣的悲劇在二十世紀的東歐又再重演。

毛澤東也同樣盲目地想在中國越過這些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一下子跳到共產主義去。只是經歷了農民的強烈反抗以後，如今企圖去建立一個強國及安定的經濟才去修改了他們的政策。不到十年，這個用強迫速度去建設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便不得不放棄了，大的公社也解散了。中共黨內對這樣急速的步伐曾經引起批評，但他們的政策是否仍然繼續下去還看不出來。無疑中共在糾正他們的錯誤比之蘇聯好些，其變化我們還不知道。可是不管在理論或實踐也好，他們也像斯大林一樣裝着永遠不會犯錯的，因為他們總可以在自己的每一錯誤政策中找到替罪羔羊的。

（四）

事實上證明，反列寧主義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口號是斯大林時代環境下實行的一項革命退卻。今天回頭看看，它所表現出來的完全是斯大林官僚層騙人的破產政策的典範，而不是真正領導實踐與行動的革命綱領，過去和現在一樣是個白日夢。說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那簡直是荒謬與對真理的曲解。其實，即使今天蘇聯還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她仍然是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的發展中。例如俄國共產黨能有一個比

斯大林（毛澤東的“偉大馬列主義者”）更有遠見的才智和更體驗人民基本需要的領袖，斯大林死後的蘇聯經濟和軍事力量都會有更快和更有效的發展的。可是像這樣的領袖那裏去找呢？幾代優秀的布爾什維克都給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讓他們自生自滅，或經過死刑或肉體上的摧殘僥倖生存的也終於死在集中營裏。當時老布爾什維克曾有一個使蘇聯經濟平衡發展的經濟綱領，反對斯大林——布哈林要使富農和城市小工農業者致富的綱領。由於他們強烈反對這錯誤政策及提出代替這政策的綱領，當時（1925-28年）被指控為農民的敵人，只有到1928-29年間富農起來反抗和私人營利及黑市猖獗時，斯大林才改變他早年的政策。於是他着手以危險的高速度進行工業化及土地集體化（毫不考慮反對者的意見，這種態度以社會主義者的道德來說也是不容許的），以旋風式速度強迫工業化所得到的成就補償不到野蠻官僚錯誤政策造成的經濟損失。這一官僚恐怖的結果，造成蘇聯與東歐國家工人熱情的低落，即在今天還不能轉變過來。

俄國和中國的領導層對布爾什維克先烈們在經濟發展上堅持列寧階級路線的仍然繼續強烈譴責，甚至連他們的著作和名字都加以禁制。當然，為了適合他們的需要，是不會妨礙中、蘇的統治官僚們隨便從這些布爾什維克的原著和綱領中任意剽竊和引用的。這種完全不忠實的笨拙手法也實在太可悲了。但為什麼印度共產黨對這些都緘口不言呢？

今日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起碼要保證接受下面這幾個基本的立場：

- 一． 保衛所有的工人國家，
- 二． 在工人國家中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或蘇維埃民主，
- 三． 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原則， 和
- 四． 在資本主義國家反對階級合作的理論。

我們對以上幾點的態度應該是毫無疑問而又互相關連的。在這信的前面我已將這些問題的一些重要點提出來討論過了，我曾經指出我認為可以接受的和不可以接受的；我批評印共的官方路線是“知識分子的”、“改良主義的”或“修正主義的”立場，而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我重視社會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運動所獲得的成就，但我強調我和印共領導之間我誠實的不同意見。更補充一句，我認為現在的共產黨甚至還不足與第二國際比較。我正想進一步探索為什麼世界各地共產黨所遭遇到的慘敗結局，以及各社會主義國家離開了傳統的馬列主義路線。不管所有的缺點，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成就是無可否認的，我認為這些成就都對各國的革命運動起了支持的作用。

我認為應該無條件保衛工人國家的社會主義成果，反對帝國主義甚至社會民主主義。我認識了共產主義運動左右兩派之間的基本分歧，但只有馬列主義是唯一的標準去衡量國家或國際共產主義的左傾或右傾，我想這是沒有妥協餘地的。

像我上面解釋過的，當今的社會主義國家還不能算是像化學定義般純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主要因為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都不存在蘇維埃民主。沒有蘇維埃的引導，政治組織便像無疆的馬，也像沒有靈魂的軀殼；缺乏蘇維埃民主，黨領導必然墮入官僚主義獨裁。我的意思不是說，甚至一個健全的社會主義國家裏不會出現官僚主義，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都潛伏着官僚主義的先天因素。還有什麼比推動落後國家經濟走向社會主義，更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主觀責任的事嗎？列寧去世前對蘇聯官僚主義的危險已好幾次發出警告，同時還提議發動鬥爭去糾正它，在遺囑上他便總結了這個意見-----這是一份給斯大林的起訴書，難怪斯大林把它扣壓了三十年。因為斯大林和他的同謀都考慮到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讓它吞沒整個蘇維埃社會，他在官僚制度下得到庇護。這一災難的後果使蘇聯和東歐工人階級直到今天仍然蒙受其害。還不只這樣呢，全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同樣變成了官僚主義的犧牲品，變成荒誕和虛偽，完成失去了其本身的真實意義。

斯大林將列寧不斷革命的原則顛倒過來。最近中國的、南斯拉夫和古巴的歷史都充分證實了列寧不斷革命原則的正確。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八年擺脫了斯大林的控制，改變策略在中國完成了一次革命。可以明白，中國的革命並沒有依照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邏輯，這僅僅補充證實了列寧不斷革命的意見。任何落後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的不穩定、不可靠和反動性是無法擔當革命角色的。只有在反帝鬥爭中，落後國家資產階級會在某些策略上扮演起有限進步的角色，但即使這樣也是要大大提防的。列寧常常強調：一個腐朽的資本主義，特別在十月革命以後，本質上是缺乏任何進步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要真實認識這點，在目前這個時代不能把列寧的基本教訓忘記。

這裏讓我再從下面三個要點說明我的意見：

- 一． 革命運動，
- 二． 列寧主義對世界革命黨的了解，和
- 三． 無條件支持殖民地革命的需要。

由於這三點都關係到國際革命運動，也可以概括在“革命的國際主義”一個題目之下。像上面說過的，馬克思列寧考慮問題是從整個時代及全球出發的。[所以他們的學說]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項方法論。通過他，馬克思探尋改變世界革命的局勢，革命國際主義的原則是按照現存資本主義各不同的階段運用的，這原則也不是馬、列所創見而是從資本主義本身的生產力和階段鬥爭的國際性質中反映出來的。在馬、列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概念中，根本不容許由一個層份，或單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獨佔領導權，各國的共產黨都一律平等而各自有其本身的獨立自主，他們的職責在建立一個集體性的領導，基層幹部都可以無須懼怕或偏袒地批評甚至更換他們本國和國際

的領導，黨的領導層應在基層幹部監督之下領導着黨。這便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寧就是在這樣的基本原則上發展布爾什維克黨的。黨的領袖從選舉的自然秩序中產生出來。甚至列寧也可以被公開的批評，他說的話黨員們多份都經過猶疑考慮後才接受；在很多的場合下列寧只是處於少數的地位，只有待局勢明確了，列寧的意見才為黨所接受，任何問題都是公開討論的。

布爾什維克黨不能被塑造為一個機械的結構，這對於列寧建立的第三國際也如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全世界的各國共產黨都有權批評蘇聯和蘇聯的黨。第三國際曾經討論甚至解決俄國的問題。俄國的少數派可以向國際上訴，這基本的觀念在當時來說就是將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為我們國際運動的一部份（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還不想到的）。

十月革命曾經帶動了西歐——像德國、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國的革命。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則幫助反革命力量把這些革命擊敗了。這些國家的布爾什維克都被迫趕入地下工作，當鎮壓在這些國家裏進行得最厲害時，列寧歡迎他們到蘇聯去，使他們感到自豪而又借助他們的技術去幫助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

國際間這種兄弟般親切關係的實踐到列寧死後變成怎樣了呢？1924年以後，列寧一向是工人的民主集中制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已為官僚的集中所代替，最後更變為全蘇聯廣大勞苦大眾的無上至尊。在列寧時代工人階級的言論是有決定性的，現在則變成了僅是官僚手上的工具。最初只是一些有自覺的工人階級及勇敢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抗議，最後和在列寧時代從歐洲流亡到俄國的革命家也結合起來。有些反對派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另外大批的被作為政治犯關在集中營裏幹苦工，好些在面對死亡時仍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列寧萬歲”和“托洛茨基萬歲”口號的，由逃脫出來的人所報導這段時期的悲慘故事，今日已經得到反應而且傳遍了整個世界。

(五)

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投擲出一個驚人的炸彈，雖然他是在兄弟黨的背後進行而且是片面的，他在蘇共二十次大會的演辭對那黑暗的年代卻也透露出了一點光亮。這個反斯大林的企圖毫無疑問是機會主義而程度上又是半吊子的，他想藉此避免招供出他自己也是同謀者的罪惡，斯大林的繼承者不是用乾淨的雙手去從事這個嘗試的，他們仍然認為：那些真正被斯大林犧牲的人——老布爾什維克們是叛徒。同樣，那些東歐國家在斯大林時代不計其數的犧牲者雖然都恢復了名譽，但並沒有企圖去解釋這整個災難是怎樣發生的，和這許多烈士是給誰殺害的，一九五六年以後，一層神秘和沉寂的烏雲又把斯大林年代這些悲慘的事件遮蓋了。

只是真理是不可長期給壓住的，非公開地人們大家都早明白真相了，可是為什麼不拿出布爾什維克的勇氣來公開這些歷史真相呢？是否蘇聯共產黨認為這樣便會給全世界共產黨引起不利，是否共產黨的官僚領袖們害怕這樣做便會給他們自己在斯大林年代所串演的反動角色也同時被揭露出來呢？兩代的布爾什維克都給斯大林屠殺了，毛澤東黨還照樣指他們是叛徒或德國法西斯的特務，我們的黨〔印共〕卻在《洛其·勒哈》(LOK LAHAR) 黨的期刊上依舊登出這類譏諷的文字。

我倒要問，“為什麼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當年在沙俄的鎮壓下能夠如此堅強的參加革命，他們在革命的內戰中不惜冒生命的危險，而最後為真正的列寧主義傳統反對斯大林而戰鬥竟會做法國的間諜，甚至於在十月革命以前和那些間諜合作嗎？最可悲的是像今天的毛澤東黨仍在散佈這種陳舊無聊的斯大林主義謊言，試圖給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新起的共產黨注射毒素。可是拉美不但排斥這些毒素，同時更唾棄毛澤東投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和他“四個階級聯盟”的政策，他們採納列寧十月革命之路作為走向革命的國際大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斯大林還在世的

時候，國際法庭將納粹份子作戰犯審判，在法庭前的供詞沒有半點證據可以提供證明斯大林主義者的謊言，說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的反對派是德國間諜的，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還死死的在宣傳這類謊言呢？

蘇聯的領導目前是不會改變的，因而“斯大林、毛澤東及赫魯曉夫萬能”的神話使用得着了。當這些老布爾什維克正在監獄被殺害或流放去西伯利亞時，那些孟什維克中前些時的叛徒們，都視如革命者被釋放和集結起來，去幫助斯大林實現他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白日夢了。不管在赫魯曉夫年頭有某些改變，現在蘇聯的領導還是面對着同樣的老問題，基本上依然還是一樣，甚至那個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的陶里亞蒂(TOGLIATTI)，他在去世前的“遺囑”中也不自覺地流露出：當今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存在蘇維埃或社會主義民主。

“一國社會主義”是兩個革命階段理論在一九二五年提出來的“國際產兒”，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經過幾十年或更長的憲政時期後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這觀念斯大林稱為“工農民主專政”、“新民主”或“人民民主”，赫魯曉夫卻把它叫作“國家民主”。可是不論在中國或東歐革命的實踐上都從來分隔不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來，全世界各地的革命都不停留地直接發展到社會主義，為什麼還不拋棄這套理論呢？難道真的為了滿足最先是斯大林，現在是毛澤東心理上的狂想嗎？

後來，也永遠沒有一次革命拖長地分隔開成兩個階段的（柯西金和達恩茨[DANGE]之流當然不同意這點），如果堅持這樣一個觀念，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勢力便會加強，革命勢力便將消失和浪費，這只有給統治階級帶來好處。像陶里亞蒂也承認的，這就是斯大林錯誤政策在1930-33年德國所發生的，結果引致希特拉上台。為了達成蘇聯官僚層國際國內眼前的需要，犧牲和破壞了整個世界的革命運動，難道這就是斯大林革命的國際主義？根據經驗，我認為斯大林把列寧的革命國際主義完全

倒轉過來了。

只有通過國際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才能得到保證。只有通過國際的革命運動，蘇聯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才能獲取力量，列寧主義者的政策是用加強世界革命運動去保衛俄國革命，並以此轉變蘇聯成為反對反革命力量的堡壘，斯大林卻和這個戰略相反。戰略決定策略，反之策略也足以改變戰略。列寧對這問題的著作被禁刊，他的觀點也被曲解去符合斯大林錯誤的策略。要在落後和孤立的俄國建設社會主義，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適應俄國外交政策的需要便變成他的戰略了。反對他的老布爾什維克都被殺害了。結果，在斯大林有生之年沒有一處的革命是像十月革命般取得勝利的，東歐的革命只是在紅軍的支持下進行的。

印度共產黨同樣為了配合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需要，被牽引着去經歷一條被扭曲的彎路，結果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它執行着一條完全不考慮這個國家實際和解放運動需要的路線。獨立以後，印度共產黨並不依照列寧的十月道路，卻跟隨着蘇聯，現在又是中國外交政策上的需要搖擺。

我們一直跟着斯大林主義官僚經常跳躍的“左的”、教派的或冒險的和極右的外交政策中間搖擺。在中國1925-27 革命失敗是個例子：斯大林對殖民地資產階級採取了狹隘的教派主義政策，在1930-33 年時，印共不支持反帝的解放鬥爭，便首先招來了“反對國家獨立”的銜頭。

在德國，斯大林提出一套新理論，把社會民主黨說成為社會法西斯，不容許所有左派工人階級政黨成立反對希特拉的聯合陣綫，希特拉得到德國工人階段運動分裂之助，最後將強有力的德國共產黨消滅了。在德國失敗後，斯大林極力尋求與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府結成聯盟在歐洲反對法西斯。我們的黨——印共立即決定參加在印度的議會黨。把往日無產階級黨獨立性的原則拋去，代替開展的是和資產階級議會合作的“國民陣綫”，為了討好印度資產階級和斯大林，印度共產黨在1935-38的“國

民陣綫”時期，把它的階級鬥爭路線也放棄了。

一九三九年，黨最初對帝國主義戰爭採取正確的立場。但當斯大林和邱吉爾簽了協約以後，印共又承認這個戰爭是“人民的戰爭”了。黨再次出賣了印度工人階級，對一九四二年“滾出印度”(QUIT INDIA)運動採取消極態度，不理會群眾對國家獨立的願望，無條件支持戰爭，為印度的統治者大英帝國主義出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斯大林的政策也和今日赫魯曉夫的一樣，是和國際資產階級謀求諒解。印共歡迎印度資產階級在一九四七年所取得的表面獨立，錯誤地支持回教群眾的民族自決權，而又支持印度的社會劃分和巴基斯坦建國。

到了一九四八年由於蘇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越來越壞，於是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冷戰階段，一個左的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教派路線又為各國的共產黨所採用了。蘭拿迪夫(RANADIVE)同志給印共路線一個左傾教派主義的方向，不管事實上工人階級和人民對國大黨的統治幻想所遭受到的損害，也不考慮群眾的準備達到了什麼程度，黨魯莽地發動一個反政府的冒險行動。跟隨着失敗和幻想破滅而來的工人運動便是：資產階級的國大黨強迫工人加入印度國家工聯會(INTUC)*。公會運動便被破壞了。由於他們自己在全印工聯會(AITUC)**中官僚教派控制的結果，黨於是又鼓勵其他政黨一起去建立像印度工黨(HMS)***和統一工聯會(UTUC)****等獨立的中央集權……

*INTUC: India 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AITUC: 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HMS: Hind Magdoor Sabha (India Labour Party)

*UTUC: United Trade Union Congress

到斯大林死後，特別是一九五三年間，赫魯曉夫輩在和平共存的名義下希望同國際資產階級的關係和緩下來。這個新政策的轉變表示應該將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區別開來。合併後的印共領導層立即無條件支持這個政策，結果在黨內引起了嚴重的鬥爭。我們都知道印共內部這場戲劇性的演出，直到最後分裂為：親莫斯科的丹吉(DANGET) 右派，和我們親北京的左派。

我個人認為這次分裂雖然有限但也前進了一大步，一九六四年在加爾各答召開的大會，黨領袖們發言的中心精神是：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我們不參加任何的集團（這些集團固然是因斯大林已破壞了共產國際以後才產生的）。這意思就是要我們結束過去盲從附和的做法，今後採取真正列寧主義的道路。

可是現在我們好像決定拋棄了我們革命的獨立性，又在追趕着一條盲目親北京的路線。我們又採用了“人民民主”的口號。作為所謂“人民民主”的代表，我們不需要深思一下：蘇加諾總統在印尼的結果怎樣？我想除了採取真正可靠的階級鬥爭來代替這“人民民主”便實在沒有別的什麼方法了。一九二五—二七時斯大林把希望放在“左派”資產階級汪精衛的實驗失敗了，今天周恩來又把蘇加諾看作為印尼的汪精衛。蘇加諾已經放棄了他的強大的聯盟者印尼共產黨(PKI)，而且早已變成軍人的傀儡。在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衝突事件中，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都犯了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罪惡。



ПУСТЬ ЖИВЁТ И КРЕПНЕТ
НЕРУШИМАЯ ДРУЖБ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我們的黨，對這些頑固的，在某些程度上是錯誤的以及態度傲慢的中共領袖不敢說出任何反對的話，這表示什麼呢？各國共產黨對目前發生的國際爭論，在某些問題上認為中國是對的，難道這就表示中國政府或毛澤東黨可以為了配合它的需要便能左右印度的黨和左派運動嗎？

我絕不支持印度資產階級統治者，我站在無條件保衛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我恐怕斯大林主義的傳統整個籠罩着中國共產黨。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已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絕緣，現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又亦步亦趨。毛好像要決心迫使印度共產黨去無情地打擊印度資產階級。我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任務，即使他不能幫助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最少也要考慮到他們的政策起碼不損害國際主義呢？這讓我記起了斯大林那個“因加得減”的口頭語，在現實生活中他是不願看到的。是不是中共正重演着斯大林的做法呢？儘管他們某些地方也有其自己的一套，中國共產黨還是沿著斯大林那不名譽的行徑的。我不同意我們的黨拒絕承認中、蘇共黨這些基本的錯誤。我站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這是活的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斯大林、毛澤東所註釋過的馬列主義。我正擔心着印度共產黨不準備和那和沽譽名譽的斯大林主義思想決裂。

故此，我決定斷絕我和印度共產黨(CPI-M)的一切關係。當我離開黨時----- 這個黨和我青年的歲月分不開的，讓我向你們保證：我將會為印度的社會主義革命目標貢獻我自己，在勞動人民反對共同敵人的一切鬥爭中，我隨時準備和你們一齊並肩作戰，雖然今後分開了，但戰鬥時還是連在一起的。

列寧主義萬歲！致紅色的敬禮！

你們的同志

馬根·迪賽

(MEGAN DESAI)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

於巴勞達中央監獄(Baroda Central Prison)

工人國家、熱月和波拿巴主義

托洛茨基

1935年2月1日



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外交政策，在其兩個方面的管道——居主要地位的外交管道和居附屬地位的共產國際——採取了截然的轉向，就是投向國際聯盟，保持現狀，與改良派和資產階級民主人士結成聯線的政策。與此同時，國內的政策也轉而朝向市場和“富裕的集體農民”。對反對派及半反對派團體以至最無批判性的個別分子的最新一輪的攻擊勢頭，還有黨新近的大規模清算行動的目的，都是讓斯大林肆無忌憚地走上右傾的路向。目下正在發生的事情，基本上是回復到過去的固有路線上（把一切寄託在富農身上，與國民黨及英俄委員會結成同盟等等），只是這一次的規模更加浩大，條件也是無比艱巨得多。這個路線將把蘇聯領往什麼方向？“熱月”一詞再次不絕於耳。不幸的是，這個詞被用成了陳詞濫調，已經喪失掉它的具體含義；要界定斯大林主義官僚目下正在經過的這個階段，或是它正在準備的大災難，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這個詞語顯然是已經不敷應用，無法做這個界定了。我們必須首先確立起我們的術語。

昔日就“熱月”的爭論

“熱月”的問題，是和蘇聯左派反對派的歷史緊密相聯的。要在今天確定是誰首先用上熱月這個歷史比擬詞，實在不容易。無論如何，1926年時就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大致如下：“民主集中制派”團體（V. M. 斯米爾諾夫，沙普倫諾夫等人在流放期間被斯大林被追逐致死）宣佈：“熱月是個既定的事實！”接受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左派反對派——主張的人士明確地否定了這個論斷。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分裂。事實證明是誰正確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確立各個團體對“熱月”的含義的理解。有關於歷史的類比，允許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正因這樣，歷史類比往往容易被人濫用。

老布爾什維克學派最優秀的代表之一，已故的V. M. 斯米爾諾夫認為，工業化之墮後，富農和新經濟人（新資產階級）的生長，新經濟人和官僚層的聯繫，最後是黨的墮落，這一切發展到了如此深的程度，使得蘇聯不通過一場新的革命就無法回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無產階級已經喪失權力。隨著左派反對派的粉碎，官僚開始表示有意恢復資產階級的政體。十月

革命的基本成果已經蕩然無存。上述就是“民主集中制派”的立場的精粹。

左派反對派則認為，儘管國內無疑已經有雙重政權在萌芽，但從這些元素過渡到資產階級霸權之間，除了通過反革命顛覆之外，不可能經由其他手段來發生。官僚機構誠然是已經和新經濟人和富農聯繫起來，但其主要根鬚仍然在工人階級之間擴展。官僚在進行打擊、反對左派反對派的鬥爭其時，背後無疑拖拽著有著新經濟人和富農形狀的沉重尾巴。但這條尾巴不久將會對它的頭顱，也即是執政的官僚發出攻擊。在官僚隊伍裡必然要發生新的分裂。中間派官僚的基本核心在面臨反革命顛覆的直接威脅的時候，將會向工人階級尋求支持，以打擊日益增長的農村資產階級。衝突的結果仍遠未到勝負已有定案的時候。要把十月革命埋葬，尚言之過早。粉碎左派反對派帶動了“熱月”的工作，可是“熱月”仍然不曾發生。

為了讓布-列派的立場的正確性從所有顯而易見的事實中展現出來，我們只需要在繼後的事態發展的光照下，對1926年至1927年的爭論要點作出準確的回顧便可以了。早在1927年，富農通過拒絕提供集中在他們手中的麵包，向官僚施予一擊。1928年，官僚層發生了公開的分裂。右派主張向富農作更多讓步。至於中間派，他們拿了與右派聯手合力粉碎左派反對派的思想，把自己武裝起來，在工人階級之中尋得支持，把右派打垮，並且走上工業化乃至集體化的道路。在付出了無數不必要的代價之後，終於挽救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布列派的論斷（更正確地說，是布列派論斷的“最適度的變體”）得到了完全的證實。在這一點上今天是不會有任何爭議的了。生產力的發展，並非通過恢復私有財產的方式進行，而卻是通過計畫管理方式在社會化的基礎上進行。這項事實在世界歷史方面的重大意義，只有政治上盲從的人才會毫不知情。

熱月的真正意義

時至今天，我們已經能夠而且必須承認，熱月這個類比毋寧是把問題搞渾而不是澄清。1794年的熱月在國民公會中產生了權力的轉變，權力從一部分勝利的“人民”中轉到其他階層，從一個集團轉移到另一個集團。熱月是反革命的嗎？對在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我們給“反革命”這個概念的意義在特定情況中的範圍有多寬。1789年到1793年的社會顛覆的特性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本質上，它不過是用“自由的”資產階級財產替代固定的封建財產。“對應”這場革命的反革命，必會重新獲得封建性質。但熱月甚至沒有任何企圖走上這個方向。羅伯斯庇爾向中層資產階級的執政團手工業者尋求支持；波拿巴則與銀行界結盟。可是，所有這些轉向——它們誠然不僅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並且也有著重大的社會意義——俱是在嶄新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嶄新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基礎上發生的。

熱月是在革命的社會基礎上運行的反動

波拿巴霧月十八日政變具有相同的重要性，這是反動道路上的下一個重要階段。在這兩種情況下，問題不在於恢復舊有的財產形式，或是恢復從前的統治等級權力，而是在勝利的“第三等級”的不同部門之間瓜分新生的社會政體的成果。資產階級吞占了越來越多的財產和權力（不論是直接地，即時地，或是通過特別的代理人像波拿巴特而吞占），毫無意思去反對革命的社會成果；與此相反，資產階級孜孜以求的是把財產和權力鞏固起來，組織起來，予以穩定。拿破崙守衛資產階級的財產，其中也包括農民的財產，以防範“亂民”或被褫奪了財產的財主的訴求。封建的歐洲把拿破崙視為活生生的革命體現，對他恨之入骨，按照它的標準，它是正確的。

對蘇聯作的馬克思主義的評價

今天的蘇聯無疑與列寧在1917年描繪的蘇維埃共和國的類型，沒有幾分相似之處（沒有常設的官僚或沒有常設的軍隊，群眾在不論何時，“不論對誰”皆有權撤換所有當選官員，並且有權對他們予以積極管制，等等）。官僚統攝全國，以及斯大林統攝全體官僚，已差不多達到極致。但從這裡會得出什麼結論呢？有一些人，他們會說，既然這個從無產階級革命中出現的實在的國家與理想中先設的規範互不對應，所以他們便掉身不顧好了。這是政治勢利眼，在和平主義者，民主人士，自由意志論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以及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間，一般的極左派圈子中屢見不爽。也有另外一些人，他們會說，既然這個國家經由無產階級革命而生，所以任何對她的批評都是褻瀆和反革命。這是偽善者的論調；在這聲音背後往往隱藏著那同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中的若干集團，或是埋藏著工人官僚的若干集團的直接物質利益。上述兩類人——那些政治勢利眼和政治偽善者——根據個人的境遇而隨時能夠對調。我們且不必管他們也罷。

馬克思主義者會說，當前的蘇聯和蘇維埃國家先設標準明顯的不相近；可是，且讓我們探索我們在制定綱領性的標準時未能預見到的東西吧。此外，我們還要分析是什麼樣的社會因素對工人國家造成扭曲；要再一次檢視，這些扭曲是否有延伸到國家的經濟基礎方面去；也就是說，去看無產階級革命得來的基本社會成果是否得到保存，如果這些都被保存下來，那麼，就讓我們找出那些成果是朝著哪個方向發生改變；我們並且要找出，在蘇聯和全世界範圍內，是否具有可能促進和加快進步性的發展趨勢的因素，以壓倒反動的因素。像這種處理問題的態度是複雜的。這種態度不會為懶惰的腦袋帶來現成的答案，雖說那卻是他們最甘之如飴的。不過，持這種態度所得到的回報，是能夠免於受到勢利和偽善的磨擦，並且還存在著對蘇聯命運發揮積極的影響力的可能性。

“民主集中制”團體在1926年宣佈工人國家已被肅清其時，顯然是把仍然活著的革命埋葬。和這個立場鮮明對照的是，左派反對派為蘇維埃政權制定出一套改革方案。斯大林主義官僚

之作為一個特權階層，為了守衛自身，牢固樹立這個特權階層，因而把左派反對派搗個粉碎。可是，就在斯大林主義官僚為自保地位而作鬥爭的時候，它發現自己被迫採取左派反對派綱領內的所有措施，因為唯有所有那些措施才有可能拯救蘇維埃國家的社會基礎。這是無價的政治教訓啊！這則教訓顯示了特定歷史條件——農民的落後性，無產階級的困乏和缺乏西方的決定性支持——是怎樣為革命的“第二章”作出準備；革命這“第二章”的特點，是由保守的國家官僚對無產階級先鋒隊進行鎮壓，粉碎革命的國際主義者而表現出來。但是，就在這同一個例子裡，顯示了革命的“第一章”即使受到“第二章”的勝利者的恣意踐踏，正確的政治路線，是怎樣的使馬克思主義團體從這樣的發展中取得成果。

膚淺的唯心論者那種在現成的規範下運作，把活生生的發展過程機械地套入自己那一套標準的思想模式，會很容易使人的熱情虛脫。只有教導人們從所有事物的發展過程及其各種內部力量的衝突之間做觀察的辯證唯物法，才可以賦予思想和行動所必要的堅定。

無產階級專政和官僚專政

我們之前的多篇著作中，已經確立了這個事實：蘇維埃社會雖然有著很多經濟成就——這是由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決定的——它完全保留了一個互相矛盾的過渡性質；而且，從它的生活條件的不平等性和官僚具有的特權來衡量，

這個社會仍然更為接近資本主義的政體，而非未來的共產主義。

同時，我們也確定了另一個事實：即蘇維埃國家雖然有萬惡的官僚墮落，但只要她一天仍是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基礎上保證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便仍然是工人階級的歷史工具；而且，正是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基礎上，她為貧苦大眾在通過社會不平等肅清之後而達致真正的解放提供了條件。

誰要是對這兩個基本前題不予深思和接受，誰要是總的來說沒有研究布-列派自1923年以來有關蘇聯問題的文獻，便有失去對每宗新的事件抓得要領的風險，同時也有摒棄馬克思主義分析而陷入怨艾尤人的風險。

蘇維埃（說反蘇維埃會是更為正確）官僚主義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社會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社會矛盾（這兩種矛盾並不是對等的），民族共和國和地區之間的社會矛盾，農民不同群體之間，工人階級不同階層之間，不同的消費者群體之間，和最後是蘇維埃國家作為一個整體，與它所處的資本主義環境之間的種種社會矛盾下的產物。在所有關係都以金錢來計算的今天，經濟性的矛盾帶著無比尋常的尖銳性走到最前列。

官僚層把自身凌駕在貧苦大眾之上，對這些矛盾做出調節，利用這種調節功能以鞏固它的控制。官僚以其不受控制、自把自為、目空一切而積累了更多新的矛盾。官僚借助新的矛盾而製造了官僚專制主義的政權。

官僚層內部本身的矛盾造成了揀摘參謀部要員的政體；在特選的任命中所需要的紀律形

成了寡頭統治，乃至對戰無不勝的領袖的個人崇拜。這同一個政體推廣至工廠，集體農莊，大學和政府之內；領袖擔當其忠心耿耿的軍隊的首腦；眾人則追隨領袖，處處唯命。斯大林按其本性，從來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群眾的領袖；他是眾官僚“領袖”的領袖，是他們的盡致，他們的化身。

經濟任務越趨複雜，人民的要求和涉及的利益更多，則官僚政體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需求之間的矛盾便更形尖銳，官僚為了保存地位所作的鬥爭便更為粗暴，更加玩世不恭地訴諸暴力，欺詐和賄賂。

政治政體面對經濟增長和文化發展的不斷惡化——這個昭然若揭的事實有以下的解釋：在極大程度上，凡壓迫，迫害和鎮壓在現時不是用來保衛國家，而是用來保衛官僚的統治和特權。這就是日甚一日地需要用欺詐和各種各樣手段的大混合來把壓迫掩飾起來的原因。

“像這樣的國家，能稱得上是工人國家嗎？”各種道學家，唯心主義者和“革命性”的勢利小人嗤之以鼻地說。另一些較為謹慎的人則作出如下表達：“分析到底，這或許是個工人國家，但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蕩然無存了。眼前這個是處在官僚專政下的墮落工人國家。”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去重新展開全面的爭論。在有關我們立場傾向的文獻和正式文件裡，就此問題必須發言之處已經全部論到。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沒有人試圖對布-列派的立場作出駁斥，糾正或補充。

我們在此僅限於討論這個問題：能夠把官僚在事實上的獨裁稱為無產階級專政嗎？

專政這個詞有時會用於限定的政治意義方面，而有時會用於更深刻的社會學意義方面，這個事實使得給該術語作界定產生困難。我們會說“墨索里尼的專制”，並在同一時間，又會聲言法西斯主義只不過是金融資本的工具。哪一方面是正確的呢？兩者都正確，但正確的層面不同。說全部的行政權力都集中於墨索里尼一身，這是無可爭議的了。然而，國家全部活動的實際內容是由金融資本的利益來支配主使，同樣是不爭的事實。一個階級社會的統治（其專政）可以有甚為迥異的政治形式。從中世紀到現代，資產階級的全部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蘇聯的經驗已經足夠把這社會學的同一條規律引伸開來——在附以所有必要的變更之下——適用到無產階級專政。從征服政權到工人國家消融到社會主義社會中間時期裡，無產階級統治的形式和方法，有可能變化多端，視乎內外階級鬥爭的路向而變易。

因此，斯大林當今的統治和革命初年的蘇維埃統治絕無相似之處。一個政權之取代另一個政權並非是一夜之間的事情，而是經歷了一連串的措施，通過由官僚向無產階級先鋒隊發起的多次小型內戰而發生。歷史分析到最後，是社會矛盾的壓力令蘇聯的外交爆裂。官僚層利用了社會矛盾而從群眾組織的手中搶奪了權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談官僚專政，甚至乎斯大林的個人獨裁專政。可是，僅由於無產階級革命所創建的那些生產關係決定著官僚專政的社會內容，官僚的篡權才有可能發生，才有可能維繫自身。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有充分的理由說，無產階級專政從官僚中

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達。

必須修正歷史類比，予以糾正

在俄羅斯反對派和國際反對派內部的爭論裡，我們對熱月的有條件的理解，乃熱月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第一階段，其目標是反對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礎。儘管在過去，論戰的內容，並沒有受到這種理解的干擾，然而，歷史類比日益被加上與現實無關的，純粹是條件性的屬性，而對蘇維埃國家的最新演變需要作分析，這個需要同條件性的屬性發生的矛盾日益增加。只消提出這個事實便夠了：我們自己經常談論——而這是有著充足理由的——斯大林的公民表決式政權或波拿巴主義政權。然而法國的波拿巴主義是尾隨熱月而至的。我們要是留在歷史類比的框架內，便必須自問這個問題：既然仍未發生蘇維埃的“熱月”，那麼波拿巴主義又是從何而來呢？我們在毋須對以前的評估做本質上的改變之際——那是毫無必要的——必須徹底修正這項歷史類比。這麼一來，將有助我們在更近的距離上觀看某些舊有的事實，對某些新的表徵則有更佳的理解。

熱月9日的政變並沒有肅清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戰果，但確實把權力轉移往資產階級社會較為富庶的分子，那些更為溫和保守的雅各賓派的手中。人們在今天已經不可能對蘇維埃革命在很久以前發生之右轉視而不見；這個轉向全然類似於熱月[熱月反動]，儘管節奏上較為緩慢，在形式上有更多偽裝。蘇聯官僚對付

左派的陰謀在最初階段之所以能夠保有相當“乾淨俐落”的特性，乃由於在執行方面，這場陰謀本身比即興發生的熱月9日更為有計劃和徹底得多。

從社會方面來說，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為單一，然而無產階級內部自有著整一系列的層分級別；奪取政權後，在官僚和工人貴族與權力掛鉤逐漸成形的期間裡，表現得分外明顯。在最直接、最即時的意義上，搗碎左派反對派就意味著權力從革命先鋒隊手中移交到較為保守的官僚和工人階級最上層的手中。1924年這一年，就是蘇維埃熱月展開的一年。

當然，問題涉及歷史的類同性，而非歷史的一致性；社會結構和時代上的差異是歷史類比的局限性。但這個特定的類比不是表面上的，也不是出於偶然：是革命與反革命時期內階級鬥爭的高度緊張決定著這個特定的歷史類比。在法國和蘇聯這兩個例子裡，官僚層俱是凌駕在令新政體得保勝利的平民民主的背上。雅各賓俱樂部被逐漸絞殺。1793年的革命者戰死戰場；他們成為外交人員、將領；他們在壓迫重槌之下倒下...或轉入地下。繼之而起的是另外一些雅各賓黨人，他們成功地搖身變為拿破崙的憲兵。這批人當中，充斥著為數愈來愈多的舊有黨派的變節者，昔日的貴族以及粗鄙的野心家。至於俄國方面嗎？是同一幀的墮落圖像，只不過幅員更浩大，背景更成熟，由最先是蘇維埃狂熱的棍子和黨棍，逐漸過渡到憑藉“至為熱愛的領袖”而巧取豪奪的各級書記，在130-140年後再扮演一次。

在法國，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從封建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致令波拿巴主義熱月政權得到長時間的穩定。幸運者，掠奪者，官僚的親戚和盟友魚肉自肥。幻滅的群眾聽命屈從。

國有化生產力從1923年開始，令蘇維埃官僚出人意料的飛升，為官僚層的穩定創造了必要的經濟前提。經濟生活的興旺為積極能幹的組織者、機關人員和技術人員的充沛活力提供了出處。這批人的物質地位和道德地位迅速得到改善。與統治圈的頂層密切相系的一個廣泛的特權階層創立起來了。勞苦大眾要麼生活於期望，要麼陷入漠不關心。

企圖把俄國革命的不同階段，逐一套入法國臨近十八世紀末時發生的相若事件，是迂腐的做法。可是蘇維埃現行的政權和法國第一執政[1799-1804]時候的政體，尤其第一帝國臨近之時的執政府末期的政體的相似性，確實醒人耳目。儘管斯大林缺乏勝利的神采，他在組織一個阿諛奉承者的政體方面，無論如何都超過波拿巴一世而無不及。斯大林那種權力，只能藉著把黨，蘇維埃，以致工人階級整體絞殺，才能獲得。斯大林所憑藉的官僚層，同一個既成的民族革命結果有物質上的聯結，但這個官僚層和發展中的國際革命毫無聯繫。今時的蘇維埃機關人員之和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派的差別，就和拿破崙治下的將軍和憲兵之與革命的雅各賓派的差別一樣，全無二致。

熱月黨人和雅各賓人

蘇聯駐倫敦大使邁斯基最近向英國工會人士成員的一個代表團，解釋斯大林派對“反革命”季諾維也夫分子的審判的必要性和理據。這個驚人的插曲——不過是成千上萬宗插曲的區區一件——立刻把我們帶入問題的核心。我們知道季諾維也夫分子都是些什麼人。不論他們犯過多少錯誤，有過多少搖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們是“職業革命家”式的代表。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問題，這些問題已注進他們的血液中去。邁斯基是何許人呢？此人是孟什維克右派，在1918年與他所屬的黨破裂，好讓自己空出身來，以便在白軍高爾察克的庇護下，有機會到跨烏拉爾地區白黨政府裡當個部長。就在高爾察克被殲滅之後，邁斯基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掉過臉來朝向蘇維埃。對於這一號人，列寧——我與他一道——最不信任，更不必說嗤之以鼻了。現在躋身大使行列的邁斯基，指控“季諾維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致力於煽動軍事進犯，以圖恢復資本主義——邁斯基本人曾經用內戰的手段來攻擊我們，以保衛那個資本主義。

現今駐美國的蘇維埃大使，A 特羅揚諾夫斯基，在年青時參加了布爾什維克，不久之後脫離了黨；在戰爭期間，他是一個愛國者；在1917年時是孟什維克派。十月革命其時，他是孟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並且在隨後的幾年裡，進行非法鬥爭以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左派反對派被鎮壓後，他加入了斯大林派的黨——更正確的說，是加入了外交使節的工作。

蘇維埃駐巴黎大使波坦京，在十月革命時期是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教授；他是在革命勝利後才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派的。前蘇維埃駐柏林大使欣丘克在十月起義的日子裡，以孟什維克的身份，聯同了蘇維埃現時的財務人民委員、當時的右翼社會革命黨人格裡尼科一起，參加了反革命的‘拯救祖國和革命莫斯科委員會’。替代欣丘克出任柏林大使的蘇裡茨，曾是蘇維埃第一主席、孟什維克黨人寄赫伊澤的政治書記；蘇裡茨是在革命勝利之後才參加布爾什維克。至於其他使節，幾乎全部都是這一類人；與此同時，受任命的國外人員都是最可靠的人——尤其在有過貝塞杜夫斯基、季米特耶夫斯基、阿加具可夫等人的經驗之後，更是這樣。

不久前，全世界報章刊登了多則有關蘇聯黃金開採業的重大成就的消息，這些消息還提到金礦業的組織者、工程師謝列布羅夫斯基。在今天可以和杜蘭蒂和路易·菲舍爾作為官僚最上層部分的官方發言人方面爭領風騷的“時代報”駐莫斯科記者，尤其費盡心機的強調謝列布羅夫斯基從1903年開始，就是一個布爾什維克，是“老近衛軍”的一員這個事實。而這是謝列布羅夫斯基的黨員證實實在在地聲明的。但實情是，他在1905年時以學生和孟什維克的身份參加了1905年革命，接著便投到資產階級的陣營許多年。1917年二月革命其時，他正在政府中出任兩所軍工廠的總監，貿易委員會的成員，並且積極投入反對五金工人工會的鬥爭。1917年5月，謝列布羅夫斯基宣稱，列寧是“德國間諜”！布爾什維克勝利之後，謝列布羅夫斯基連同其他許多spetzes [技術專家]一道，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應我之邀靠攏到技術工作方面去。列寧對他此人毫不信任；我本人對他也難有信任之心。而現在，謝列布羅夫斯基是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一員！

中央委員會的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在1934年12月31日刊登了謝列布羅夫斯基一篇題為‘蘇聯的黃金開採業’的文章。我們翻到第一頁看：“.....在黨和工人階級的備受愛戴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三行以後：“.....斯大林同志與美國記者杜蘭蒂的交談.....”；五行以後：“.....斯大林同志言簡意賅的答覆.....”；最末一行：“這就是用斯大林主義方法為黃金而戰鬥的用意。”第二頁：“...就如我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對我們的教導.....”；下四行：“.....斯大林同志在答覆他們（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報告中寫道：‘祝賀你們的勝利’.....”；在同頁下部：“在斯大林同志的指導的啟發之下.....”；下一行：“.....黨以斯大林同志為首.....”；下兩行：“.....我們的黨和（！！）斯大林同志的指導”；且讓我們翻到文章的結論部分吧。在半頁紙內，我們讀到：“.....黨和工人階級的英明領袖斯大林同志的指導.....”；三行下：“.....我們摯愛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的語錄.....”

在如此排山倒海的拍馬屁當前，諷刺文學也得束手無策！人們應該會想到，“備受愛戴的領袖們”也毋須要文章中的每一頁發表愛的宣言5次之多；更何況，這篇文章不是寫來為領袖賀壽，而卻是為了.....黃金開採哩。反過來說，能夠寫下如許奉誠的文章的作者，顯然的

沒有任何革命家的素質。具有如斯才幹的是前沙皇時代下的大工廠的主管，資產者和愛國者，向工人發動鬥爭而是今日政權的堡壘，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百分之百的斯大林主義者！

另一類人種。當今的‘真理報’的台柱之一，紮斯拉夫斯基，在今年一月提出：絕對不能允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動小說出版，一如絕對不能允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動著作”出版。紮斯拉夫斯基是何許人呢？在慘澹的昔日，他是個右翼的人民聯盟分子[猶太人民聯盟的孟什維克]，稍後是個在1917年向列寧和托洛茨基發動最不堪的攻擊運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記者，把列寧和托洛茨基指為德國間諜。在列寧寫於1917年的文章裡，可以找到這些作為套語使用的句子：“紮斯拉夫斯基及如他之流的惡棍們。”因此，紮斯拉夫斯基就是作為被金錢收買的資產階級誹謗者典型，如此這般的被載入黨的文獻裡。在內戰時期，就在他藏身在基輔的期間，他為白軍的出版物擔任記者。他是到了1923年才轉投到蘇聯政權去的。在今天，他保衛斯大林主義，嚴防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些反革命分子！斯大林屬下的報刊，不論在蘇聯出版或國外出版的，充斥了這類人物。

布林什維主義的老幹部已經被粉碎。革命者已經被粉碎。革命黨人被軟骨頭的機關所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被恐懼、奉承和陰謀詭計所驅趕。列寧生前的政治局的成員中，現在只有斯大林仍在政治局之內，其餘是：兩名成員在政治上被折了腰，匍匐在地（雷科夫和托姆斯基）；兩人在監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涅夫）；一人被放逐在國外，被剝奪了公民身份（托洛茨基）；至於列寧，就如[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作所言，僅由於死亡才倖免于官僚的迫害；篡權者沒有機會把列寧關進監獄，於是把他關進陵墓去了。整個統治層已經墮落。雅各賓派被熱月黨人和波拿巴分子覆滅；斯大林主義者取代了布爾什維克黨人。

對於那些大，中，小型的保守而利益攸關的邁斯基們，謝列布羅斯基們和紮斯拉夫斯們構成的廣泛的階層來說，斯大林是個法官仲裁器，恩典的泉源及抵禦各種可能的反對聲音和力量的護衛人。官僚層為了回報，不時給斯大林冠以全國全民擁戴的光環。黨的大會，就和蘇維埃的大會一樣，是在唯一一個前提條件召開的：贊成還是反對斯大林？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能夠反對，而他們會得到應有的處理。這就是今時的統治機制。這是波拿巴的機制。在政治詞典上，除此外，還未找到另一種界定。

資產階級國家和工人國家

在作用上的差別

沒有歷史類比，就無法從歷史中學習。但這個類比必須是具體的；而在近似性的蛛絲馬跡之外，我們絕不能忽視差異性的蛛絲馬跡。[法國和俄國]兩次革命皆結束了封建主義和農奴制。但其中的一次革命，以其極端的一翼的形態，只能徒勞的把革命推向超過資產階級社會的界限；另一次的革命，則實實在在的推翻了資產階級，並且創造了工人國家。這個基本

的階級區別，為歷史的類比帶來了必要的實在的界線，從而對革命的診斷具有決定性的重大意義。

在經歷了一場深刻的民主革命，把農民從農奴制中解放出來，給予他們的土地之後，一般來說，封建反革命是不可能的了。**被推翻的君主政體可能會重整旗鼓，滿懷著中世紀幻想，但君主制本身無力重新建立封建主義的經濟體。**資產階級關係一旦從封建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立即自動地發展開來。沒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夠制衡它的發展。資產階級關係在此之前已經製造出它自身的掘墓人；它必定是自掘墓墳者。

社會主義關係的發展完全不同。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把生產力從私有制的桎梏中釋放出來，並且將它移交到由它親手創造的國家的直接管轄之下。資產階級國家繼承革命之後，把自身的作用設定為員警的角色，把市場交由市場自身的規律所支配，工人國家則是承擔經濟學家和組織者的直接角色。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只會對市場經濟發生間接和膚淺的影響。相反，工人政府若被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府取代，就勢必會導致取消計劃經濟，恢復私人所有制。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壁壘分明之處，在於社會主義不是自動產生的，而是自覺地建立起來的。朝向社會主義的進程，不能與國家權力分割開來，而且這個權力有意實行社會主義或受制於實行社會主義的願望。只當社會主義發展到十分的高度，其生產力遠遠超越資本主義，每個人的需要獲得充裕滿足，國家徹底消亡，與社會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在其時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才會具有不可逆轉的屬性。但是，這一切仍然是遙遠的未來。在一段特定的發展階段之內，社會主義建設同工人國家是存亡與共的。只有在透徹考慮過資產階級形成的規律（“無政府性的”）和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計劃性的”）這兩者的分別，才有可能理解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類比中那些無法逾越的限制。

1917年十月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開啟了社會主義革命。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扭轉在俄國發生的農業民主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有著與雅各賓革命充分而完全的類比。但顛覆集體農莊的威脅力沒有片刻鬆緩；它還威脅著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一場政治反革命，那怕是一場回到羅曼諾夫王朝的反革命，俱無法重建土地的封建所有制。可是只消一個孟什維克或是社會革命黨集團的權力復辟，就足以令社會主義建設煙消雲散。

過度膨脹的官僚中心主義變為

波拿巴主義

法國大革命和十月革命這兩場革命的基本區別，以至於“對應”這兩場革命的反革命之間的基本分別，對於理解構成斯大林政權的本質的那些政治反動的轉向的重大意義，是至關重要。農民革命，以及憑靠在農民革命的資產階級，是十分能夠與拿破崙政權和平共處的；以致，甚至在路易十八之下，它們也能夠安然泰然。無產階級革命在斯大林的現政權下已經面臨致命的危險；它將無法承受再進一步的向右轉。

蘇維埃官僚——其傳統是“布爾什維克派”，但在現實上，它從很久以來已經放棄了這個傳統，其組成和精神是小資產階級的——被召來為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對立，為工人國家和世界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進行調節；這就是官僚中心主義的社會基礎，就是它的左搖右擺，力量，弱點及其對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影響，是如此致命的所在。由於官僚愈來愈獨立，有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在單獨一人的手中，官僚中心主義便愈發轉變成波拿巴主義。

波拿巴主義的觀念甚為寬闊，有需要予以具體化。在過去的幾年中，對那些利用無產階級陣營和法西斯陣營之間的對抗，並且通過直接的憑靠在軍事-員警機器而凌駕在議會和民主政體之上，把自身作為“民族團結”的救星的那些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我們曾經應用過波拿巴主義這個詞。我們一向把這種腐敗的波拿巴主義與那個年青的、不僅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原則掘墓人，並且同時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成果的捍衛者的進步的波拿巴主義，嚴格地區別開來。因為兩者具有共同的跡象，所以我們對那兩種示象運用共同的名稱；在耄耋老人身上，雖然有過時間的無情蹂躪，我們仍是能夠辨認出他少艾當年的模樣。

當然，我們是拿資產階級興起時而非衰敗時的波拿巴主義，來與今日的克里姆林宮的波拿巴主義來並排對比：是拿執政官時期和第一帝國的時期，而不是拿破崙三世，更不是等而下之的施萊歇或杜米格。為了作出這個類比，並不需要把拿破崙一世的事蹟拿來與斯大林對比——波拿巴主義能夠因應社會條件所提出的

要求，在口徑懸殊的軸心上鞏固自身。

從我們感興趣的方面來說，兩種波拿巴主義——雅各賓的和蘇維埃的——在社會基礎方面的差異，才是更為重要的。前者關乎的是資產階級革命通過取消它本身的原則和政治機構而鞏固下來。後者關乎工農革命通過粉碎它自身的國際綱領，領導的黨和蘇維埃而鞏固下來。拿破崙把熱月的政策推進一步，不僅向封建世界發動鬥爭，並且也向“亂民”和中小型資產階級的民主圈子發動鬥爭；通過這種方式，把從革命誕生的政體得來的成果，集中到新生的資產階級貴族手中。斯大林不僅守衛著十月革命的成果以防止封建-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且還反對著貧苦大眾的訴求、急切和不滿足；他把普通工人大眾的內在歷史性進步傾向的代表——左派搗個稀巴爛；他運用各種極端懸殊的工資，特權，級別等等的差異為手段，製造了一個新生的貴族。斯大林憑藉社會新生的等級制度中的最上層的支持，來反對社會的最底層——有時是相反，即憑藉最低層的支持來反對最上層——從而令權力完全集中在他一人的手裡。這一政體若非稱為蘇維埃波拿巴主義，哪還能稱作什麼？

波拿巴主義按其本質來說，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平衡在金字塔頂尖的球總是要在這一邊或另一邊滾動。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歷史的類比碰到了它的極限。拿破崙的垮臺當然不會令階級之間的關係保持原狀；然而法國的社會金字塔在本質上仍然保持了它的資產階級屬性。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勢無可免的垮臺，則將會令蘇聯之作為工

人國家的屬性立即打上問號。沒有社會主義的政權，便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體。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取決於是由何種政治政權的興起，以取代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惟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才能夠令蘇維埃制度復興——假如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能夠再次動員城鄉的貧苦大眾在它的周圍。

結論

從我們的分析裡得出了若干結論，概述如下：

1. 俄國大革命的熱月反動不是將來的事，而是已經發生了好一段時間。熱月黨人能夠慶祝他們大約十周年的勝利。
2. 蘇聯現行的政治體制是“蘇維埃”（或反蘇維埃）波拿巴主義的政權，在類型上更接近帝國而不是執政官時期。
3. 蘇聯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傾向仍然是個工人國家。
4. 波拿巴主義的政權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是蘇聯國內危機最重要的來源，並直接威脅到蘇聯作為一個工人國家的生存。
5. 由於蘇聯的生產力水準低下，並且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各個階級之間及階級自身的時緊時緩的矛盾，在未可知的長時期內，仍

然會繼續在蘇聯之內存在；無論如何，將會存在至世界上多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得到完成勝利為止。

6. 無產階級專政在未來也仍然是蘇聯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必要條件。所以專政的波拿巴主義墮落就是對無產階級征服得來的社會成果直接和即時的威脅。

7. 波拿巴主義在政治上已經窮途末路，踏入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為生存而鬥爭的時期這個事實，最惡形惡狀的症狀之一，就是發生在共青團裡的恐怖主義傾向。

8. 只當波拿巴主義是經由無產階級先鋒隊自覺的行為來撤除的情況下，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必然垮臺，才會導致蘇維埃民主的建立。至於任何其他情況下，代替斯大林主義而起的，只能是法西斯-資本主義的反革命。

9. 個人恐怖主義的戰術，無論在什麼旗幟下進行，在特定的條件下，只會被無產階級最險惡的敵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10. 黨的掘墓人——斯大林，須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中的恐怖主義的發端，負上政治和道德責任。

11. 全世界無產階級持續不斷的失敗，是蘇聯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反對波拿巴主義的鬥爭受到削弱的主要原因。

12. 作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盲目的僕人，同時又是改良主義官僚最佳盟友和護衛者的共產國際，它推行的惡貫滿盈的政策，是造成世界無產階級失敗的主要成因。

13. 把國際無產階級先鋒隊從蘇維埃波拿巴主義敗壞士氣的影響下——即是從所謂共產國際的官僚買辦中解放出來，是國際無產階級在國際層面取得勝利的首要條件。

14. 拯救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以及為第四國際而鬥爭，兩者是不謀而合的。

跋

我們的反對者（對此我們無任歡迎）將會抓住我們的“自我批評”而大吵大嚷——那麼你們對熱月這個基本問題改變了立場囉，你們過去談熱月的危險，現在卻突然宣佈，熱月已經遙遙在後！斯大林主義者大概會發出上述叫囂，並且還會加油添醋，說我們更改立場，為的是便於挑起軍事干預。此外，那些布蘭德勒分子和洛夫斯通分子，或另一方面，那些自作聰明的“極左派”，或許也會持相同的論調。所有那些人，他們從來不能向我們指出熱月的比喻有什麼錯處；現在，我們既然自揭錯處，他們就要更大聲吵嚷。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我們對蘇聯的一般評價的錯誤之所在。問題完全不是我們把我們的原則性立場予以更改——那些原則性立場早已在多份正式檔中作出了系統的闡析；問題只是我們令這些原則性立場更為精確。我們的“自我批評”並非推及到對蘇聯的階級屬性或蘇聯墮落的成因和條件的分析，反而是通過運用著名的法國大革命的各個階段作為類比的手段，把蘇聯墮落的成因條件和過程作出歷史性的厘清。對局部的錯誤予以糾正，哪怕這項局部錯誤是重要的錯誤，不僅沒有動搖到布-列派的基本立場，反倒會讓我們通過更加準確，更為現實的類比的手段而使我們的基本立場更為精確，更為具體地確立。而且應補充說明，正是政治墮落的過程本身（我們刻下正在討論這個課題）具有更為突出的形態這個事實，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錯誤披現出來。

我們的傾向從不聲稱戰無不勝。我們沒有斯大林主義那些教主們那種啟示式的現買現賣的真理。我們在存在的光照下討論問題，檢查我們的結論；我們公開承認既知的錯誤，並踏步前進。科學的覺悟性和律己嚴格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優良傳統。我們要在這點上也一如其他，希望對我們的導師保持忠誠。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

史丹譯

Hong Kong People Steadfastly Participated In Occupy Movement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Zhen Yan



Occupy Movements in Admiralty, Causeway Bay, Mongkok, and Tsim Sha Tsui in Hong Kong, fighting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had lasted for 79 days. They were clear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under the order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he result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Survey Cente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owed that about 20% of interviewees had joined the Occupy Movement. It estimated that around 1.2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or one-sixth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had participated the Movement.

The Movement is very unique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and even China. Its main goal is innovative and epochal, particularly after 1997. It originated from three intellectuals proposing to occupy the Central to fight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wards,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more than 10 tertiary institutions took the leadership. A lot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young people, and citizens echoed and supported. Once there we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ccupants on Admiralty Square. The Movement clearly showed the occupants' awakening of democracy and strong will of fighting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It was with peace, rationality, resilience, militancy, and in particular, with innovation when occupying the roads. The occupants were holding umbrellas not only to confront the tear gas of police, but also to resist the burning sun and heavy rains. So it was called Umbrella Movement.

The occupants demanded a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in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so they demanded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August-31 Resolution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PRC, dictating Hong Kong's 2017 elections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requiring over 50% endorsement of candidacy by the 1200-member Nominating Committee.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members are pro-establishment and conservative.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the pan-democracy parties to get over 50% endorsement of candidacy by the Committee. If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2 to 3 candidates, Hong Kong's eligible voters can only choose one of them. They cannot nominate any preferred candidate. It is a fake and absolutely not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This rule of game completely declines the popular demand of taking civil nomination, defeating the monopoly of nomination by the Committee, as well as other proposals such as one-eighth or one-fourth of endorsement of candidacy by the Committee.

Lots of students and citizens were very dissatisfied with the fake universal suffrage. They joined in the Occupy Movement to fight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More and more people joined sit-ins.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of discontents, for example, the inappropriate government policy of defending the interests of corporates and developers. This led to an escalating property price and housing problem.

十月評論 2014年第2/3期

There was an enlarg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Social conflicts were aggravated. Disgruntles were widesprea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the police violently suppressed the Movement. They used 87 pieces of tear gas and beat the occupants' heads and necks which obviously violated police internal regulations. Many occupants were bleeding seriously and were sent to hosp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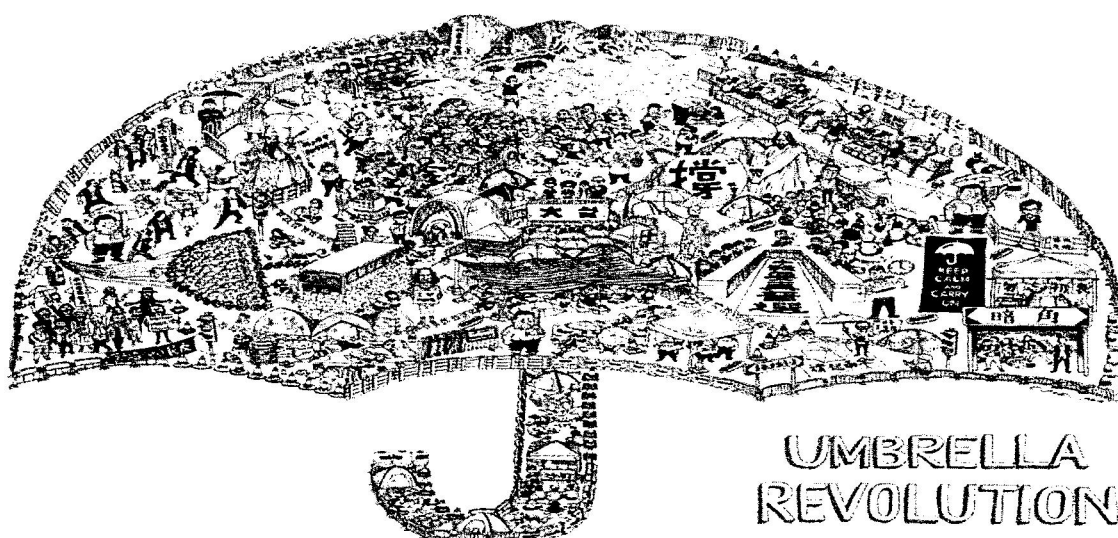
The authorities made mistakes which aroused people's anger, who joined the Movement, and provided material support. Many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made declaration on the newspapers to support the Movement and reprimanded police violent repression. Chinese of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echoed and supported. Local media made series of coverage and reports. In mainland China, over 100 people openly declared to support the Movement. They were detained for a long time and many are not yet released.

Although the August-31 Resolution has not yet been cancelled and the proposal of civil nomination has not been adopted yet, the Movement has already shown the occupants' courage and strong will of fighting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he demand is getting more popular which may force the authorities to make some changes or reforms when they formulate the details of election. Nevertheless, the discontents of Hong Kong people have increased. The fire of resistance will not stop.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kinds of resistances. If the future formul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is not satisfied, there will be more serious resistances.

The seventy-nine-day resistance is just the first wave of movement. There will be continuous ac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understandings and alliances among fighters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the next phase of resistance.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mainland people can see the scenes of Hong Kong Occupy Movement on TV and other media. Quite a number of them deliberately come to Hong Kong (such as Wang Dengyao, picket of June-fourth Democratic Movement), joined the Movement or observed the situation. The Movement directly challenges the authority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hallenges the reputation of CPC. It also affects the future democratic movement. It enhances people's experiences of resistance to the ruling class. Its influence is definitely far-reaching!

25 Dec 2014



“Rule of Law” as CPC Being above the Law, and Its Bad Consequences

Zhang Kai

Rule by Man but Not by Law

On 23-26 October 2014,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resolve the “Explanation Concerning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Decision Concerning Some Major Questions in Comprehensively Moving Forward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Law”, stating that it must push forward the rule of law. The ultimate aim is to build Chinese law system which makes China a country of law. Thus it must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CPC. That means CPC continues to control the law and its power is above the law.

The Article of No.5 of China’s Constitution states that “All state organs, the armed forces, a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and all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must abide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meaning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ilitary. Now, the Decision reinstates that CPC absolutely dominates the military, “people’s army is the armed force which carries out the political task of CPC”. It implies that the army is under the command of CPC but not the state which obviously violates the Constitution.

Zhang Qianfan,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Law of Peking University, well-known scholar of constitution and politics studies, remarks, “if CPC insists to dominate everything, it will be rule by man but not by law”, and “if there is rule by law, it should go back to the Report of the 13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epared by Zhao Ziyang in 1987, which requir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quoted from *Ming Po*, 4 Dec 2014). What CPC has done is exactly falling behind.

A lot of evidences prove that officials from high ranking to district level have supreme power. It seems that “they are the Law”. Once the rich colludes with the powerful, they not only violate the law, but also exploit and oppress the people.

Obviously, many dissident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lawyers are always charged with false accusations of “creating disturbances”, “crime of assembling a crowd to disturb order at public places”, “crime of incitement to split the state”, “the offenc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being a spy for foreign countries”, among others. They are wrongly detained and abused during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Gao Zhicheng, human rights lawyer, has only a slice of vegetable and one bun for daily meal. Many innocent people suffer seriously in prison, and worse still, are sent to death.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innocent people wrongly sent to prison. They are put under house arrest even when they are released from prison.

On 6 November, when attending Dameisha Forum in Shenzhen, Hu Deping, son of Hu Yaobang (former CPC General Secretary), and former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pointed out, “if CPC does not obey the law even after seizing power,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will suffer”, and “if people’s democratic authoritarianism is not abided by law, the general people will suffer from some people’s authoritarianism, and worse still,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will be oppressed by its own people’s authoritarianism” (quoted from *Ming Po*, 13 Nov 2014).

According to *Wen Wei Po*, dated 31 October 2014,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Rural China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leased the political volume of the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easant Situation”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It stated that 70% of peasants criticized that ‘power is above the law’ and ‘money is above the law’ in reality. They had great doubts on legal authority and effectiveness. So some peasants chose to use violence once their own rights were violated. Mass incidents happened a lot. The report was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of 4126 peasant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Massive Resistances

From 12 days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many cases of strikes, demonstrations, and massive resistances.

On 11 October, in Sanhui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thousands of people went on street demonstrations. They protested against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erging townships for building one city’, which led to low compensation for land confiscation and a setup of an administration centre. The police brutally suppressed the mass demonstrations. At least one student was beaten to death. At last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suspended temporarily the project. On 14 October, village people of Jinning County, Kunm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resisted illegal land confiscatio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y had serious conflicts with the armed police and paid mafia. Eight people died and 18 people were injured. The struggle has already lasted for two years. On 15 October, in Guangzhou city, thousands of taxi drivers went on strike. Their salaries have not increased for the last 20 years. Every year government issues unlimited licenses to make profit. On 31 October, in Dongxing City, Guangxi province, an anti-smuggling police unit refused to rescue a motor-cycle driver who was knocked down. This led to serious conflicts between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the police. Nine police vehicles were destroyed. The incident lasted for 5 hours.

On 1 November, in New District of Pudong, Shanghai, 4,000 people went on demonstration. They protested against government policy that invited a battery factory to move in. The authorities were forced to announce an emergency notice of cancellation of the project. It was the third battery factory which was kicked away under public pressure in Shanghai. On 17 November, in Shaodong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eight thousand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ent on strike. They complained that their salaries were lower than other places and pension fund was deducted as well, even though the local economy was good enough. On 18 November, in Sanjiang Township, Haikou city, Hainan provinc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ent on strike, against the building of a leprosy hospital. There were serious conflicts. 20 vehicles were destroyed. The situation was under control only when the project was suspend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n 21 November, in Nanpo Village, Shouyang Township, Longxi County, Dingxi City, Gansu province, over 1000 policemen and attackers confiscated land by force. More than 20 villagers were injured. 4 December is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al Day. Thousands of civil rights victims gathered in Beijing. Six policemen were wronged and committed suicide to protest. All these criticized CPC’s violation of the law. On 11 December, in Jinjia Village, Shiquan Township, Guixi City, Jiangxi province, about 200 villagers protested against forced land confiscation of 2500 *mu*. They were brutally suppressed by the police. On 13 December, over 1000 workers of Taiwanese Liangwei Technology Company, located in Baoan County,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went on strike. They protested against low salary, bad benefits, and deduction of overtime pay. The strike carried on. On 22 December, nearly 1,000 teachers of Gushi County, Henan province, went on strike. It was because the government’s promise of salary increase was never implemented and even worse, they got 18% deduction of salary. On 16 December,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eleased the Report 2014, stating that China is the No.1 country which sent the highest number of reporters and media workers to prison. Press freedom and reporters’ status ar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in China. This shows that reporters do not enjoy freedom of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do not have any legal protection.

People’s discontents were aggravated. It easily triggered collective action even out of a small incident. The above reports of mass resistances happened recently. It is believed that more protests outbreaks. The existing rulers of China have continued to suppress social demonstrations. However, where there is oppression, there is resistance; there is large-scale oppression, there is large-scale resistance. It is the basic rule of social movement. China is no exception!

23 December 2014

Hong Kong: Special Issue on Occupy Movement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Pandora's box is open now, the watershed of people's struggle.....	Da Jin	2
"Yellow ribbon, Umbrella, and Small Eggs".....	Jiang Qiongzhu	4
HK People Steadfastly Participated In Occupy Movement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Zhen Yan	6
Baton got eyes: discourse with Hong Kong police on benevolence (reprint).....	Oi ling	7
Yellow ribbon in Sahara Desert (reprint).....	Wang Ning	
100-day HK peaceful occupy movement, 30-year Occupy US White House, and 43-year Occupy Australian Parliament Square.....	Wang Ning	8
Hong Kong—one-month defending rights, one-month hunger strike, and 43-year resistance (reprint).....	Wang Ning	10
Australian Aboriginals have occupied the Parliament Squar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reprint).....	Wang Ning	13

Taiwan

Why did Kuomintang lose in the Nine-in-One election in Taiwan?.....	Jun Xing	
---	----------	--

China

"Rule of Law" as CPC Being above the Law, and Its Bad Consequences.....	Zhang Kai	16
It is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any nuclear plant in inland province in China.....	Po Mi	18
Deterioration of farmland in China.....	Qing Yan	22
Can China export its surplus of overproduction?.....	Lau Shan Ching	24
As clear as autumn (reprint).....	Mu Rong Xue Cun	25

International

Ebola, Poverty and Racism.....	Thadeus Pato	31
Descent Into Butchery: Israel's Latest Assault on Gaza.....	David Finkel	33
Descent Into Butchery, Part 2: An Update on the Gaza Massacre.....	David Finkel	34
Gaza: "Better to be dead than go back to the way we were".....	Julien Salingue	36
Fear clouds the Indian elections.....	Nagesh Rao	38
Capitalism, Global Slump & the New Normal.....	Andrew Sernatinger and Tessa Echeverria, David McNally	42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a Bank of the South, not the BRICS Bank".....	Éric Toussaint	49

Memorial

In memorial of the Ultimate Warrior Zheng Zeken (1918-2014).....	October Review	51
Poems on the Green Leave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Moluo and Zheng Chaolin (reprint)...	Zhou Lvqiang	53

Memory

Trotskyists in Zhongsha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ir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Zheng Zeken	55
--	-------------	----

History

100 years ago: Capitalism's world war and the battle against it.....	John Riddell	57
Why I resigned from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Magan Desai	60

Theory

The Workers' State, Thermidor, and Bonapartism.....	Leon Trotsky	74
---	--------------	----

Article in English

HK People Steadfastly Participated In Occupy Movement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Zhen Yan	87
"Rule of Law" as CPC Being above the Law, and Its Bad Consequences.....	Zhang Kai	89

香港	爭取真普選佔領運動特輯	
	「潘朵拉」盒子打開了，民間抗爭的分水嶺.....	大進 2
	《黃絲帶與傘，及小雞蛋》(長文節選).....	江瓊珠 4
	港人以堅強的佔領運動爭取真普選.....	振言 6
	警棍有眼：和香港警察討慈悲 (轉載).....	乞靈 7
	黃絲帶在撒哈拉沙漠(轉載).....	王寧 8
	香港和平佔中100天、美國佔白宮30年、澳洲佔國會廣場43年.....	王寧 8
	香港一維權滿月、絕食滿月與抗爭43年(轉載).....	王寧 10
	澳大利亞原著民國會前佔領維權40年(轉載).....	王寧 13
台灣	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何以慘敗?.....	軍行 15
中國	黨大於法的「依法治國」及其惡果.....	張開 16
	內陸興建核電決不可行.....	破謎 18
	中國耕地退化.....	青岩 22
	中國能否輸出其生產過剩?.....	劉山青 24
	如秋水長天(轉載).....	慕容雪村 25
國際	伊波拉病毒、貧困和種族主義.....	塔多司·帕托 31
	巴勒斯坦陷入屠宰場：以色列最近對加沙的血洗.....	大衛·芬克爾 33
	巴勒斯坦陷入屠宰場（第二部分）：以色列最近對加沙的血洗.....	大衛·芬克爾 34
	加沙：“我們就是死，都比走回頭路好”.....	朱利安·薩林穀 36
	恐懼籠罩印度選舉.....	納格什·饒 38
	資本主義、全球經濟下滑及新常態.....	安德魯·舍那亭格、泰莎·埃切維理亞、大衛·麥克納利 42
	另一種選擇將是南方銀行而不是金磚銀行.....	埃理克·杜桑 49
懷念	永遠懷念鄭澤鏗老戰士(1918 - 2014)	十月評論社同人 51
	綠葉上的詩——記莫洛與鄭超麟的交往(轉載).....	周履鏘 53
回憶	中山托派及其抗日工作.....	鄭澤鏗遺作 55
歷史	100多年前：資本主義的世界大戰和反戰的鬥爭.....	約翰·理德爾 57
	我為什麼脫離印度共產黨!.....	馬根·迪賽 60
理論	工人國家、熱月 and 波拿巴主義.....	托洛茨基 74
英譯	HK People Steadfastly Participated In Occupy Movement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Zhen Yan	87
	“Rule of Law” as CPC Being above the Law, and Its Bad Consequences.....Zhang Kai	89